

谨以此献给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

上海的视角..



中国与世界

——上海论坛 2005-2014 主旨演讲精选集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复旦发展研究院

上海的视角： 中国与世界

——上海论坛 2005-2014 主旨演讲精选集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复旦发展研究院

上海的视角：中国与世界
——上海论坛 2005–2014 主旨演讲精选集

编著信息

复旦发展研究院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编 著

编委会

主 任	林尚立			
副主任	陈寅章	张 怡		
执行主编	罗 倩	黄 昊		
编 辑	赵信敏 丁常听 胡唯哲 钱 宇 邵 熙	沈婵婧 黄 晨 沈 郊 巩辰卓 杨 军	吴 涛 姚思文 夏 梦 李 超	钱斯蕴 张 圆 朱红蕊 刘训志

谨以此献给

复旦大学 110 周年校庆

目录 CONTENTS

01 前言

02 亚洲

02	导言	
03	未来亚洲发展的挑战及其解决之道（2014）	演讲人：沙祖康
05	全球化与亚洲国家的选择（2010）	演讲人：李 扬
08	全球化的新时代：亚洲面临的挑战（2011）	演讲人：Supachai Panitchpakdi
11	变化世界环境下的亚洲情况和亚洲战略（2012）	演讲人：朱 民
15	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2014）	演讲人：樊勇明
18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洲合作与发展（2010）	演讲人：唐家璇
21	亚洲的金融发展（2013）	演讲人：Hélène Rey
24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亚洲可能发挥的作用（2011）	演讲人：樊 纲

26 中国

26	导言	
27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影响（2007）	演讲人：Vishakha Desai
29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人与文化实力（2012）	演讲人：龙永图
32	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挑战及应对建议（2012）	演讲人：Paul A. Volcker
36	大政府、小政府，还是法治政府（2011）	演讲人：吴志攀
39	从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中国的政治模式（2011）	演讲人：郑永年
42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2013）	演讲人：方星海
46	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2012）	演讲人：袁志刚
51	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一定需要出口快速增长来支撑（2011）	演讲人：James A. Mirrlees
54	外部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与出路（2010）	演讲人：华 民
59	发挥金融业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	演讲人：苏 宁

62 美 国

62	导言	
63	中美双边关系全景展望（2012）	演讲人：Robert Zoellick
69	美中关系：冲突、稳定及其前景（2012）	演讲人：James B.Steinberg
74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2009）	演讲人：Reuben Jeffery III

78 绿 色

78	导言	
79	能源、政府与市场（2011）	演讲人：James Ferguson Skea
82	未来的能源选择（2011）	演讲人：Mark Stephen Wrighton
85	明晰风险、洞察机遇， 助推亚洲转型和寻找新动力（2014）	演讲人：Michael Grubb
87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化（2007）	演讲人：Hans van Ginkel
91	德国能源变化及其对绿色亚洲的启示（2013）	演讲人：Andreas Löschel
94	名古屋大学与低碳环保（2010）	演讲人：藤井良一

97 自贸区

97	导言	
98	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区和货币联盟（2012）	演讲人：Robert A. Mundell
10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的关键： 制度创新（2014）	演讲人：简大年
104	变革中的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是“试验田”，而不是特权的温床（2014）	演讲人：Graham Mather
106	鹿特丹港的发展及其对上海港发展的启示（2014）	演讲人：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108	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从韩国经验看上海发展（2014）	演讲人：金范中
109	香港经验：自贸区需要能够帮助企业管理 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2014）	演讲人：邱丽萍

111 未 来

111	导言	
112	中国重新崛起与亚洲的未来（2010）	演讲人：Shaukat Aziz
114	未来，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2007）	演讲人：胡永泰
118	2020 年的中国经济（2011）	演讲人：张 军
122	40 亿的亚洲人谋求更好的健康水平： 未来十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2013）	演讲人：Michael H. Merson
125	寻找新的动力：亚洲的未来与创新之路（2014）	演讲人：Adam Posen
127	寻找新的动力：亚洲的未来与创新之路（2014）	演讲人：Robert J. Shiller

前 言

世界声音 上海相会

上海论坛已经走过了十年。

从它诞生开始，就肩负着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谋划亚洲发展的重任。每年，都有数百位知名人士带着思想而来，收获智慧而去。这里响彻的时代回声，让我们对亚洲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对世界的大势了然于胸。在大大小小 2000 余个发言里，我们单独地找出了一群人，把他们的言论集结成册，借以从一个侧面展现上海论坛十年来的嘉宾们，为世界、亚洲、中国和上海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谋划、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我们亦可以借事实来验证他们的研判，以塑造更加理想的未来。这个群体，就是上海论坛的主旨演讲嘉宾。

在这些嘉宾的演讲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或许并不那么贴切的关键词，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展现上海论坛一直以来的关切——他们看亚洲，挑战与机遇并存；他们论中国，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谈美国，太平洋挡不住合作与共进；他们倡绿色，表达着对环境和气候的珍视；他们议自贸，为中国寻求国际经验；他们谈未来，不断寻找新的动力。针对这些主题，我们精选了 39 篇演讲，有十余篇精彩演讲由于篇幅和内容上的原因被忍痛割爱。

在目前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所在单位——复旦发展研究院组织下，我们对这些嘉宾的演讲进行了精心整理、编辑和校对，力求准确地展现当时当地演讲者的表达，经过长期的智库工作，发展研究院年轻的学术运营团队对学术成果转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一些复旦的青年学子义务地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展现了复旦人一贯的高效严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囿于时间等因素，这些演讲的整理稿均来自当场速记，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我们期待着，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会有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论坛，在这个平台上畅谈他们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看法，这些，都将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第一部分 亚洲

上海论坛前十年的第一个主题词是“亚洲”。上世纪末，很多人说，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到了 2015 年这个节点，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亚洲确实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但话语权仍然在缓慢扩张过程中；亚洲确实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但远非核心和中坚。亚洲面临着复杂而艰巨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未来也必将挑战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必须而且必要，一个稳定、繁荣的亚洲，对世界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亚洲各国的福祉影响深远。十年，世界在变化，亚洲在变革。

◆未来亚洲发展的挑战及其解决之道（2014）

演讲人：沙祖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精彩语录】“亚洲的崛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转型和发展的进程中必将几经波折。当然，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亚洲已然向世界证明了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因此，我对中国和亚洲克服挑战、顺利实现转型的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

几年前，亚洲经济飞速发展，全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很多人由此断言，21 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无疑是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人们对所谓亚洲世纪说的热情似乎也在消减，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转向亚洲经济体中脆弱的一面。但是，我对时下怀疑中国和亚洲的观点并不认同。原因有二：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逐步走出，这无疑会重新激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外贸发展的动力。第二，亚洲经济体有着很强的韧性，经济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促使各国政府反思其政策上的缺陷，并重视其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一、亚洲的挑战

虽然我并不认可对中国和亚洲的质疑，但这并不表示亚洲经济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发展进程中仍面临着不少障碍，需要整个地区通过积极的转型来克服。挑战之一是传统制造业亟待升级。亚洲经济体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制造业来驱动增长。然而，与日俱增的要素成本会逐渐侵蚀中国等亚洲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些国家迫切地需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使制造业能够升级到依靠创新来驱动，资源利用效率和要素生产力得到更好的提升。挑战之二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改善。过去的二十年中，全球 GDP 翻了一翻。但是，与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相伴而来的是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在环境问题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亚洲也不例外。目前，这一地区在生物多样性、生态恶化和土地退化等方面形势严峻，全球很多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都地处亚洲。挑战之三是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如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收入的不平等也会带来机会的不均等，时至今日，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居民等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营养情况也亟待改善。

二、解决之道

上述的挑战告诉我们，亚洲的崛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转型和发展的进程中必将几经波折。当然，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亚洲已然向世界证明了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因此，我对中国和亚洲克服挑战、

顺利实现转型的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我认为解决方法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目前转型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其技术水平，继而升级其制造业。亚洲经济体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若想实现继续增长，必须充分激活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力量，在技术上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导者。

二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我们亟需发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其主旨就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资源利用效率得不到提升，未来的各国将在解决由能源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上消耗更多的精力。如今，一场关于可持续性的革命已经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包容性增长克服不平等问题。亚洲国家的增长必须强调其包容性，这并不是单纯的减少贫困，而是要更加关注平等问题，包括准入平等和机会平等。为此，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入，通过有效的政策来为低收入弱势群体带来切实的福祉。

亚洲各国需要积极寻求转型，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惟有如此，21 世纪才能真正成为亚洲的世纪。

（整理：李超）

◆全球化与亚洲国家的选择（2010）

演讲人：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精彩语录】“这就是我们（亚洲）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理论界也有一个概括——‘双错配’：一个是期限的错配，一个是货币的错配。亚洲地区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永远不可能搞好的，永远会处在被指责的地位上，因为我们要用别国（美国和欧洲）的货币。亚洲建立统一货币就是全球化下我们的一个理性选择。”

我很荣幸作为复旦校友应邀参加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论坛。正如我的标题所显示的：金融危机更加突出了亚洲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是获得了机遇，但如果不更加密切地合作，有可能会丧失这个机遇。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金融全球化当中“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是一个核心。所以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必须要讨论金融全球化的问题；讨论经济全球化下的亚洲选择，就必须要讨论亚洲地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地位和应对之策。这也是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现状

简单地回顾一下目前正在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众所周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七十年代初期，国际货币体系是以所谓的“双挂钩”机制运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黄金平价和美元挂钩。这样的“双挂钩”体系本身就蕴含着不稳定性。它的不稳定已经有了定论，这种定论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这种难题的存在使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持续。它存在着内在的矛盾，长期地持续下去将会动摇货币和汇率支柱。

随着这种体系的瓦解，出现了 SDR（特别提款权）和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力的欧元。欧洲地区经过了 50 年的不懈努力出现了一个足以与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当然，这个货币今天面临了重大冲击，有人悲观地认为：这个货币能否继续存在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我想讨论的是：在今天美元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且像欧元这样的一些已经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进入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请大家看一个统计。如果是按照货币所使用的范围来分成货币圈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地区。美元区占世界 GDP 的一半左右（48.4%），欧元区占 33.4%，日元区占 9.6%，而英镑区占 6.7%，其他货币占 1.9%。这样的格局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是由美元主导，欧元次主导，而其他货币的地位在衰落。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货币所覆盖 GDP 的份额记在心里，就要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GDP 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就 GDP 所占份额而言，美国和欧元区占到 50%，而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在内是 GDP 占 35% 左右，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美国本身的 GDP 是一个份额，但是美元覆盖的 GDP 要大于它的 GDP 所占的份额。欧元也是一个份额，但是它所覆盖的 GDP 要大于本地区的 GDP，而唯独亚洲地区的 GDP 是日益增大，但是本地区的货币所覆盖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这就是亚洲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理论界也有一个概括——“双错配”：一个是期限的错配，一个是货币的错配。亚洲地区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永远不可能搞好的，永远会处在被指责的地位上，因为你要用别国的货币。亚洲建

立统一货币就是全球化下我们的一个理性选择。

二、亚洲一体化：条件与制约

什么是亚洲的选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看。首先，从贸易的角度看，现在亚洲国家的贸易 50% 以上都是区域内贸易，而欧元启动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比重已经具备了产生统一货币区的条件。

其次，从金融的角度看，这里面所谓的“金融”就是通过商业银行的对外融资活动和金融投资者的投资活动。亚洲地区的利率和股价是相互影响的，联动性、同时性都在逐步提高。这说明了我们在金融方面也有了一体化的条件。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第一次显示，原先我们认为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都是美元化地区，都是盯住美元。但是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彼此内部的关联是大于和外部的美元、欧元之间的联系。

再次，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分析了宏观经济区域内的各国之间指标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同样的是联动性、同时性在日趋提高。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景气循环相关度的提高，就使得共同货币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外部经济对区域内国家冲击的对称性——相应得到提高。因此，区域内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变化，自然会对区域内的汇率稳定提出了日益增高的要求。从上述三方面可以发现：我们不仅存在这样的一种需要，事实上已经逐渐在创造亚洲统一货币区的相关条件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亚洲地区还是很多样化的。“多样化”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相对难听点的评价是“分崩离析”。实际上亚洲经济上有那么多的进展，金融领域上也有那么多的进展，但是在很多的方面，如果我们依据区域一体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结构，也就是国民收入、产业结构发展、深化程度、宏观经济指标和膨胀利率等方面来看。结论是我们离单一货币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看出人均 GDP 的差异非常大。其次，亚洲虽然是投资和储蓄率非常高的地区，但是我们也发现亚洲地区有一些重要的国家，比如说印度的储蓄是小于它的投资。

第三，从产业结构上看，部分国家和地区服务业的占比很高，甚至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多数地区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阶段。而从出口、进口和 FDI 等一系列指标比较，也是相差悬殊，一致性上有比较大的问题。最后，我们再看宏观经济指标。从政府部门债务对 GDP 的比重、一般政府部门差额对 GDP 的比重到通货膨胀率，差距都很大。而在利率水平方面，我们用 12 个月期的存款和贷款的利率来衡量，同样也看到了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贸易结构在发生变化，我们如果比较中国和日本分别相对亚洲地区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进口、出口份额的变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对亚洲地区的所有国家，它作为一个进口国的重要性是快速提高的。这里没有最新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危机之后这样的一种趋势在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对的，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国家里面作为进口国的重要性却在下降。当然，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很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是下一步追求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追寻一种统一的亚洲货币的话，如果经济上的相互关联性在上升，当然这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如果是在下降的话，比如说日本的情况，那么它作为亚洲地区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伙伴，就值得置疑了。在亚洲地区，我们看到了外汇汇率制度，也存在着极大差异：有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也有“硬盯住”美元的汇率制（这样的汇率制不多但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中国的汇率制度在经历了危机之后主要是一种“软盯住”。货币汇率制度之间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联系，造成很多扭曲性的影响。

亚洲地区的一些差异，说明了我们进一步建立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金融合作和货币合作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非常可喜的是亚洲地区始终在努力。以清迈倡议为例，其多边化机制以及亚洲债务市场的发展等都是我们迈向一体化的重要努力。但是，很显然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显著。所以说亚洲地区

的区域合作是任重而道远的。

三、亚洲未来的方向

我大致列了六个需要努力的重点方面：

第一，政治互信的确立。它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互信，而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互信在亚洲是极其缺乏的。

第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常态化合作。迄今为止基本上是局限于危机管理的层面：只有出了事情大家才开始谈合作，一旦事情不紧急就各自为政。

第三，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合作。从事实上的一体化走向制度上的一体化，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改善各国之间的经济状况，调整经济结构。这包括调整我国的资本政策、资本项目的管理管制政策、汇率政策，追求汇率政策的协调等等，有非常多的内容需要落实。

第五，当上述的因素都具备，我们就可以考虑建立东亚货币整体性对美元浮动汇率的整体性，以摆脱“双错配”和美元霸权。

最后，如果这种合作的机制可以运行良好，我们可以探讨某种形式的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形式。这是亚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全球化的一种亚洲选择。

归纳起来：第一，亚洲在经济实体上来讲，成长极为迅速；第二，亚洲内部出现碎片化和美元化。这种情况阻碍了亚洲的经济发展，这也要求未来亚洲需要在货币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整理：巩辰卓）

◆全球化的新时代：亚洲面临的挑战（2011）

演讲人：Supachai Panitchpakdi（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

【精彩语录】“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有一揽子货币的形成，这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改变这些国际组织的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国家共同参与的。”

一、全球化时代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是 30 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去过西郊宾馆，是一个古老的别墅。大家可以看到 30 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所以这次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十年的时候，主题正当其时。正像刚才 James Mirrlees 教授所说的，贸易让一个国家专业化，提高了竞争力。对我而言，如果我说过一些年，可能是 2015 或者是 2016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想这也不会太让人意外，因为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一个经济体也很自然，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但是，大家更应该关注和感到激动的应该是中国如何更好地管理它的增长，是不是真正带来了人们寻求的福利和福祉，中国的成长是不是有了很好的管理机制，并帮助全球的机制有了更好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10-20 年里是靠外贸驱动的，这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呢？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增长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全球第一”的称号而已。我想再引用 2007 年温家宝总理所讲的话，他说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不协调，他说最终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今年他又说了同样的一番话，可以说在未来的 4 年当中，可能他说的这番话，也会被不断地强调。我想 James Mirrlees 教授所说的，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 10%、8%、9%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因为随着一个国家的越来越成熟，中国不可能保持一个 8%、9%、10%、11% 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要更加地关注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让中国的经济更加地平衡、更加地协调、更加地可持续，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要旨。当然，我们知道温总理非常的谦虚，他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全球的经济，现在全球的经济也是不稳定、失衡、不协调的，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仅仅是中国经济面临这样的困境，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二、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经济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浪费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带给我们的一些有益的教训，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来改进全球的经济，而不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周期衰退、繁荣并最终至泡沫的破灭。正如樊纲教授和 Mirrlees 教授这些学者提出的很多深刻的见解，经济全球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多的繁荣和衰退，我们不应该再遵循这种经济的自然周期，而是应该更多地运用智慧来抵御这种危机或者是自然的循环。谈到今天亚洲面临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知道全球对于亚洲的经济有很大的期待，亚洲的经济也很有竞争力，有时候它是按照规则，有时候它是不按照规则来进行的。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亚洲的经济政策，

像有些国家已经推行了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之路。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谈到现实的时候说要把它变成一套理论，因为有了理论，可以让整个理论框架变得更加的简单。但是有些时候这些理论和现实并不吻合，像西方国家的某些理论是与现实脱节的。特别是现在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地理、历史、文化背景非常的多元化，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因素都必须要考虑进去。而人，比如你我，并不是很理性的，很多的决策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甚至有些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度假的时候，是在你朋友的怂恿之下才去的，到了那里你会很失望，还有对一些品牌的喜好，你和你的朋友也会不同。

如果你从事理论研究，最终可能会赢得诺贝尔奖，正如 Mirrlees 教授那样。我提到诺奖，是为了说明我的思想还不算落伍。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克鲁格曼教授，虽然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理论。我执政期间他来亚洲访问，那时候他对亚洲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对亚洲靠流汗出力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并不认同。我当时同他做了很多的探讨，也同意他所说的不仅仅是苦干，更要巧干。在两年之前，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一个演讲，总结了过去 30 年的经济学发展理论。他说这些理论，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很多极端的情况下这些理论是有害的，这是过去 30 年里他对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评价。还有另外一位教授，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 2009 年的时候接受了一个采访，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斯蒂格利茨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严肃，美联储并没有做它应该做的事情，也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是造成美国和全球困难的罪魁祸首。财政部代表的是金融市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引用另外一位教授罗伯特·蒙代尔的话，他经常到中国来访问，我也经常与他见面。今年 3 月份他在曼哈顿学院做了一个演讲，所谈的问题正如樊纲教授所谈的问题一样，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了欧元区的问题，他提到欧元为全球经济带来了稳定。他说美国和欧洲应该更好地协调他们的汇率政策，欧元兑美元的价格应该设一个上限和下限，比如说在 1:1.3 与 1:1.4 之间，这样才能减少美元本身的汇率变动对全球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影响。我们知道他对于中国亚洲的高储蓄和欧美的低储蓄也有过一些评论，他说现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环境，最终是用汇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今天早上樊纲教授所说的那样，现在的美元作为全球的储蓄货币有这么长的历史，已经是不堪重负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现实，但是我们要采取的行动是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全球储备货币的系统，它有可能从我们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了。

二战之后的美元作为全球金融储蓄货币的这种状态，对当时的全球经济是有利的。而现在是刚刚开放，重新崛起的时候，需要重新的人力投入。但是，我们现在只是依托一个单一的国家货币来驱动全球的贸易，这样合理吗？而且这样一个国家的货币，正如美国的财政部长所说的，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有 30 多万亿的外汇储备，美国是每年都在新印美元，美国只是印这些纸，而中国是拿着这些纸作为美国的债券，为什么中国要这么做呢？这个问题也是樊纲教授所提出的。我们几位在联合国的系统当中，不能说美国的坏话，也不能说美元的坏话，但是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注美元。真的，如果我们抛弃美元，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实际上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不是因为中国在贸易中出口太多，或者是有些国家的储备太多或者是储备太低的原因，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国家总是能够不断地印钞票，正是这种现状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美国的银行，因为美国的银行有一堆自己的烂账需要处理；也不是美国的家庭，因为美国的家庭手头也没有太多的钱。有人说就是美国的货币，货币流入全球市场，导致了问题。比如说巴西，巴西当然也希望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但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很多的资金都流入巴西，使得巴西的汇率走高，从而产生了投资困难、高失业率等一系列的问题。亚洲也面临相同的情况，很多

热钱都涌到了亚洲，使得货币升值，亚洲国家必须要控制通胀，以至于没有精力去发展本国的经济。

三、全球化时代亚洲所面临的挑战

下面我就亚洲所面临的挑战作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增长应有实质，而不应流于形式。这是亚洲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很多次会议上都提到所谓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样的“可持续发展”之初，必须要解决发展的不平等。我们要施行社会保障、创造就业机会、节约能源、实现男女平等，以及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第二，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很多时候，经济学家的话值得我们去质疑，我们需要思考适合于自身的政策。我曾与一位中国经济学家交流中国的货币政策，他说中国有很高效的货币政策，比如要拉动消费的话，就放长假，让人们去消费去旅游，人们花钱了，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增加内需。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给我们穿上了一件紧身衣，我们要控制通胀，就一定要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让经济更快地增长，控制了通货膨胀率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问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还有货币政策的改革以及我们的税收。现在的体系是不是合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降低税率呢？这样以来，让人们理解他们的税负是合理的，让人们自愿付税，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避税。

第三，加强区域间整合。现在亚洲的区域整合实际上十分的不协调。在欧盟区有 27 个国家，他们只是一个经济的实体，就是欧盟。而在亚太区有 20 多个经济联合体，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像东盟 +3、+6 等。我认为亚洲的经济整合应该更加的严肃和协调，这并非因为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达到了总额的 50%，只有欧洲超过了这一地区。亚洲人善于从事贸易，他们天生都是创业家。我们要充分地利用经济区域整合，进一步加强亚洲地区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开放亚洲地区的副业，进一步开放能源、交通、物流、金融，或者是商业咨询等领域。我们要开放这些市场，然后统一贸易的规则。大家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应该更好地管理亚洲的水资源，因为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说法，未来不稳定和冲突的一个根源，就是水。所以对与这个地区，我们应该在交通、能源和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第四，增进多边合作。这也包含很多的内容，包括了储备货币，樊纲教授也说过，我完全支持他的说法。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有一揽子货币的形成，这是一个全新的内容。两天之前，我在法国谈到一个问题，G20 是不是可以代表全球 192 个国家呢？在联合国我们有 192 个成员国，只有 20 个国家在那里讨论，其他的 172 个国家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呢？当然联合国主席有 20 分钟的发言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 20 个国家代表了全球在进行关门的讨论。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一现状，也就是要改变全球的体系管理措施。在联合国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变革，我们的秘书长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不仅对联合国要进行改革，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实施改革，现在面临危机，不能放弃这样好的变革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并未行动。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只是说我们要花钱，只要花钱就可以让国家走出经济的衰退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此有所控制，我们应该要改变这些国际组织的方式，这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国家共同参与的。

（整理：刘训志）

◆变化世界环境下的亚洲情况和亚洲战略（2012）

演讲人：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精彩语录】“泛亚洲地区应该是不断地发展，我相信在这样拓展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对于制造行业，包括金融行业。对服务行业的改革应该更加开放。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格局，也就是包容式的增长。”

首先感谢主持人对我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邀请。我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十分荣幸能够回到复旦并在此给大家简单分享我的一些想法。这次的会议提到了亚洲战略，特别是未来十年的亚洲战略，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在一个变换的世界环境下亚洲的情况。首先讲变换的世界，世界现在确实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当然我不能够把所有的情况都给大家介绍，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世界是怎么变化的，在这个变化的形态下，亚洲是如何融入整个世界的。

一、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我们经历到了非常强大的激进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都是这样。过去我们看到了很强的 GDP 增长率，特别是在 2000 年的时候，增长非常强劲。这是名义上的增长率，实际的增长率过去四十年里 GDP 全球增长了 4 倍，这已经是老的信息了。我们再来看看贸易。这张其实是一个通货膨胀，你可以看到这也带来了我们贸易的一个增长，如果你只看到贸易的话，它的增长更强劲，在过去四十年里，贸易的增长翻了十倍。你可以看到全球的贸易和内部 GDP 的比例，大大地增加了。从四十年之前的 11% 到目前 23%，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当然还远远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些金融的资产，它的增长更加厉害，它比贸易 GDP 的份额的增长还要快。你看到这个曲线增长的速率更加强，特别是在 2000 年以后，全球的金融情况特别是银行业在过去四十年里增加了 14 倍。

为了节省时间，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所有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有非常强劲的资金支持，当然资金的供应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也提升了 14 倍。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由于今天时间的环境，我不会一一给大家在每个方面都展开。来简单地总结一下，在过去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非常强劲的 GDP 增长，贸易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更强劲，金融的资产它的增长比 GDP 的增长还要快、还要强劲。而且货币的提供、供应量也是更加地增长。我们通过金融的渠道，也提升了贸易的量。由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通过不同的速率在发展，通过不同的方法在发展，这都是我们全球的情况产生的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对全球的板块地图进行重新构架了，这是我们全球的地理分布的地图。这个地图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我们重新用 GDP 来衡量这个地图的话，就变成这样。最大的变化就是俄罗斯变得非常小了。以前俄罗斯很大，因为它地理的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如果用 GDP 来衡量的话，就有了变化。美国变得很大了，变成第一位，中国第二位，这是日本，以 GDP 考量的话韩国在全球的版图上也变得更大了。我把这称为全球经济的版图。如果我们再用贸易来衡量，这个地图又再一次变化了，你可以看到美国变小了一些，中国也变得小了一些，欧洲变得更大了。当然在欧洲国家之间有很多的贸易量，如果我们把这

些贸易量拿走之后，欧洲的这个板块也减少了，南韩还是很大，因为它的贸易量很大。在全球范围内南韩的贸易量还是很大，中国还是比较大，俄罗斯是这一块地方。

我们看看金融市场在全球是怎么样发展的，如果看这个指标的话，地图再一次变化了。这是我们的金融世界，这时候中国变得非常小，俄罗斯也变得非常小，欧洲的国家变得巨大。当然美国也是很大了，但是欧洲还是最大的。这是香港。这个地图就是由国际金融的交易量作为指数来划分的。这是日本，这是卢森堡。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去看看这三张不同的版图，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每个国家不同的变化，每个国家都朝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和金融联系得非常紧密，从这个版图中，我们看到经济、金融版图的重要性，但是这还不是所有的情况。我们还想看到地图朝未来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下，每个国家之间是怎么彼此相连的。这里我想很快地给大家讲一讲国家的相互联系性。

这又回到了我们标准的一张地图上，这是全世界主要的一些国家，它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有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开始一些迁移，今天整个世界成为了三个主要的集群，第一个集群是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总是联系得非常紧密的。第二个集群是亚洲，我把它称为泛亚洲地区，亚洲现在也已经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工业链，更多的国家现在也加入到亚洲的集群当中去，巴西、智利今天也属于亚洲集群了，坦桑尼亚、南非这些国家都加入到亚洲集群来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亚洲的集群当中来，也成为了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工业链当中的一部分。第三个集群就是石油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不同的，尼日利亚、科威特、苏丹由于有同样的特点和业务周期，所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个集群有非常相似的经济周期，他们之间内部有很多的相互连接性。这是全球三个主要的集群，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板块，了解这三个世界集团彼此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看一看欧洲的例子。

这是欧元区之前的一个板块。现在变化了，这是在未来 15 年以后，即 1984 ～ 1995 年，这个时候在欧元进入欧洲之前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南部的中心，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一块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中心。北部的核心国家不是德国而是英国。德国并不是核心，但是当欧元进入了欧洲之后，十年以后开始板块变动了，这是今天的解释。他们彼此之间，国与国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了，所以欧元在欧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把所有的欧洲国家联系得更为紧密了。希腊总是在外部、边界这边，整个世界目前的核心会和其它的方面紧相连，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图。

另外一张图是全球贸易的集群图。这张图里中国处于核心。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连得很近，德国、英国、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都联系得很近，这是一个整体的区域，这里是一个垂直性的供应链。而今天这个区域里是由中国主导的，特别是在制造业里中国是领头的，当然日本还不在核心区里。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板块是有交集的，我没有那么多颜色，所以无法给大家显示这个重叠的区域。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联系得非常紧密，因为它经济和贸易的能力非常强烈，日本和它们的联系稍微远一点，也是属于亚洲这个集群的，但是它和发达国家的联系没有中国那么紧密。这是另一张图表，是机械的贸易，你可以看到它的核心还是中国、美国、德国，通过这些核心它会扩展到其它的一些区域，比如说中国扩展到亚洲、非洲的影响，还有美国对一些拉美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过去的 20 年里，所有的这些核心国家都会渗透到其它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去。而核心之间变得越来越紧密，它们也会更好地渗透到亚洲市场去。

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在这里我无法给大家非常详细地展开所有的内容，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移动，国与国之间有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跟过去相比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而且有很多共同的移动、运动。在这个区域的资产回报情况，2003 年是 20%，而现在这些相互关系是要超过 80%、90% 以上，所以说在各种资产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区里的资产的联系度大大增加了。再看具体的情况，这条绿颜色的曲线是拉丁美洲资产、股权市场，这条是亚洲的市场，这两条曲线的运动在十年前是 42%，而到现在是 81%。亚洲的新兴市场和拉丁美洲的股权市场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紧密了，因为

拉丁美洲更是亚洲供应链的一部分。

二、亚洲发展未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危机之前一些新兴市场里，整个工业的输出可以对外部的冲击进行显示，过去只是占到一半，在危机之后它已经达到了 60%，可以由外部的冲击所解释。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危机前 20%，危机后达到 40%。所以不仅新兴的经济体而且一些发达国家都受到了外部的一些冲击。在过去四十年里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之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持续变化，当今发展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国与国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建立起了三个集群，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石油国家。未来十年亚洲要以什么样的战略去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亚洲的集群成型还没有完成。亚洲的供应链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展中，而且将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亚洲的区域供应链当中。过去的十年和目前的情况相比，这个版图有了很大的区别，更大的国家进入了亚洲的区域，而且不断地在吸引更多的国家，也创建了整个区域的很多机会。当然当亚洲建立更多的供应链之后，这个区域也会受到更多的一些风险的冲击和外部冲击的影响。日本的地震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多大，泰国的洪水也对亚洲供应链方面乃至全球供应链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亚洲当然也是在金融资产上受到全球的巨大影响，韩国的人士抱怨说，现在有了欧洲的危机，但是韩国和日本的波动要比过去的日元的波动更大，原因就是自己的输入、输出造成了很大资本市场的波动。

深颜色的是风险的曲线，资本输入、输出量巨大，当然对于指数也造成了相应的影响，在未来的十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未来的十年里亚洲区域会出现几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供应链将会不断扩张，将会更加垂直联系，而且向前推进，价值链会把发达国家推进更高端的价值链当中去，并且会使全球的制造业进行重组，特别是在未来五年里会出现更多的全球制造业的重组。发展的速度在未来 5 ～ 10 年里会变得更快，亚洲当然是起到了这个趋势的领头羊的作用。

第二个趋势就是在金融的行业里，将会有更多的改革，会吸收更多的资金。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年年底新兴的市场、低收入的国家，它们会占到全球 GDP 的 50%。这也是在现代的人类历史上对于新兴市场第一次能够全球的 GDP 当中占到 50%，这对整个全球需求的公式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可以看到相关的范式也会得到改变。这些新兴市场占到全球 50%GDP 的，但是它们的金融资产只占全球的 19%，还有对于这些亚洲新兴市场，虽然它们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有大的提升，但是他们的整个金融资产现在还是不够的，而且在未来的市场或者世界应该有这样一个回流的状态：一些发达国家的资金慢慢地会流入到新兴的市场，在这样的格局下，整个浮动性或者波动性肯定是会更大。2009 年初的时候有大量的资金，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转移，而且包括 2009 年还有 2010 年、2011 年，特别是 2011 年 8 月份的时候，大量的资金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有一个相互的流动，而且出现了利率的变化，比如印度的卢比整个汇率的变动都达到 25% 了。总体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好的信息，因为大量的资金都融入到或流入到了我们的新兴市场。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必须要在新兴市场上来进行金融的改革，特别是金融的透明性方面应该要进行改革。这样的话，才能容纳这样的一个金融体量。

接下来就是服务行业。之前亚洲国家都是靠出口来发展的，我们必须要把整个发展的模式转变为消费型的，这样就需要来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如果要发展我们的整个消费领域的话，一定要开放我们的服务行业，这样的才能有更多的就业的岗位。其实现在的服务行业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在服务贸易或者是实物贸易方面，新兴国家已经体现出自己的生产能力，但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说，现在发展中国家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服务行业的整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正是由于它们占据这样的服务优势，所以它们也是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打开服务大门，以便更好地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这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当然对于亚洲地区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包含式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且必须要实现更多的公平。

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地分享这些繁荣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我觉得包容式的增长是最重要的。

最后小结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中国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贸易方面，全球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的经济、贸易，还有整个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各国之间的联络程度也是越来越大了，泛亚洲地区要更多的融入到供应链当中。泛亚洲地区应该是不断地发展，我相信在这样拓展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对于制造行业，包括金融行业。对服务行业的改革应该更加开放。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格局，也就是包容式的增长。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谢谢各位。

（整理：李超）

◆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2014）

演讲人：樊勇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语录】“金砖国家存在合作，同时各国之间内部也有许多矛盾，比如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文化甚至领土纠纷。但是很多的共同需要和长远的利益要求金砖国家朝着合作和发展的方向。”

关于金砖合作下的亚洲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砖合作的生命力；二是金砖国家合作以及在亚洲的多元发展战略。

一、金砖国家合作的生命力

金砖国家在外交合作上有很多合作，但是内部的矛盾很多，因此可能形成不了一个长远的合作。需要去思考金砖国家合作的长期性、有效性。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能否成为一支战略性力量的时候，大概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内部的稳定性；第二是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即和它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及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第三是它能否对所在的地区出现有效的制衡。

首先金砖国家合作的内部稳定性。内部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体现四个共同特征，金砖国家不仅具有都要转型、都要发展的共同特征，而且对国际社会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更为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已经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和采取了共同的行动。无论是从内部或者从外部看，都呈现这四个共同的特征。从内部看，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以及相互之间的务实合作不断发展；从外部来看，金砖国家已经和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及传统大国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一是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现在金砖国家已经出现了政府和民间两个轮子共同推动的发展态势。从政府主导的方面来看，已经形成了每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以及各界部长级会议、财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级会议，同时还有负责落实的具体的工作小组，已经有效运作将近十年，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民间的智库组成的智库联盟和工商理事。工商理事会是从小个金砖国家当中选出一些最有影响的企业家来共同推动金砖治理。中国参与的5个大企业很多是民营企业，甚至包括了一个在深圳发展不久的高科技企业。这些说明了民间和政府的共同推动是现在金砖国家的生命力和合作机制化的一个共同特征。

第二无论是联合国或者G20国集团等国际场合，金砖国家的领导人或者金砖国家的部长都是发出共同的声音、采取共同的立场。也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例如筹建金砖国家银行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进展。金砖国家的银行不是替代佐立克先生以前领导的世界银行，而是它的补充，其目的是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让世界有更多的活力。同时金砖国家也建立了一个联合的外汇储备库，这不仅有助于减少金砖国家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而且也有助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此外金砖国家正在推进贸易便利化。所谓的贸易便利化主要是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如果海关、运输、商品检验构成的交易成本每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全球将会得到400亿美元的收益。考虑到金砖国家体制上面的原因和金砖国家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推动贸易便利化对金砖国家合作具有很大的意义。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方面，过去十年金砖国家的相互贸易增长的速度是28%，每年接近三分之一，过去的十年整个贸易额已经翻番

了 15 倍，现在大概三千多亿，再过十年可能达到五千亿美元的数量。

第三经过对迄今为止的金砖国家的五次峰会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发现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十分清晰。体现为四点，第一是希望建立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公平、多极化的国际秩序；第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更加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朝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最近新的进展是一位巴西的官员将会出任 WTO 的总干事，由于他具有的特殊背景，他可能比其他人更能够在 WTO 的框架下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间利益的平衡和协调。

第四金砖国家强力主张通过对话以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方法积极解决气候、能源、环境性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金砖国家主动提出的自我承诺和减排约束对于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起着极大的作用。一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而且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仅依赖现有的国际机制来治理和解决全球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的参与，许多问题无法解决。二是每一个金砖国家都和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外交合作。三是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多种的协商、合作机制。不要把金砖国家的合作和发展看成是一个国际体系对另外一个国际体系的取代，而是不同的利益、机制相互并存和取得平衡。

前两天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时，刊登在印度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是现行国际运行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中国将愿意和印度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个体系。这是近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定位以及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的定位两者相互关系十分明确的阐述。李克强总理提出来中国是国际运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同时也是改革者，明确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立场，阐述了金砖国家的立场。

金砖国家存在合作，同时各国之间内部也有许多矛盾，比如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文化甚至领土纠纷。但是很多的共同需要和长远的利益要求金砖国家朝着合作和发展的方向。政治方面，金砖国家都希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关系的多极化，都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经济方面，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不断上升，2008 年是 14% 不到 15%，二三十年后金砖国家将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半，这不仅给全球带来许多机会，而且给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带来巨大的机会。生产要素方面，人口、土地、资源、市场等方面，金砖国家容量要比发达国家大。所以从经济、政策的长远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世界经济有波动，各个国家当然包括金砖国家宏观经济会有波动，汇率、出口也有波动，但是长期的因素决定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有效性和合作的有效性。

二、金砖国家合作下的亚洲地区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的生命力需要体现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有效的地区治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国或者一个大国集团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经济、政治的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创造或者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繁荣、安全、稳定。是金砖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个别国家的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巴西和拉美，南非和南部非洲，俄罗斯由于前苏联的关系，它和中亚和东欧之间，都是密不可分。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的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个金砖国家都是代表着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典型或者政治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今年 3 月份的峰会上金砖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5 国领导人邀请了十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讨论如何促进南部非洲以及整个非洲的发展，可能明年在巴西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

作为本身就是一个地区概念的金砖国家，具体体现亚洲的多元发展有三个层次：

第一从全球层面，金砖国家所倡导的、主张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合作共赢理念是和亚洲的多元发

展和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一致的。第二从区域层面，一个是 RCEP，另一个是 APEC。所谓 RCEP，参加了国家中日韩东盟十国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里面印度和中国的参加使原来中盟国家提出的构想得到了实际的支撑，光靠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现在 RCEP 正在和美国形成的 TPP 形成一个共识，这是最近亚洲经济合作重要的桥梁，确实我们中国至少在学术界对美国的 TPP 所包含的战略和外交的意图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也有许多的学者认为 TPP 有其合理性，它所主张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印度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情。刚才方主任提到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有更强的外来冲击。同时 APEC 明年将会在中国举行，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将会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像大家所讲的 APEC 已经是结束了。第三从东北亚次区域层面。现在东北亚合作主要是中日韩，由于历史、领土等等纠纷进展缓慢，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将使东北亚的地区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要建立一个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所组成的亚洲经济走廊，把东亚和欧洲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在亚洲的合作以及亚洲的多元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的多元发展，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将会不断出现新的局面。

（整理：李超）

◆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洲合作与发展（2010）

演讲人：唐家璇（原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精彩语录】“‘你输我赢、你危我安’的思维不是中国的一贯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决定了中国不会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亚洲的选择就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风向，与国内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寻求同世界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永远做亚洲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一、金融危机尚未成为过去时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友，我很高兴能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上海论坛。上海论坛成立 5 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各国政界、商界、学术界精英交流互动、共议时政大事，国家大计的一场盛事。我非常同意刚才阿齐兹先生的高见，但是从整体和全局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存，国际金融危机还不能讲已经过去。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与亚洲的发展走向更加备受关注。因此，本届论坛以“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反思、复苏、重构”为主题，我认为非常合乎时宜，紧扣时代脉搏。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对于影响和引导亚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是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许多亚洲国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加快发展。亚洲经济总量从 1990 年占世界总量的 15%，跃升至目前的 25% 左右，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吸收外资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 26.8%、32.5% 和 25%。跨国企业纷纷在亚洲投资，并将研发中心转移到亚洲，推动了本地区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国家加快经济融合和区域合作的步伐，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学习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学习国际通行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经济社会取得了全面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给亚洲国家带来了风险与挑战。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随着各国稳定金融和刺激增长政策逐步的取得成效，亚洲和世界经济正在一步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步恢复增长。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引发危机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还很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将长期存在。

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于亚洲长期发展的模式开展深刻反思：一是对过于依赖外需的反思。亚洲国家长期依靠出口增长创造经济繁荣，然而过度的依赖外部市场也增加了亚洲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这场危机充分暴露出亚洲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深刻调整，美欧消费需求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亚洲国家需要加快培育内需，切实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

二是对高昂的环境代价的反思。多数亚洲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短缺，随着绿色和低碳经济在全球经济范围兴起，亚洲国家需要大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积极的促进绿色循环经济的增长。

三是对民生保障不足的反思。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但亚洲仍然是世界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等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大力改善民生等，应该成为亚洲国家的努力方向。

纵观人类历史，每次巨大危机，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各国在更高水平上的新一轮发展已经拉开了序幕。亚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对复杂挑战，抓住机遇，勇于创新，就可以抓住新的机遇；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固步自封，就可能会落伍甚至是掉队。亚洲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我认为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二、中国与亚洲的协同合作与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战略、统筹的办法、共赢的途径，实现了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注重标本兼治、

远近结合、综合协调、相互促进，把扩大国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增加投资和促进消费增长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民生结合起来，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8.7%，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11.9%，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亚洲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从亚洲共同发展中受益颇多，更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亚洲的发展与繁荣，亚洲国家经受住了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危机中合作共济的意识增强了。中国反复的表示感同身受，同舟共济，表示人民币不贬值，维护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去年中国与韩国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了东盟与中日韩 120 亿美元的外币储备达成了共识。中国表示成为亚洲第一出口市场的地位，为维护亚洲经济稳定，拉动亚洲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推进区域自贸安排和金融合作。今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了，这是中国签署的首个自贸协议，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自贸区，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自贸区的建成当月，双边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80%，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与进口，分别增长了 52.8% 和 117.3%。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东盟与中日韩的外汇储备于今年 5 月 3 日建成，储蓄信用担保于当日建立，中国的引领、推动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或者是要遇到的困难是许多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中国有超过 13 亿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百名之后，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4%，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 11%。同时，中国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面临着艰巨、繁重的任务。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保持清醒、客观的认识。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同各国一道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那种“你输我赢、你危我安”的思维不是中国的一贯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决定了中国不会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亚洲的选择就是中国的选择，中国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风向，与国内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寻求同世界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永远做亚洲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三、探索亚洲未来发展的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愿意同亚洲各国一道，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合作中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继续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亚洲市场的建设。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实践中探索亚洲未来发展道路。

第一，坚持亚洲的开放性发展。亚洲国家应该继续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把握机遇，防范风险，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

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公正、自由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通过提高自身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争取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第二，促进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仅关系各国人民的现实利益，也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亚洲国家应同世界各国一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节约资源和降低能耗为重点的新兴产业。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意识，引导公众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

第三，推动亚洲的均衡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帮助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减少贫困，朝着全球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亚洲国家之间也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大力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融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培育亚洲市场，确保亚洲经济发展惠及各国人民。

第四，努力实现亚洲创新型发展。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亚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应该奋起直追，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创新投入，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转化，增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发达国家着眼于长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创新能力，为双方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亚洲各国人民，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本身。

最后我还想着重强调，维护亚洲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亚洲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相对特殊的地区，热点问题多发，而且起伏不定。突发性时间不断，一旦处理不慎，容易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带来冲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活跃，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部分国家的政局持续性波动，对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没有和平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亚洲国家应该从维护本国以及本地区良好发展环境的大局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大局。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切实增强相互信任，坚持冷静、自制，理性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矛盾、分歧和已发生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为维护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客观公正地做出判断，多促进接触对话，切勿激化矛盾做“火上添油”的事。

在座的各位都是各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对亚洲的发展有着不少精辟、独到的高见。希望各位在这次论坛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提出真知灼见，为亚洲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整理：巩辰卓）

◆ 亚洲的金融发展（2013）

演讲人：Hélène Rey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精彩语录】“将来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在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未来会有更多资金流入中国等国家，亚洲可能会面临更多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所以本次金融危机是一轮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兴衰更替，不仅仅是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亚洲的金融发展，主要着重于全面回顾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在中欧以及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影响。我希望在演讲中全面探讨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国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币在未来的角色。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现在已经度过了金融危机极其艰险的时期，这场危机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同时还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震荡。类似这种规模的金融灾难，要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的大萧条时代。2008 年，当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慌乱之中忙于达成协议时，一串串经济危险系数、商品和服务业数据以及经济增长指数暴跌，速度之快远超大萧条时期。当时决策者中弥漫着一种担忧，他们时常在各种情形下表示要制定一些宏观政策来应对这次大波动。当时各个经济体的增速下降了很多，全球贸易额以及亚洲出口总额也受到了影响。经过观察分析发现贸易增长、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危机中的资本生长关系紧密。当前的信贷增长、信贷流动、资本增长以及投机热潮都在危机中和世界经济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渠道。

当国际的流动性较强的时候，国际的流动性和投机潮都很盛行，而这两者都可能会突然大规模转移从而让股市崩盘或者给某些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掺入泡沫。在房地产市场，这种泡沫具有毁灭性。资本流在世界经济中游走，有时国际流动性很强，有时形成泡沫而后破灭，在房地产市场这样的泡沫更为常见。

银行放贷在这期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银行的贷款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有大量存款、私募基金的国家流入欧洲边陲特别是南欧各国，这些流动带动了当地的房产投资，增强了当地的竞争力，但是最终也会使它们走向崩溃。这样的兴衰周期让人回想起 1997 和 1998 年间发生在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出现了一轮由盛转衰的过程，先是房价飞涨和资本膨胀导致了通胀，最终汇率暴跌泡沫随之破裂，但是很多人的报价都是基于美元，大量企业也因此破产。这样的情形由来已久，已经重复上演了几个世纪，曾有书籍指出此次危机与之前并无二样，如今的资本流动、金融危机同过去八百年的荒唐金融史并无不同。

然而此次危机对于亚洲来说似乎有所不同。第一从 2008 年至今许多金融体系都接受了危机的考验，欧美地区尤其是在冰岛、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危机很重，而亚洲却幸免于难。第二危机的演化。97、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印尼等国持有很多外债，危机之前两国的赤字很大，资金流的大量注入使得经济发展过热。但是两国都是通过赤字向别的国家借贷然后用于消费、投资和购买更多房地产。之后房价骤然下调，大量资本外流，从而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归零或均化，汇率剧烈震荡，酿成

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这次亚洲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经过 97、98 年间的调整，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赤字都已经变成巨额顺差。在这一轮危机中新西兰调整最多，韩国、中国几乎没有任何调整。这充分显示了亚洲经济的坚韧性。信贷增长迅速使得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出现了泡沫，美国和欧洲作为信贷过度增长的中心影响很大，而亚洲却依然不受影响。

经常项目赤字是本国向其他国家的借贷情况的表现之一，借贷过多发展就难以持续。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资本大幅调整，外逃到美国、拉美等地，1998 年资本又相对往俄罗斯等国集聚。美国、某些欧洲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亚洲的情况却截然相反。所以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债务很多，而亚洲各国的债务则相对更少。

上述各因素汇综合起来导致亚洲在这一轮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在整个经济周期中仍然要密切地来监控信贷的增长情况以及资本流向。将来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在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未来会有更多资金流入中国等国家，亚洲可能会面临更多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所以本次金融危机是一轮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兴衰更替，不仅仅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本次危机暴露出各国央行只专注于控制通胀而未能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问题。解决信贷增长过快、资本流动放缓以及资产价格失控的问题，需要各国央行在发现信贷增长过量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时及早介入，对于正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如中国更应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体系能够进行持续的压力测试，央行就要通过波动来对金融中介以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监控。如果控制得当，通过适当的波动可以让资产负债表不因过度依赖资产价格上涨而难以抵御风险。发达国家的政府过去在这一点上做的不够，2007 年危机开始酝酿时，各国央行都忙于抑制通胀而无暇关注各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

这一问题对于中国、对于亚洲来说特别紧密，因为亚洲的金融业虽然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来说，亚洲金融业的规模相对世界还是很小。东南亚国家和印尼的银行业资产占的比重很低，亚洲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近来增长很快。目前亚洲金融系统的规模还不能和欧美相提并论，但是未来几年亚洲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与世界的关联性会越来越强。所以，各国央行应该要提前预警，避免重蹈覆辙。

二、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挑战

虽然现在亚洲市场在全球的比重还很小，但它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现在不管是外汇、股票、货币还是发行金融资产都要与当前主要国际货币美元挂钩。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美元就成为了唯一占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当某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壮大，并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例如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超越英国。更替国际货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商的货币很可能会取代原先的主导货币。依照现在的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到某个时间人民币可能会成为美元的挑战者。人民币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会遇到一些国际上的阻碍：第一，人民币的可兑换性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在自由贸易中，还不能自由地兑换人民币。第二，人民币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高效结算市场。第三，人民币在金融领域中的基础设施现在还很薄弱。由于人民币起点相对较低，离岸市场也才刚起步，而且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例也非常小，所以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多挑战。在伦敦的交易市场中，人民币交易占比非常小。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人民币确实处于次要地位。虽然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开始用人民币定价，但是数量还是很少。总之，人民币还没有做好准备挑战美元，但是如果打开一个更高效率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让结算便利化，特别向非居民开放，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非常令人期待。

这次金融危机破坏非常严重，时至当前依然如此，或许只有大萧条能与之相提并论了。通常新兴经

济体会更容易受影响，但亚洲避免了灾难的冲击，尽管不是毫发无伤。这与亚洲的现金储备和资本增长息息相关，按照世界经济当前的发展态势，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金融业将有很多发展机会。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密切监控市场，避免重蹈发达经济体的覆辙。只要人民币机制和政策变革得当，人民币一定能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整理：李超）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亚洲可能发挥的作用（2011）

演讲人：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精彩语录】“货币互持”是一个基本的设想。这不是危机的处理，而是日常就持有这些债券，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储备货币机制。”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也非常感谢能让我最先发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大家都认识到这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跟我们这次世界大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也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今天我想讲题目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亚洲可能发挥的作用”，想具体地提出一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现有的改革方案

现在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关于改革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基本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的方案，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方案是追求一种“超主权货币”。这样的一种世界统一的货币，通过统一的中央银行，自然也就消除了现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弊端，特别是一个储蓄货币需要一个国家大量发债带来的危险。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情，现在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就像把过去所用过的“金本位”体系作为一个参照系一样。“金本位”已经过时了，但是“超主权货币”还不现实，是未来的一个追求，因为它需要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才能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

第二个可选的方案就是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加强 SDR（特别提款权）的利用。这样的方案现在是可行的，因为 SDR 本身就是一个可行的机制，可以进一步地改革和扩展它，把它更好地利用起来。SDR 从 1969 年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直没有被真正地利用，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用特别提款权的时候往往是危机爆发的时候，因此这更像是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而不是日常的货币体系。从另一方面来讲，特别提款权最终要落实到各国的货币，它是一个篮子，最终要兑现并作为债务处理的时候，还是要落实到各种国别的货币。所以对 SDR 的作用、标准和功能还有待研究。

第三个可选的方案，是比较现实的，同时也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即“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形式。多元化使得人们减少对个别国家货币的依赖，减少对个别国家政府债权的依赖，使得货币市场上有了更多的竞争，各国的货币，更多的货币能够在里面有机会的话，就使得这个体系更加平衡。

二、从“货币互换”到“货币互持”

当然，现在的欧元、英镑以及日元在内的一些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储备货币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像：如果更多国家的货币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在近期内更多地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各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设想，即“货币互持”的概念。现在中国和八个经济体具有这种“货币互换”的机制，包括了和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体。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也是一个危机处理机制，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本国还债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机制马上兑现其所需要的货币来

应对债务危机。换言之，它还不是一个日常的机制，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从“货币互换”到“货币互持”，就是各国互相持有一些对方的政府债券，就像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买美国的债券，还有马来西亚、泰国的债券等等。如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机制：根据各国的贸易量，比如说互相进口量的一种比例，持有一小部分，起初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持有，可能相对少一点，因为储备货币原始地讲就是为了在贸易上有一定的信用。比如说我们亚洲的邻国之间持有对方的债券，从而使对方的货币至少在很少的比例上成为了“储备货币”。各国通过相互之间持有一定的储备货币减少了对其他货币特别是美元货币的依赖。

三、“货币互持”的优点

“货币互持”是一个基本的设想。这不是危机的处理，而是日常就持有这些债券，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储备货币机制，这样做的好处就有以下几点：

最主要的是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由此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改革做出局部性的贡献。其他的还有一些派生出来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都知道，亚洲有很多货币机制，包括我们有的储备基金、货币互换机制，还有清迈协议。清迈协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几年这方面是比较滞后的，这就需要亚洲各国之间相互地对各国发行本地的债券，然后债券市场就能够形成了。之所以大家能够互相的持有债券需要债券有一定的流动性，也需要市场通过其机制对它的风险有一定的判断。大家有一个对债券市场的需求（现在是没有这个需求），尤其是对政府债务市场的需求。对流动性的需求使得债券市场得以发展起来，一旦债券市场发展起来，除了政府持有之外，私有部门也可以参与进来，尤其是对于定价机制的形成产生推动。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促进大家对相互的宏观经济状况和发展政策的关心，从而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在宏观经济稳定上、金融稳定上相互配合，进行政策的协调。但是大家的利益相互隔开了，需要发展一些真正深入的关心。当你持有对方债券的时候，就是变成了债券持有者的时候，对这个债券的价值和各国的风险，特别是主权债的风险就更加关心和关注了，这时候大家就有这个意愿来做政策协调，在货币政策和整个金融发展的政策上，一体化的进程也会进一步地加快。同时，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我们大家的货币都成了一定的主权货币，可能我们的发展比较落后，在很长时间内达不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参与到货币体系的改革当中。当然，这种方式不一定会导致“亚元”，我非常同意崔再源先生的话，我们亚洲的市场今后非常大，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思考，从自身做起，为亚洲和世界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体制改革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一个大概的想法，这个想法有许多的细节，这里没有时间多讲，我提供了英文和中文的论文，大家有兴趣可以请组委会发给大家。有许多方面的考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政府的推动：债券市场互持的时候，需要政府的意愿。各国的配合和协议，可以是多边的，可以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各国共同形成的一种协议，也可以是双边的，就像货币互持一样，是双边自愿达成的协议。现在有一些国家表示愿意持有人民币的债券作为储备货币的部分，但是我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往前走需要大家在这个领域的共同努力，共同分享市场繁荣的成果。而且，大家联合起来力量可能会更大一点，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像这次亚洲一些国家讨论是不是共同推选一位 IMF 候选人的时候，我们联合起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声音，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货币持有，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对现代体系的改革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的想法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整理：巩辰卓）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影响（2007）

演讲人：Vishakha Desai（美国亚洲协会主席）

【精彩语录】“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如何来创造一个新的亚洲共同社会的这种可能性，处理好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强大的力量，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他们在亚洲地区的重大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和你们来交流一下中国崛起以及它对于建立一个亚洲联盟的影响。我在各方面做过研究，但是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可以谈一下亚洲内部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

一、中国和印度经济崛起的影响

美国人非常关注亚洲的发展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印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的影响，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我想谈一下中国和印度经济崛起的影响。

最基本的一个全球现象，那就是亚洲文化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占有世界上人口比例最大的文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到了 2050 年全球 50% 的人口可能要经历一个巨大的经济变化，尤其在中国和印度。从殖民主义退居之后，在 2050 年这个现象将更加凸显。我在芝加哥率领我们的亚洲协会做过很多调查。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位的经济力量，至少是有可能的。他们的经济变化非常重要。很多人仍然相信美国将会维持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但是这两个国家将会开始在亚洲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方面，能够对东南亚地区在也许包括贸易、软能量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印度还是非常有创新历史的，它对于东亚的一些政策和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作用。亚洲大多数国家正在崛起，而中国的角色往往是更加广泛的。

二、如何建立亚洲共同体

现在我要谈一下，如何建立一个亚洲的“社团”，并且在这里面中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是要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活状态，互相依靠的经济环境。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平等的、融合的生活环境，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才能使得我们继续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可以成为现实的借鉴，所以说我也喜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历史上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一点启示，那就是我们亚洲社区将以什么价值观为基础？我们的哲学家、学者在各个方面曾经讨论过，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亚洲的 共同社区。他们主要是建立在一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些资源，包括贸易方面的一些交流，使得能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共同的社团。这也是基于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而诞生出来的。当时只是一个政治的想法，却没有地理上以及政治上的根据，但随着历史的变化事情发生了改变。

第二部分 中国

中国正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和影响 着世界。21 世纪的前十五年，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但也遗留下很多问题。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新常态”的中国，正在曲折中摸索前行。

早期的哲学思考阶段是在六世纪到八世纪，当时的印度和中国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交流、合作。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唐朝的皇帝想要了解关于印度宗教的东西，玄奘就是为此产生的一个代表。东南亚的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等国家，也都需要这方面的资源。所以说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互相依靠、互相学习的关系。中印之间甚至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直接的权利关系，而更加是一种商贸上的关系。我们在皇室上面当时有一些联系，然后在贸易上同时具有联系，所以说两国就有互动的历史。所以说，我们认为亚洲极有可能形成一个亚洲共同体。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学者和专家说，你根本就不能够谈论这样一个亚洲共同体的事情，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亚洲是有可能走到这一步的。在全球很多组织性的研究机构调查下，我们发觉了很多的报道。那就是在西方力量侵占之前，印度就有很多关于建立共同群体的现象。他们并不在乎要让自己的力量成为全世界第一位，相反，他们非常愿意去融合一些新的文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调节这样一个国际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比较承认，如今阻碍我们建立一个共同团体的壁垒，因为这是由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决定。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民间的一些关系，它存在相互依赖的现象，但是也存在一些壁垒。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在以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相对日本来说已经对世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也对美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东南亚、东亚这一块地区还是有很多可以互动交流的。

但是这些东西自然会导致一个所谓的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最近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亚洲经历了很多复杂的历史，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不会被人们快速遗忘的。我们可以回到 500 年前，1000 年前。我们记住的总是最近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走到更远，回到更久远的一天，我们会发觉情况是不同的。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如何以史为鉴，来建立一些政治方面的联系，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应该在领导方面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和决策。我们必须加强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我们要超越历史，要摆脱历史对我们的完全束缚。其实这就是尼克松当时所做的历史活动——访问中国带来的相似影响。

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如何来创造一个新的亚洲共同社会的这种可能性，处理好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强大的力量，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他们在亚洲地区的重大影响。如何让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人民互相了解彼此。在过去的 15 年间，几乎我们之间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美国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每一天大概有 20 次航班去美国，上海是这样的，这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未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美国未必是我们东南亚以及东亚国家之间联系的一个必然的桥梁。美国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可以自己直接联系，完全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共同体。我们能够达到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种希望，经济上的互相依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整理：邵熙）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人与文化实力（2012）

演讲人：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精彩语录】“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加强中国人的发展，加强中国经济从增长为目的，向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转变。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现在大家都在很热烈地讨论，主要是怎么样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我记得六七年前当 SK 决定赞助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主持一个论坛，在北京叫北京论坛，主要谈论政治问题；在上海搞一个上海论坛，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我曾经对复旦大学的校领导讲，我说你们一个大学搞一个上海论坛，在上海能不能通过，我都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大学居然把自己主办的论坛叫上海论坛，现在看来复旦大学做得很好，今天韩正市长亲自光临，说明你们这个论坛叫上海论坛也算正统。所以首先要祝贺我们复旦大学能够主办这么一个好的论坛，一个好的国际论坛。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标准与方向

今天我想讲一下经济转型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讨论未来十年亚洲的经济战略。讨论未来十年的经济战略，当然也可以讨论未来十年的能源战略、人口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等等，但是我认为在讨论未来十年战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讨论亚洲经济转型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今后十年的核心，那就是经济转型。因为在过去十年，确实中国和亚洲的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取得了重大经济项目的进展。但是确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实现经济转型的问题。谈到经济转型，当然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很多的转变。这些转变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经济的增长从更多地注重数量到更多地注重质量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变；经济的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制造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共同发展的方向来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为动力到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企业的发展来讲，从一个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模式，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大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变。所以说中国经济转型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就是怎么样从一个以增长为主要目的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从这样一个角度衡量，我就觉得中国经济转型是不是成功，我看主要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更加充满活力，另一个社会是不是更加稳定和更加和谐。所以归根到底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一个是民生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可以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从以增长为目的，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主要是在 2009 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民众都在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从经济总量上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从总体上来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我们正在讨论什么时候中国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一篇报纸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三个什么时候：他问我们中国，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中国的品牌，而不是美国、欧洲的品牌。所以这三个问题当时看了以后确实像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对于讨论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使得这样一个问题变得非常非常地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感到这三个问题确实打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就是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能够从软实力方面真正地和自己的硬实力匹配，从而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文化实力与人的发展

我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加强中国人的发展，加强中国经济从增长为目的，向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转变。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现在大家都在很热烈地讨论，主要是怎样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方面，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做出努力。

第一从实体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的载体方面，我们能不能有更大的发展。最近中国一直在抓文化产业，实际上在抓中国文化的实体，中国文化物质的形态。所以我们能否产生更好的为全世界所接受的电影、音乐、书籍，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为全世界的精英所能够羡慕、尊重，以至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更多地送到中国来学习。所以中国要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第一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教育产业，这一点我想把它作为实体的文化，或者说文化的载体。

第二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文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文化主要是怎么样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很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以市场化作为目标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越来越感到，我们在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文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依然看到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这样一个主要目标远远没有达到。现在国家对于资源的分配和控制越来越强，从土地资源到资金，到各种各样的经济的资源，国家在分配这些资源的时候，仍然起到一个主导地位，市场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主导作用；第二国有企业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高度垄断，所以使得其它所有制企业在经济发展的空间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第三政府的行政审批不仅没有大量的削弱，而且在最近几年有强化的倾向。这使我想到我们在中国入世十年的谈判当中，最脆弱的就是怎么样消除政府的力量，当时我们想我们入世是否取得一些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正在丧失。所以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方面，怎么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在实现经济转型方面以文化为主要核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体制的文化。当然这样一个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有一个诚信体制来支撑。而社会的诚信体制所出现的问题更使我们感到担心。因此我们在建立一个文化的体制方面，确实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建立适应经济转型的价值观，非常赞成刚才崔泰源会长讲的价值观的问题，这是实现经济转型的核心之核心，如果没有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来支撑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很远。所以培养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应该是说我们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培养有文化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复旦大学这样一些优秀的学校里面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但是这远远不够。一个有文化的人不是说他有了大学的文凭，他有了硕士、博士学位，他就是有文化了。有文化的人必须是有一个真正的拥有核心价值观的人，有文化的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做好：

一是他知道怎么样正确地对待自己；也就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对自己会是自信、自珍、自律、自强的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民族来讲，他就是一个有自信的民族，一个自珍的民族，一个善于自律的民族。

二是他怎么样对待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能够以一种谦恭的态度，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一种爱的态度，去对待周边所有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谦恭的态度、一个包容的态度、一个充满了友爱的态度，一个慷慨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周边的民族、周边的国家和全世界的国家。

三是一个怎么样对待周围的环境，他是否以一种顺应客观规律、顺应市场价值的规律来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作。他能否顺其自然，而不是和自然对抗。他对全球的环境是不是像珍惜自己的环境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培养一个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时，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批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真正培养一批有文化的人，那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也会建立在一种被人尊重的地位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是一个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同时我们中华民族又是一个谦恭、对其它国家充满了热爱、包容、理解和慷慨的民族，如果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对整个环境是采取一种珍视整个环境，保护所有环境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会得到大大的提高。所以我说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当然必须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制，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培养我们中国一批具有受人尊重的价值观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上海论坛应该着重在这样一个方面的讨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崔泰源会长和韩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在一个学校的基础上，来举办论坛，因为学校它的根本任务毕竟就是人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海论坛如果能够坚守这样一个以人的价值，以人的培养，以人的发展作为它的核心理念，那么我们上海论坛就可以区别于其它论坛，而且在和全球最好的论坛，包括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所谓的竞争合作当中，能够显现自己独特的力量，独特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我们以一个上海最有名的大学作为主办方的这样一个论坛，打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集中讨论人的发展问题。

当然人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经济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探索人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只要人的发展问题解决了，国际关系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如果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人民相互之间都有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一种慷慨和关爱的态度，国际关系可以处理好，最困难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处理好。但是如果缺乏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如果是把所有的国际关系仅仅建立在一种纯粹的利益基础上，或者说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基础上，那么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关系就很难建立。所以从我本人来讲，我对于上海论坛是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上海论坛能够不愧于全球最知名的大学举办的论坛，这种论坛才能够在全球千千万万的论坛当中独树一帜，发挥自己最基本的品牌的理念，从而使上海论坛办得越来越好。

最后我祝上海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整理：杨军）

◆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挑战及应对建议（2012）

演讲人：Paul A. Volcker（美联储前主席）

【精彩语录】“整个（经济）大环境应该有更多的保护制度，目前看到一些应对的措施，可能是政府管得太多了，如果是银行发现问题了，政府就提供资金，提供贷款来救助他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功能保护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对我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在闭幕大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主旨发言，我认为我们在过去三天的日程安排和讨论是引人入胜的，同时我也非常热衷于大家所探讨的话题，我也期待着对我们探讨的全球面对的这些问题，能够在未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我相信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非常喜欢我们上海论坛的日程安排，同时也非常喜欢来到上海，在过去的几天，我在上海也是过得很愉快，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 1990 年，大概是 30 到 32 年前了，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上海和如今的上海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上海所取得的进步让我感到啧啧称奇。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其实在中国各地都取得了很大的一个飞跃和发展，我认为中国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取得的进步是值得关注的。现在中国从全球的经济角度来说，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这一点大家非常熟悉。同时，我们在上海论坛也涉及到不同的议题，这些议题都是广受人们关注的。中国从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过去的 30 年与日俱增，同时在最近的 10 年到 15 年，中国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所以，这些经济的发展也表明我们中国确实有很好的活力。同时，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现在也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到全球的框架当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对全球一体化框架下的参与，推动出口，参与国际贸易，并且从西方国家引入一些技术。基于这种对全球活动的参与，抓住了这个机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此时此刻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带领着其它国家，希望能够继续再接再厉，抓住一些新的机会，承担一些新的责任，并且应对一些新的挑战，进一步发挥中国的领导力。

一、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现状：困难和挑战

我这边花几分钟的时间探讨一下全球目前的现状。总的来说，过去的四到五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体量也越来越大，全球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很好地审视金融危机的原因。现在，对于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带来了影响，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的经济也继续在发展。中国其实已经完成了新兴的过程，我们要把中国称为新兴过程完成之后的经济体了。对我来说，包括对在座的各位来宾来说，亚洲，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南美在全球的经济版图中不断在获得更大的地位，西方国家确实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带领着世界经济发展，但是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扭转，不是发扬光大，而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带领着全球经济往前走。并且，

帮助各个国家尽可能好地应对全球面对的经济危机，我也希望就这一点作稍微的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发展的成熟度来说，其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伦敦、纽约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通过现代的一些发展，华尔街，包括西方的一些金融市场也设计了非常复杂的衍生品，不同的金融衍生品和工具在 15 年前并不存在，但是中国现在还是专注于传统银行业的一些业务。你看最后的结果是传统的金融银行业务，特别是中国大规模的一些银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表现的比那些西方的所谓契约衍生品支撑的交易体系要更好。当然，我们在西方也学习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同时中国也可以汲取一些经验。我们从中国所汲取的经验就是不要盲目地遵循伦敦、纽约的实践，我们要考虑到复杂性、透明度缺失、风险承担，西方的市场有以上的属性，结果他们不是促进了增长，而是阻碍了增长。如果你回到 15 年前，当时亚洲也面临着相似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亚洲的各个经济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日本，包括东南亚、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90 年代这些亚洲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危机，我相信正是那个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经验，现在以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传统方式，不断地积累着外汇储备，你看我们在建设这样一个栅栏，保护我们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西方世界是相反的操作，西方世界在创造着脆弱性，积累着这些弱点，西方需要学到亚洲 15 年前的教训。

对于亚洲危机我也有一些观点，我认为当时中国仍然保持沉静，从而支撑了亚洲从危机中走出来。除此以外，我们也要记住，对于人民币的价值，大家也是颇为关注。所以，对于亚洲的危机来说，当时中国对于人民币的坚挺做出了承诺，基于中国的支持和贡献，也帮助亚洲慢慢去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的贡献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后来慢慢关注到了国际货币体系，当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在上海论坛的讨论中也对此话题有所触及，包括西方与亚洲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视角进一步往高层推。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可以看到，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但是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另外，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大很多，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强度现在也与日俱增，我们看一下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中美）有什么区别，我们有着鲜明的对比，美国生产产品的 70% 都是国内消费，美国的消费超出了产量。相较之下，我们看一下中国对 GDP 的分析，中国国内大概对总的 GDP 内需有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不过消耗量是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中国其实也做了很大的投资，另外，中国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的贸易顺差，中国喜欢出口，美国喜欢进口和消费，这可能正好是天生一对：中国出口、美国进口。在最近十年，你看美国的消费比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平衡点多了一个五万亿。当然，美国有美元作为硬通货去支付，中国通过生产、出口去获得外汇。另外，我们也分析了两国的利率水平差异，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做了美国想要做的，中国做了中国想要做的，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有很大的顺差，美国有很大的逆差，中国生产产品并出口，美国把产品进口。对于这样一个格局，很多人不想做任何的调查，正因此现在遇到了问题，因为这种格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对于中国来说，不可能一直运行下去，对于美国来说，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财政赤字下去。这样的话，问题不断深化，美国出现了问题，中国也要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一直进行出口，中国也不可能一直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因为中国也有其它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为什么我们要让这样的格局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十年之前，当时我们在美国有 6 万亿美元，在国外投资，中国希望把这些美国所发行的资金全都吸纳过来，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希望能够继续进行出口，所以当时已经预见到了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来打破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两国都可以看到房地产有投机的现象，在美国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在美国房地产的投机行为造成了现在的经济泡沫破灭。在上海论坛，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些问题，在论坛当中，大家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

在这样一个探讨之下，我们也是很好地讨论了接下来应该如何做一个变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能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比如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也遇到了汇率的问题，现在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汇率其实对各个国家相互都会造成影响，如果各国的政策不统一、不协调、不一致的话就会出现問題。

二、面对经济挑战的建议

关于解决方案，我不是单方面要教你们，我只是一个建议。应该说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相信这个挑战对全世界都是如此。其实我们在上海论坛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第七主义”的说法，我们也是探讨了亚元，还有关于亚洲地区化的话题，我觉得这些话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绝非易事。探讨之后，我们也发现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們进行解决，在这里，我想关于金融危机再做进一步的介绍。与此同时，欧洲、英国也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型的银行也遭遇了问题，包括一些证券公司都遇到了问题。在危机到来的时候，2007 年、2008 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复杂的金融体系顷刻之间崩溃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度还是在不断地继续，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注入到经济体当中，支撑这些金融体系发展，这些钱投入到美国、欧洲，继续发展，作为这些救援的基金来救助这些大的经济体。当时我们也有争论，我们觉得大的金融机构不应该依靠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样的话，今后会遇到更大的问题，那今后怎么办？所以我们也是探讨了金融体系应该是提供相关的一些保障，来促进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关注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欧洲议会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座的各位也是了解很多很多的金融机构、金融体制需要做一些调整，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做相应的调整。这些商业银行把你的钱吸收过来，商业银行以前拿了你的钱之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进行了很多的支付交易，但是这些交易都是由大型银行所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关注这些银行的体系。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的银行，还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所以中小型企业其实也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全新的体系当中。所以，整个大的环境应该有更多的保护制度，目前看到一些应对的措施，可能是政府管得太多了，如果是银行发现问题了，政府就提供资金，提供贷款来救助他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功能保护起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只保护这些大型银行，其它的这些企业怎么办？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现在有很多其它的金融工具。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关注几家，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投机性的投资，我们应该要保护更大的其它的利益群体，全球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衍生产品，完全都是一些人造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反映出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衍生品非常流行，而且可以很容易进行交易。全球的衍生品交易加起来可以达到 700 万亿美元的规模了！在真实世界当中，这样一个流动量，这样一个规模体量实在是太大了。其实在十年前，这些金融产品可能还不复存在呢，比如说我们的违约掉期办理。这时候你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它的一个设计就是希望能够保护公司，但是你要知道它当时希望如果出现违约，由保险公司来买单，所以把保险公司也纳入其中。十年之前还没有金融衍生品，而现在达到了 700 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资金是希望用于商业贷款、商业交易，提供这些保障，全球贷款的规模还不到 10 万亿，你可以看到金融衍生品的贷款体量比真正的贷款体量还多出 70 倍，不仅是保险加入其中，很多人往返做这些交易，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这些保单可能又通过其它的途径进行交易。

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体系的崩盘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由这些衍生品所导致的。对于欧美来说，在这方面过于提出了衍生品设计，所以在体系当中，我们也是考虑了应该进行结构化的调整。但是结构化

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我认为参与这些所谓的衍生品商业银行应该杜绝这些现状，商业银行应该维持自己本身关键的职能，而不是做其它的风险性交易。现在美国其实也是颁发了法律，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限制了一些商业银行从事交易。欧盟也是在讨论相关的问题，当然欧洲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以及对于中国、日本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亚洲并没有大量的银行参与到这样的衍生品或者投机的产品。你看美国、欧洲有很多的衍生产品，比如说自我交易的产品，我觉得对于亚洲来说，你们应该维护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如果你们能够继续保持基本职能，我们觉得可以继续发展。这样的话，你的结构可以更加简化，对欧美来说也会有商业银行简化的过程，这样可以维持自己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除了银行之外，其它的行业也应该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些行业，可能看起来赚了很多钱，但是也有更多失败的例子。可能一开始的话，某些银行的失败没有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主要是有商业银行这些风险的交易，如果有一个防火墙就可以有好的发展。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全球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金融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其它的问题。在上海论坛当中，有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论坛中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在探讨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全球的角度进行探讨，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我们不可能各自为政，我们也讨论了除金融之外，还有贸易的问题等等。

对于中国来说，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规模，也应该是关注所有其它的问题，各国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各国都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一个和谐的全球关系。

未来的三十年，我不一定一直在这边，但是我可以想象出来，三十年之后上海和以前相比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化，上海在不断地蓬勃发展。中国的繁荣昌盛和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和谐关系，我相信美国也能够解决自己本身政治上的问题，我也希望美国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加和谐的全球货币和贸易关系，相互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大家也可以更好地携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决老龄化等等問題。

我这边探讨了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全球的想法，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整理：杨军）

◆大政府、小政府，还是法治政府（2011）

演讲人：吴志攀（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精彩语录】“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并不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而是从人治的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的问题。”

大家好，非常荣幸在上海论坛闭幕上发言。借此机会，我代表北京大学对上海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我在这几天的开幕式和分论坛的场合中，聆听了各位的高见，受益匪浅。我下面想跟大家汇报一个题目，就是“大政府、小政府，还是法治政府”。

一、“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 30 年，这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在这 30 年的发展，不仅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解释中国这个现象，如何判断中国未来的大的发展趋势，却仍然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他们自信的宣称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我本人也赞同“中国模式”，我认为中国现代化之路确实不同于既有的西方模式，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准确的在理论上解释“中国模式”，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正像著名的诗词中所说的那样，“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是否定现代化的可能性。中国尽管再特殊，它的发展也要融入到整个世界发展的主流的。过去 30 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负责任一员的历史。还有一部分学者，比较多的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奇迹”，他们否认“中国模式”，反而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某些成就，无非是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而且由于中国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与西方存在着根本不同，所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秩序是一种威胁，并且这种发展也并不是可持续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中国崩溃论，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经常听一听带有批判、批评的负面的意见，对中国人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总是讲居安思危，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没有一种谦虚谨慎的学习精神，没有一种敬畏历史、敬畏传统的慎重态度，那么肯定是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

二、大政府和小政府之辩

我非常的关注围绕中国模式的种种争论，并且从中发现，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庞大的资源，政府能量极大。支持者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能够实现最有效的动员。而且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不为哪一个集团利益，哪一个社会阶层服务，它能够长远的服务最大多数的人民。反对者则认为，政府是管得太多太细，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会造成浪费，孕育着严重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严格限制政府，要做一个“小政府”。“大政府”的优势，我想在座的各位中外学者都有

非常深刻的感受，比如说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 年中国的国情 60 周年的庆祝活动，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 2011 年的广州亚运会。这些活动都非常成功，而且这种成功不单是靠花大钱就能买来的，还必须要有周密的组织能力，各部门、各地方、甚至是我们每个市民、国民都要配合。这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一种表现。再比如说，汶川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我们只用了 3 年的时间，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都算是一个奇迹吧？这都是“大政府”的功劳，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所必需的。

我们必须承认，大政府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特别是警惕一些政府部门自己形成的“集团利益”。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呢？过分的国进民退不可取，同样的过分的国退民进也不行，掌握政府手中的资源搞小政府，并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三、我们需要法治政府

我认为当前并不是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上展开讨论，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法制政府的问题。法治政府就是限制政府的问题，这样的政府还是强有力的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法治政府是强有力的政府。看一看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他们可以说是法治政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权威、有效力的政府，他们的权利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掌握的资源也是巨大的。即使是在西方所标榜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他们的政府事实上也在不断的变大，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具体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个既强大、又法治的政府。什么是法治政府呢？我想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过程当中，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是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从开始到最后，不需要私下去拜见政府官员，不需要到处的找门路拉关系，所有的上市工作都是专业化的中介公司完成，文件经过披露和公开之后，就可以通过程序上市，这样的政府就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再例如一个国家，如果是经济上的交易都通过了合同来表达，这些商业合同都能够被执行，如果有企业不执行合同，就会立即因为失去信用而被市场淘汰，或者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有人敢拿自己的信用开玩笑，政府把维持市场的秩序看成头等大事，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再比如一个地方的大街上，除了消防车和救护车，或者是执行警务任务的警车，没有任何的车辆敢于闯红灯或者是违章行驶，这样的政府就称之为“法治政府”。

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我想举的例子还很多，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法治政府就是能够理清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法治政府可以掌握的资源很多，这些资源应该是用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其他的方面，做到这些这样的政府不妨越大越好。我们今天都在警惕大政府的弊端，其实中国是比较缺乏大政府传统的。在传统的政府，中央政府所汲取的税收，只是国民总产值的 5%，现在的国家一般的比例都超过 20%。我们政府虽然是规模大，但是管理未必精细，比如说不久前北京故宫发生的盗窃案件，就让我们惊诧不已，大量的人力物力保护的国宝重地，让小毛贼轻松窃取了，让我们非常的惊诧。不仅仅是领导们的责任大、压力大。一把手可能是精英，即便是精英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是一把手打了瞌睡，就会出现问题，一把手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将帅无能，累及三军。如果是在管理的效能和法制化上来讲，在科学化、规范化上来讲，中国的政府不够大。中国政府不要怕它变大，而是怕不够大。中国的政府是怕它不讲法治，法治的政府才最有权威，才能维护好中央的政令畅通。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的总结我的观点，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并不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而是从人治的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的问题。吴邦国委员长宣布

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政府现在转变职能的关键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下，早日的建成完善的法治政府，谢谢各位！

（整理：邵熙）

◆从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中国的政治模式（2011）

演讲人：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精彩语录】“我总结的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六个字，三个词，第一个词‘开放’，第二个词就是‘竞争’，第三个词‘参与’，这三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开放’非常的重要。”

大家好，我今天想谈一下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刚才吴志攀教授介绍了中国模式的看法，我非常的同意。这两天我也去各个会场去听，也有讨论中国模式，我想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你是否面对它，它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我今天的题目很大想集中的讲一讲中国的政治方面。我是学政治学的，我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的政治模式。

一、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从中东、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茉莉花革命”以来，很多的记者问我，中国的记者和西方的记者都问我，问我中国会不会发生类似于阿拉伯世界发生的“茉莉花革命”的事件。我说不会，中国是权威整体，跟阿拉伯的整体不一样。我想为什么不会发生？我想这个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好，一般的概念也无法分析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我需要举两个例子：假如说，比如从邓小平以来，中国已经开始慢慢的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功劳。比如邓小平先生推崇领导人推举制度，这跟中国以前的政治体制不一样，跟阿拉伯之间的不一样，也跟西方的不一样，当然它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些好处。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了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基本上都是两任，就是两任十年就要下去了，不管你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受人欢迎。朱熔基总理是非常受人欢迎的总理，他到了任期就得下去。这个实际上在总统制里面的限任期，美国的总统是限任八年，所以中国是没有西方的一种民主的形式，但是是有西方的一种制度的形式。对于中东阿拉伯世界是不一样，尽管也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是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像埃及的默巴拉克，一个人统治了20多年，一个人在台上待了几十年，没有人会喜欢你，中国的限任制有效的避免了这种缺陷。还有中国的年龄限制，中国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官员和级别都有年龄的限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从新加坡的观点来说，中国是太浪费人才了，你一到35、45、55、65就要退下来，这样太浪费人才。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正面的效果，我统计了一下，每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官员退休，也有千千万万的官员进入到这个政治体系，这样的制度也有它的好处。我们经常的看到美国的国会议员一进去就是几十年，都半个世纪了，在中国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大量的官员每年进入到政治体系有它的好处，这些新进入的官员，可以代替得更紧，这个非常的重要。新加坡这次的李光耀这一代下来，就是有代际的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考量比任何国家都要重要。

关于中国的代际关系，有人批评新加坡是家族政治和王朝政治，也有人批评中国是这样。我个人不同意，可能政治家族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如美国的民主里面就有很多的政治家族，像波斯顿和肯尼迪，还有克林顿家族，这些都很强。英国也是这样的，当然英国都是贵族世家。而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家族政治，

比西方的很多类型的政党的制度要广泛得多。中国的政治模式是有强大的政策上的动员能力，在理论上说，西方的多党制可以调整政策比较好，反对党上来之后，新上台的执政党不用背前面的执政党的包袱。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西方有一个忠诚的反对派的说法，现在这个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样的政治调整就比较慢。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执政党，从 80 年代到这个世纪，中国的政治变化是非常快的，重大的政治体制的调整非常的及时。虽然现在的政治体制调整有困难，但我个人相信，一旦是共产党的领导，一旦是有这种坚强的意志力的话，这种调整是可能的。

二、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开放、竞争、参与

我希望概括一下中国的政治模式的特点。我想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模式批评或者是喜欢也好，还有未来的发展也好，很多的思考中包含的理想主义的成份比较多。未来的中国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不应当大家是空想，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自己本身的。以及应该是像我们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所说的，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我总结的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六个字，三个词，第一个词“开放”，第二个词就是“竞争”，第三个词“参与”，这三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开放”非常重要。

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就是开放的文明，如果是封闭的宗教文明，那就是不开放的。比如中国人民非常成功的吸收了佛教文明，或者一些犹太教的朋友问我，犹太教的民族文化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到了中国的文明里面就被中国的文明所吸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开放性，中国的文明并不是一个宗教文明，而是吸收文明，擅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好处。中国的模式认为没有什么是没有好处，其实就是恰恰的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色，擅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好处。文明是开放的，另一方面的开放，是政治上也要开放。中国共产党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政党，向各个社会群体在开放。西方的多党制，是左一点，右一点，代表了不同阶层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共产党是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开放。我记得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共产党的目标是为了消灭资本家的，但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就是 90 年代成功的实行开放制度，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大家好像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向各个社会，新兴的各个利益进行调整。

第二个概念，我觉得就叫做竞争。竞争非常重要，在中国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重要。经济学家讲竞争，政治方面也要讲竞争。竞争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竞争，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我看日本的经验，新加坡的经验，觉得中国的竞争性的政治一定要把中国自己的传统跟西方的传统，西方好的方面相结合。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就是贤人政治，选拔制度。而西方是什么制度？光有竞争。如果光有竞争，从西方的民主发展历史来看，基本很难保证最好的人被当选，也不能被避免最坏的人被选举出来。中国我觉得有它的好处，传统的把选拔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日本的自民党做得非常不错，新加坡的 PAP 也是做得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政治制度，我觉得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习惯。

第三点是参与。社会的参与非常的重要，没有开放，社会的参与没有可能，没有竞争，社会的参与也没有可能。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的成功，也是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在做的参与，各个不同的层次也在做，向西方学习也在进行。在各个地方，对自己党内的公推公举，各种形式都在做。一个政治制度怎么发展，还是要自己首先开放，学习其他的政治制度的好处，同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只有一个政治制度符合自己的文化，这个政治制度才是有好处的。正像刚才的这位先生骂的我一样，现在的社会是非常分化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制度最好了，比任何的制度最好。自由派完全

的不承认有自己的东西，中国的模式不应当有自己存在的根源，应该消失的。在左派和自由派非常分化的情况下，很难有理性的讨论，这是对中国的社会整体的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我是觉得不好的，都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学者，对这些方面，各个方面要有理性的思考。我自己觉得，中国也是可以组织一个自己的比较有特色的政治模式的道路来。

（整理：邵熙）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2013）

演讲人：方星海（时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精彩语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既是风险，又是机遇，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只要我们把风险想深、想透，制定合理的处理措施，再加以政策引导，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会迎来跨越式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局面。”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欢迎到上海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世界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因为国际性危机而减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讲到中国，当把它放到国际视野下，我们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只是专注中国问题的话，那可以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最近我们经济当中就有一些增速下滑的各种各样表现。比如说 1 ～ 4 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多年来首次同比下滑。5 月份中国的汇丰刚刚公布的中国制造业指数也是首次下降。我最近借调到北京去工作，在北京工作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很担心的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像在座的外国朋友，如果到北京去的话，特别是冬天去，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担心。还有中国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最近的报道，环保上有一些大的项目要设立，当地会有一些游行、反对的情况。这么大的国家总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如果说我们专注机会，专注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能够做的，而且其他国家不容易做的，或者不能做的事情，也可以发现是非常的多。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这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机会”这样一个题目下，专门谈一些当前中国能够做，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或者根本不能做的一些事情。

一、中国当前的优势

以下我从八点来谈，前四点是跟中国的开放有关的：

第一，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对外开放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大家可以说一说各行各业，比如说汽车、化工、电梯、金融服务等等，就是从增量市场上来看，所有这些行业中国现在在全球基本上都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它的结果就是在任何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无论你是在制造业领域还是在服务业领域，它都不能放弃中国的市场，如果说它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输掉的话，很难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这样的一种有利地位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来到中国的市场，但是它要在中国的市场上获胜，必须把它的新技术、新研发力量和最好的制造业技术放到中国来。否则它很难在中国的市场上获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若干年前可能二流的技术在中国也会获得很好的市场，但是现在很难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车 GM，大家知道通用汽车最高档的凯迪拉克，那时候不见得有多好，是一款很受美国年轻人喜欢的车，当时我也正在美国念书和工作。但是在中国，日本车却比它更受欢迎。凯迪拉克在中国的高端车市场上跟奔驰竞争，跟 BMW、保时捷竞争，它就必须把它最新的研发技术都放到上海来，它的总部在上海，现在它的生产也在上海。这样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对本地区

的需求作出反应，设计生产出更适合本地市场的，成本更低的，在中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的汽车。我相信这样的趋势在其他的一些行业也会发生。这就是中国的很大优势，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有些企业研发还上不来，但是可以通过对外开放，通过国内最大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环境，促使技术领先的国外企业把最新的技术放到中国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中国能做，其他的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中国现在的企业到海外去参与收购兼并，包括跟其他企业做合资，我们都有很多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有的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拥有的，这个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这就使得很多国外的企业因为中国的市场大的原因，愿意被中国的企业兼并，或者跟中国的企业形成一个很好的战略合作。然后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比较大的份额，利用中国的市场份额赚得的钱反馈它在全球的竞争，有助于提高它在全球的竞争力。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沃尔沃被吉利兼并，大家知道吉利是中国比较小的汽车公司，那么沃尔沃为什么愿意被它兼并呢？我想就是因为吉利是一家中国的汽车公司，兼并以后沃尔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可能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在中国赚的钱有助于沃尔沃在全球跟 BMW 竞争。如果吉利不是中国的汽车公司，而是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公司，再看沃尔沃会不会卖给吉利，我相信是不会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本身不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的资金实力非常强，我们的收购兼并在海外做的已经得到国内的银行支持。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敢说在服务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在资金量上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再一方面是中国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发了一些适合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适用的技术，所以他们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去收购兼并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技术很适合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很有助于他们在国外获得收购兼并的胜利。例如国家电网的例子，国家电网公司这五六年来在世界上做了十几桩应该说也是规模比较大的收购兼并，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葡萄牙、巴西等，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技术非常适合用这些，特别是像菲律宾、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第三，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等，还有一些消费通讯方面的服务。这个服务业行业中国市场现在机会非常好，而且特别大。如果我们对外开放的话，相信国外最好的服务业企业都会到中国来。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谈到，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叫中等收入的阶段，服务业方面的需求成长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我们抓住机会，在服务业方面有更大的开放，相信我们一定会吸引全世界非常好的服务业公司到中国来开展业务，迅速提高我国服务业的质量。服务业质量的提升跟制造业不太一样，制造业你引进一些设备，聘请几个设计人员，生产质量就提升了，服务业不是说找几个人就可以办到的，必须要引进已经有成熟的运作经验的企业进来才可以。

第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能做到的，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项工作。Robert Zoellick 先生也谈到，中国可以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过程。谈到货币的国际化，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愿意，也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愿意让他们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感到现在只有人民币是一个潜在的国际货币。别的国家的货币你说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它成得了吗？日元曾经试过，没有成功。俄国卢布也愿意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但是它成功了吗？如果说我们国内有进一步的共识，我们着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十年左右，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至少是贸易货币，再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货币，最后是一个储备货币。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前面四件事情是跟中国的开放有关的，以下四点是从国内来看我们国家能做，别的国家不太能做的事来谈：

第一，我们中央政府可以发行长期的，相当多数量的长期债券。比如说三十年的国债，我们可以发很多。到去年年底中国国债占 GDP 的比例大概是在 14% 左右，这在全球是非常低的。不是所有的国家想发国债都能够发得出去的，欧洲很多国家现在想发也发不出去，中国发长期国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

的长期国债绝大部分都会被国内的投资者所抢购，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储蓄，不需要外国的投资者来买我们的国债。这些长期国债如果发出去的话，它有非常好的功用，短期之内它可以迅速地促使国内需求的上升，因为这些国债收集来的资金可以用于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本来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我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教育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投资。这是对短期的宏观需求的作用。对金融市场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储蓄很多，但是可投资的品种非常少，如果说这些长期的国债发出来，利率有 5% 以上收益的话，相信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愿意投资，因为没有风险。这样对完善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对减少金融风险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很多钱投在影子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规范的理财产品上，这些状况都可以改变。

第二，如果说我们这个简单化、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有所改变的话，这在中国产生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中国跟很多国家有点不一样，这也许是要归功于我们的老祖宗多年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对孩子、对家庭的观念是非常强的。特别是中国的很多比较高收入的人群，或者说中高收入的人群，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收入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生孩子。我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我有一个女同事非常能干，三十岁多一点，已经提升到上交所的部门总监了。她为了生第二个孩子，辞职了，待在家里面，这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损失。如果说我们的政策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是要的，不是不要，如果不是简单的这种一胎化的政策，我想这个同事她可以不用辞职，可以边工作边生第二个孩子，就不会造成这种不必要的损失了。如果我们的出生率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城市里的出生率，内需是马上就会上来的。小孩带来的需求是很强的。加上中国人重视教育，十几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希望这件事我们的高层决策者能够尽快作出恰当的决策。

第三，我们有大量的民间资金急于进入各个不让它们进入的行业进行投资。我老家在温州，众所周知温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地区，当地有很多中小企业，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创业了，积累了一些资金，到后来由于我们太多的原因，不让这些积累的资金进入，结果这些资金只能去干什么？炒房地产，炒大宗商品，搞高利贷，结果造成现在温州很多金融风险。其实他们很愿意进入我们的金融领域，很愿意进入我们的教育、卫生领域，也很愿意进入我们的一些信息服务领域。如果这些领域对他们开放的话，就不会造成现在的麻烦了。如果说他们能够进入这些金融领域的话，对他们自己的一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也会很有帮助，以免他们在一些不熟悉的如太阳能、生物科技等领域乱投资，导致投资失败。

第四，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国内做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拔苗助长，是为了城市化而建很多楼。我们把人口政策、户口政策，这些阻碍在人口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流动的障碍去掉，才能使城市化有更快的、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推进。这会对我们的内需产生巨大的推动。

以上八点都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而且是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要谈到中国的机会，我们还要再退一步看看中国本质上最强有力的竞争点在哪里？

中国同其他国家主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中国有 13 亿非常勤劳工作的人民，你给他一点工资，甚至不是很高的工资，他都愿意很认真地去干活。这在全世界不容易找到的，我在 Robert Zoellick 当行长的世界银行工作过五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也去了非常多的发展中国家，我相信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有中国这么大，而且是大家勤奋工作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中国最最基本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使得无论中国怎么样，不要说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等，无论如何，中国的出口在全球都会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当然数据有可能会有虚的地方，但是他们折算了一下，1 ～ 4 月份中国的出口还是增长了 10% 左右。二是中国本质上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到地区县一级，

我们的政府都是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是非常愿意帮助企业发展好的政府。全球我也去过不少地方，没见过有比中国政府更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二、优势伴随的风险

当然我谈了那么多优势，很多朋友都会问，中国现在的风险也很大，你这个优势能否发挥出来，你八件想做的事能否做得出来，如果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现在习主席也是教导我们要底线思维，我们要把问题想透，风险想透。我讲了这么多优势，是不是没有考虑到风险呢？不会的，我是考虑到风险的。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风险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风险，还有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风险我们是完全可以很好地加以管理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风险这些贷款或者其他的融资，都有土地或者房产做抵押的，这样一个融资结构你要处理它当中的风险，最关键的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就是说，首先要把现在新的贷款，新的融资慢下来，不能像前几年那样继续膨胀。然后不能因为有一家企业贷款还不出去，你就迫使它破产，不能做这个，你要以时间换空间，或者通过延期等其他的融资办法能够往后推。中国经济再增长 7% 以上，几年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土地、房产和其他的一些资产都会是值钱的。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是 1998 年，当时在在建设银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与信贷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当时的情况比现在还遭，不良资产比率是 30% 多，我们采用的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到 2003 年的时候，这些原来看上去不值钱的资产后来都值钱了。所以这是中国处理危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增长当中处理危机。而且中国处理危机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处理危机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缓冲，别的国家没有。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些风险，把它想透，想处理办法的话，会发现中国是有办法处理的。我们关键是不能停下来只是去处理风险，不抓发展，这样那就顾此失彼，那就有问题了。我们要继续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理这些风险。

以上八点当中，还会有一个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牵扯到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下一步能否推进，很多人也会有疑问。我对这一点是有充分信心的，中国的政府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工作的政府，现在经济增速在下滑，这就必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改革步伐。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了，改革开放会加速，所以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因素担心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既得利益等某种因素，会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缓慢下来。

总而言之，中国这个国家问题很多，但是机会更多。只要我们把风险想透，把处理风险的措施想清楚，做好安排，我们就可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然后在发展中处理这些风险，那我们的经济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整理：刘训志）

◆ 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2012）

演讲人：袁志刚（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精彩语录】“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改革都改好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信心的。所以2012 年又是一个起始年，我们期待着2013 年所有的改革能够重新再上轨道，然后抑制中国经济这种下降的趋势，使得我们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我个人认为2012 年是中国经济非常不平常的一年，尤其是我们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碰到了很多比较强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导致了经济增长数据下行。同时我们这个论坛今天的主题又是讲未来十年的战略，所以我要讲讲长期的问题。中国如果一看长期的情况，无论是从人口结构的改变，还是从资本形成，还是从环境、能源的制约，还是从TFP 的增长都碰到了挑战。2012 年是一个长周期和短周期并存的年代，是相当困难的一年。今天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2012 年碰到的挑战，二是长期的趋势，三是大概有哪些重要工作是近期必须要做的。

讲这么一个题目，首先还是要给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一般模型，这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来看长期、短期两个方面。从长期来讲，我刚才讲了，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后面的资本形成也是非常重要；TFP 里面我们有R&D 的活动，中国这几年的技术进步非常重要；TFP 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度改革，刚才龙永图先生已经讲了，比如说加入WTO 制度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就是能源的制约，我们环境治理成本的制约。就短期来讲，我们的冲击有很多，比如来自于外需的下降，比如来自于中国投资的突然变化，比如来自于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过度频繁的变动，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冲击。所以长期来看，2012 我们有很多重合的东西。

一、2012 年中国经济遭遇的挑战

就2012 年来讲，首先要看全球经济的影响，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第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投资最近的变动；第三来看看消费；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金融，就是流动性注入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从全球经济来讲，说老实话2008 年这一场危机没有过去，2008 年这场危机刚才朱民先生已经讲了，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非均衡，就是制造板块的非均衡、贸易板块的非均衡以及金融板块的非均衡，最后导致的就是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的杠杆太长，现在是一个不断去杠杆化的过程。就美国经济来讲，因为它的科技、因为它的重新再工业化的政策，这样一些政策的展开，以及国内的很多刺激政策，再加上美国美元还是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一个重要一员，所以它继续举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下面一块我们就看到了很多问题，欧洲由于欧元这样一个共同货币的存在，使得少数南欧的国家经济复苏是极其困难，去杠杆化的任务就更重，继续举债的成本就非常高。尤其是最近，因为希腊的议会选举和法国总统的更

换，那么欧洲正在朝着未来的目标，不怎么明确的方向蔓延。欧元应该来说我想长期来讲无非是三个出路，第一个出路就是欧洲走向联邦化，它的货币政策就更加地统一，现在的法国新总统提出来就是欧元债券的发放，试图征得一个美元那样的地位，就是举债负担比较轻，但是这个趋势估计不那么容易走成。第二个就比较危险了，就是希腊退出。第三个不能不排除长期欧元的解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蔓延，欧洲经济估计在衰退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花上几年。

后面就是大家知道，原来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向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但是最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是出了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于未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的不妙，前一阵大宗商品包括黄金价格大跌。那么这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个影响，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不利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这个影响是应该是比较大的。中国大家知道是个制造业工业比重非常大的，是个世界工厂的概念。但是就2012 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少有的到了个位数的增长。4 月份的数据是9.3% 的增长，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在中国很多年的平均数字基本要在14% 左右，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现在已经滑到了，最近可以看到它的下滑是非常明显。

原因在于哪里呢？我们来看刚才短期因素里面的几个。原来长期一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的因素，就是外需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三条曲线，一条是出口增长率，一条是进口增长率，还有一条是中间产品进口增长率。可以看到中间产品的进口下滑趋势非常明显，而中间产品下滑实际上就意味着未来的出口还要下滑，因为我们中间产品进口，然后很多是组装再出口。进口也因为我们的经济速度的下滑而下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滑应该说2008 年这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那个幅度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一次的下探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经济速度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更深地去挖一下我们内部的东西的话，就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出口的下降还要厉害。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大家知道。像重庆是100% 多的增长，那么这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说明了什么？我们最近集中地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很多同学在做的东西显示中国的工业的集中度在下降，中国的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在下降，实际就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的效率正在下降。前一阵到浙江开会，浙江现在是华东地区倒数第一，政府很自责，说我们没搞好，我说不是你们没搞好，是因为中国现在民营经济弱，所以浙江一定弱。民营经济好，浙江一定强，而不是政府有多少作为。

接下来看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原来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就是投资，从中国的投资里面，我特别要介绍的是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已经下滑到20% 左右的水平。再看右边这三个投资的，一个是制造业的投资比较平稳，还有一个就是建筑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是这条紫线，2008 年以后我们的四万亿有一个突然上升，但是这是不可持续的。这带来了很多问题，当然这样的投资也带来了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高升，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下滑特别明显，紧接着这条红线制造业投资也开始下降。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的线是建筑业的投资，在我们的限购政策之下，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民营的房地产的投资商基本上是没有投资了，既不拿地，也不投资。所以还有如此高的一个投资增长，完全是经济适用房撑着。如果一旦经济适用房下来，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再下来，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一定再要下探。所以总体来看，很多人认为，中国2012 年的一季度是个底部，或者有人认为二季度是个底部，我不认为一季度、二季度是个底部，恐怕三季度、四季度是一个底部。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住房建筑里面，办公楼和一般住宅的投资下探，背后的原因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房地产的限购。房地产的限购我们就等着，我们做宏观经济的说再等上五年，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极难的研究周期的东西，因为这个冲击太强了。而且它不像其它的税收政策，或者信贷政策、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难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的冲击。

大家现在都指望于中国的消费，刚才龙部长也讲到经济转型、内需，这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可能是，

我想 2015 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可能会上升，但是 2012 年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当你这个经济在下探，就业在下探，而且中国的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只有 34% 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收入在整个 GDP 当中的比重，只有 40% 左右的情况下，而且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二元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的公共产品享受都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要指望这样一个消费的上，2012 年我认为没有戏。所以我的潜台词也很清楚了，就是 2012 年如果经济要上去，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启动投资。

那么好，我们再来看，我们 2012 年存在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就是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注入碰到了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作为一种经济当中的血液，进入到实体经济有两个主要管道。第一个主要管道就是外贸顺差所带来的美元储备的增加，就是我们叫外汇转款这一方面注入资金是非常强的。现在外汇转款在迅速地下降，这一途径注入的血液就少了。而且这个对于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出口主要以他们为主，所以原来企业，他不怕金融的问题。第二个管道就是房地产，以及在房地产基础上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作为抵押的进入，现在在限购之后，这个管道也堵住了。两个主要的管道一齐堵住，剩下来的问题大家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一季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松的，我们的准备金率是在下来的。现在唯一的利率还没下，负利率刚刚走出来，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很大的利率下降的空间。但是货币已经松了，新的现象出来了，企业不愿意贷款，因为投资没有效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 5 月份的前 20 天，四大银行只贷出去 340 亿的贷款，2008 年我们是一万亿一个月的新增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流动性的注入下降。

二、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

下面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很多，我就下面再讲一讲简单的，对长期趋势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国因为七十年代起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的劳动力的顶部最高的大概到 2015 年，2015 年以后中国的整个劳动力人口占比要下来，总人数也要下来。这个大家知道不仅是劳动力人口的下来，而且劳动力的人口如果主体是 70 后、80 后甚至是 90 后、00 后的时候，带来了劳动力结构性的问题，甚至现在大学里的教育碰到越来越多年轻学生的时候，就发生有很多的变化。现在所有的独生子女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进入白领阶层，但是我们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其它的工种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所以背后还有一个中国储蓄率的巨大改变。我们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上升，老年抚养比迅速下来，这些都在动摇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可能中国变成如此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样变化对资本形成来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靠高储蓄率的支撑，那么储蓄率有多少，我们就达到了 52%，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没看到过的一个这么高的储蓄率。这个里面再简单说两句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储蓄，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的储蓄，不上交，成为了企业的储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储蓄。在未来长期来看，这些都是改变。无论哪一种改革的推进，比如说税收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还有人口结构的改变，都会使得储蓄率改变，资本形成下降，那么中国的经济再用投资增长来支撑，肯定是走不下去了，用劳动力增长支撑也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唯一有希望的出路在哪里，就是技术进步，就是刚才龙部长讲的经济转型，就是我们 TFP 的增长。

因为我们去年给国家发改委做了一个课题，做了一项梳理，就是下面这条绿色的曲线，TFP 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 TFP 增长有三个比较增长快的年代，第一次就是改革开放，农村承包制，第二次就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次就是中国加入 WTO。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它有什么共同的事实呢？第

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制度改革非常得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的大规模转移。在和平时期我们转移了两亿多的劳动力，这个在历史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大家知道上海现在包括流动人口，我们的人口是 2300 万，最近跟计生委在做的研究显示，其实还有很多漏报，很可能要比 2300 万的人口还要多。

还有中国正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到人均 GDP 到 15000 美元的时候，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这一转折点对于日本来讲，大概就是 1970 年左右，韩国就是正好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后。那么对中国来讲，转折年大概就是 2012 年，转型可能是我们必然的东西。

还有 13 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人均 GDP 如果超一万，到两万、三万、四万美元，不断逼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的气体排放，我们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包括最近我们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从地理上来讲，它的土地是西高东低，都是水源所在。所以如果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我们的长江、黄河污染了怎么办？而且现在上海的天气，这几天你们在上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如果刮西风，上海的天气不会好，如果刮东风，上海的天气是好的，因为上海的西部就是有工厂的地方。

三、改革：中国经济的应对

那么怎么办，中国如何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就是说它的增长率下来，估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再维持 10% 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下得很多，我们还是希望有 7%、8% 的增长，我们增长的空间在哪里？空间我们也是很多，有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首先我们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红利非常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工具，刚才讲了 2015 年劳动到顶尖了，但是我从来不同意中国另外一些专家所说的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中国还有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关键是制度改革给他创造空间。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农业只用了 2% 的劳动力，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还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第三，我们的资本形成，尽管储蓄率跟我们前面比是下来了，但是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比，由于中国人民的这种特殊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还有一个我们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利的因素，我就不展开了，等一下我要讲。总起来讲我们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的改革接下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改革，但是中国最难的也是要素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在商品市场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举步维艰，因为要素市场改革背后要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推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大家知道我们 1978 年的改革始于农村土地的承包，但是承包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形式，已经严重跟中国经济后面的发展不相适应。因为集体土地所有，现在非常纠结的农村内部来讲，征人到底征不征地，减人到底减不减地，这是一个。第二后面的工业化、城市化用地，怎么跟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相匹配，地方政府在征地的时候导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就把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而且大家知道城乡的差距，真正大的差距，实际就是财富的差距，就是改革当中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土地的资本化当中，基本上可以说是农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财富效应。所以大家知道只要土地改革，它可以带来我们新一轮的土地产权的界定，而且中央我知道已经在做了。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先要做的就是信息先搞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登记制度先做好，做完了以后，如果产权能够界定，后面大家知道不得了，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空间，对城市化的促进，对于金融的促进，因为金融要做抵押的，有抵押物资本化，这都是空间。刚才朱民讲到的我们金融是小国，这个金融跟实体经济是严重的不相称，香港的金融版图也很大，我们的金融版图非常小，上海的版图就更小了，如果哪一天

把上海的版图做得跟香港一样大，大家想看我们复旦大学要培养多少学生，但基础在哪里？基础就在土地。而且这块土地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给农民，接下来城市化的进程也会非常快。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劳动力市场一定要统一，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的情况非常多，我们社会保障建设还有很多问题。这个劳动力的流动还有非常多的障碍，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如果要做到把金融版图做大，如果金融的企业，金融的单位不强，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单位，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为金融市场服务的单位，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永远做不起来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圈钱。我们的创业板一上市的时候是天价，完了就是下跌，把中小股民全部套进去。最近美国的 Facebook 上市的时候是 38 美元，最近跌了，开始小股东就要起诉了，认为承销商是有欺骗。我很想这样的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如果你上市的时候天价，后来就跌价，应该起诉。如果我们的金融、资本市场能够保护小股东的利益，那中国的金融就一定是健康的，因为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定要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一定要为风险投资服务，一定要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用来自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报给，而不是泡沫炒作，不是利益集团在里面掌控。所以要素市场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改革都改好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信心的。所以 2012 年又是一个起始年，我们期待着 2013 年所有的改革能够重新再上轨道，然后抑制中国经济这种下降的趋势，使得我们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整理：杨军）

◆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一定需要出口快速增长来支撑（2011）

演讲人：James A. Mirrlees（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精彩语录】“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进行贸易其实带来的经济活动是非常多的，未必要出口，如果是不出口的话，对中国 GDP 的影响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受邀来到上海论坛并做主题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选择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来讨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自己也是非常感兴趣，我不是很确定我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但是还是有一定把握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谜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增长会保持像以前那么快的增长速度，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可以拉动出口的增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全球 GDP 的增长从实际的价值来说可能是 4%，但中国出口的增长是会继续上升的。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的增长也会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的拉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投资，而出口只是一种需求的表现。资本的增长就是对诸如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厂房等等的投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投资带来的增长，还有劳动力和技术革新方面带来的增长。不过主要的推动力应该还是投资，如果说投资的回报不够高的话，这种投资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这么多年来投资一直在持续下去，说明这样的投资是有一定的回报的，不难看出，投资下去的资本产出的产品也是得到了市场需求的认可，否则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可以看到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复苏，然后突飞猛进地增长，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些都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快速增长奇迹的情况。

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我们知道假设没有需求，那就没有投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投资不断地增长就说明市场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地增长。当然，有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干预市场来创造需求，正如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循环，像设备和资本的投入，它会创造对于产出品的需求。一个开放的经济，可以充分地利用它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它的发明。某些产品在生产方面是有优势的，它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对中国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比较优势的利用，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有的产品的生产需要很多劳动力，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的生产需要很多资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产品对于资本、技能和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国都会做专业的分工。我们知道“干中学”就是学习效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的时候，随着产量的增加，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效率会不断地提高。那么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刚刚发展经济的时候，它可能会问自己，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可能这个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只要你发展出一个产业，有足够大的规模，就会有学习效应，就会有效率的提高，就

会促进我们的增长。问题是这个增长能够有多快？通过投资和专业化的分工，这个增长有多快？

二、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据统计，中国的出口价值在受经济危机影响而下降之前占到 GDP 的 40%（参见下图），正像刘遵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出口国内的增值部分是比较少的，可能只占到 GDP 的 20%。也就是说，很多增值环节和大量零部件的生产是在国外进行的，在中国国内主要是组装，特别是像 IT 行业更是这样，通常在中国所实现的增值还不到 20%，其他一些产品增值的部分就大一些。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我觉得在 80 年代经济刚刚发展的时候，中国占的增值比重更高一些。早期我们看到纺织品非常重要，纺织品更多的是在中国生产，而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出口的产品更加先进了，比如说像电子元器件等等，还有以石油为原料的产品是，增值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进行的。

刘遵义教授也告诉我们出口在中国的增值部分是占 GDP 的不到 20%，如果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参与出口的话会怎么样？也就是说 GDP 的 20% 不是用来生产出口的产品会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飞机，一开始肯定是要依赖进口，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因为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如果说出口不做的話，比如说占到 GDP 的 20%，是算做增值的部分，如果这个增值的出口业务我们不做的話，GDP 的影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我觉得可能受到的影响不会非常的大。在经济活动当中，在中国特别大的一项就是交通，因为中国地域广大。所以，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进行贸易其实带来的经济活动是非常多的，未必要出口，如果是不出口的话，对中国 GDP 的影响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三、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下面再看一下投资带来的 GDP 增长的情况。看一下中国的增长数字，投资所带来的 GDP 的增长。在此之前，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不要以为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也就是说，当你做更多的投资的时候，当你累计的投资增加的时候，这个资本带来的劳动生产力不会下降。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道格拉斯的模型收集了很多的数据。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收集中国的数据的话，可以看出中国的数据不完全符合它的生产函数，拟合程度非常之低。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用 Y 表示产出，用 K 表示投入的话，A 代表的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产出和资本投入是同比增加，没有边际效应产出递减的情况（Y=AK）。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中国 GDP 的增长和投资的关系，我们列出了每年 GDP 的绝对增长额和当年的投资总额。投资总额应该是跟 GDP 的增长额成同比的、差不多的，在中国尤其如此。大家可能还记得在 1990 年前后，投资是大大地收缩了，使得 GDP 的增长下降了 3%-4%。最近因为经济危机，GDP 的增长率明显下降。不管怎样，除了相对来说不是很正常的时期之外，可以看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学家的描述中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在中国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我们看一下投资和非农业部门的 GDP 的关系还是很明显的，跟前面看到的是一样的，是一致的结论。从中可以得出前一年的投资和下一年的 GDP 的增长之间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相关性的，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是很老的概念了，差不多是 20 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就告诉我们了。资本投入的劳动产出率是 30%，投入产出比是 40% 的话，每年的增长率达到 12%，这是一个算术算出来的简单的结果，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你可能会说，资本的劳动产出率好像特别高是 3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印度，其实他的资本劳动产出率更高。所以我觉得考虑了资本投入和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再看中国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资本的投入之外，还有劳动力和劳动技能的提高也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亚洲和中国 GDP 的年增长率达到 10%，而西方却达不到这么高。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在亚洲，

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技能提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一天这个上升的空间会被耗尽，我估计这一天也不会到来的太迟。

四、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前面介绍了资本和劳动力，接下来看一下贸易。为什么贸易很重要呢？因为它可以促进劳动分工专业化，我们可以看到就全球来讲，正是因为专业的分工和储蓄这两项组织在一起，使得全球的产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专业化分工使得规模不断的扩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学习效应也会更强。随着教育和技能的提升，专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增幅应该会下降。我们看到，就像其他国家买衣服、汽车、手机一样，国际贸易的分工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现在中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比以前要少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生产的产品、参与贸易的产品相对价值比较低，现在则是高精尖的一些产品了，比如说航空母舰等等。此外，尽管专业化和贸易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在下降，但是这个专业化，从绝对的角度来讲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利益和好处。计划经济的危险就在于它可能会影响这些潜在的好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地发展。是不是会发展得太快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整理：刘训志）

◆外部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与出路（2010）

演讲人：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精彩语录】“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由我们的贸易模式决定的，我们是加工贸易。为什么中国只能选择我们的加工贸易？这是我们的禀赋决定的，我们只有劳动力，没有知识产权、技术和资本。”

一、理解我国经济的外部约束条件

我想着重讲一下中国的问题。

第一，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中国政府出政策救市，我们到了一个全球救市的时代。从我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来讲，在拉美在做战略调整的时候，芝加哥学派和自由中心理论指导了拉美的实践，结果最后这个政策在该地区全部失效了。还有一次是 90 年代的东亚，东亚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上的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足以到了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于是在 90 年代逐步的开放金融，最后陷入了一场金融危机。还有一次是 1989 年，根据了一系列的政策也是没有成功。我的理解不一定是政策错了，而是这些政策与当地的环境不匹配，内部的条件尚未满足。

今天的很多的经济学家，每天都在开“药方”和政策，我想问的是你满足地方的条件吗？我想问的是关于我们目前是处在怎样的经济体系当中，外部的环境是什么？这个框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下面，什么是可以竞争的，什么是不可以竞争的。可以竞争的又激烈到什么程度？我的观点有几个：

第一，美国霸权不可竞争，这是一种制度化的霸权，生产了很多的公共品，没有人可以替代美国生产那么多的公共品，国际安全，国际贸易制度，本位货币等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所以不要挑战美国霸权，这是不可竞争的。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增长，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自由化，贸易是可以竞争的，因为是有禀赋的差异，贸易可以竞争的，是有贸易的差异，而金融是不可竞争的，是一体化的。货币本位体系是不可竞争的，因为也是一体化的。有文献指出：一个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贸易只有解决 55%，金融交易决定了 45%。美元是不可挑战、不可竞争的。所以我非常的赞同麦金农先生的观点，中国一定要和美国保持固定的汇率体系。什么是可以竞争的？贸易是可以竞争的；贸易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走市场化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贸易人口是越来越少了。穷人要国际化，产生的产品增加了，于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全球的产能过剩的时代。中国政府天天来讲产能过剩，这是中国问题吗？我认为这是全球问题。而在当下，工业化国家是主体，制造业的比例在增加；后工业国家是少数，所以贸易竞争是空前的激烈。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这是给出了中国经济成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

第三个是内部问题。中国经济处于内外经济同时失衡的状态。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1979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是：城乡差距的扩大，意即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高收入者和

低收入者，有技能的和没有技能的，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在加大。第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在扩大。第三，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初次金融分配，走到了国富民穷的地步。中国没有内需而有过高的储蓄率，因此可以说中国出现了高储蓄并不是“偏好”问题，而是经济增长的失衡。储蓄高，内需没有，就只有出口，这导致了外部经济的进一步的失衡。

1. 城乡失衡问题

首先来分析一下城乡差距的失衡问题。原因在于生产力。工业的发展指数增加的，有功能经济和规模经济；农村则是暴减的，农村的经济不现代化，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进行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是不到美国的 1% 不到。我们是 4 亿种地的，人口在 8 亿以上，耕种世界 7% 的耕地，属于小农经济。人出不来，钱就进不去，机械就没有用。我们天天讲农村要现代化，我们要投钱进去，机械要现代化，生产方式进入农村。试问：有那么多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会有一个企业家用昂贵的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吗？任何一种理性的选择都是维持现状，所以城乡收入的差距就扩大了。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方法就是城市化、工业化。这是全球提供给我们的基本经验。现在往农村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政府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只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政府的财政负担。根本措施应是要改变农村的经济增长方式，把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按照美国的标准，农村的人口最多是一千万，如果是三十年、五十年之内，留下一个亿的话，可以出来的农村人口就是许多了。我并不是人口经济学家，很多的学家说是中国的人口拐点到了，说农村的劳动力枯竭了。我不是这样理解的，其实对于中国的农民可以做两个分类。

第一个是业务边际的分类。在该分类下，第一种是风险偏好的，只要取消对农业人口的管制，就倾向于去城市生存，从事城市工业活动的能力。四川和重庆是民工流出的最大的省份，邓小平是他们的老乡，所以他们就听着邓小平的号召去了深圳去，他们即是风险偏好的。第二个冷静分析的，是想去城市里面工作，但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这部分就要增加他们的补贴，降低他们的转移成本。第三个就是不懂做功，只会种地的。这样政府就必须培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 9 亿农民大概就是流出了 30%，还有 50% 的人口是可以动员加入到城市工业生产当中去。

另一种分类方式是技术的角度。据此可以将农民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会种地，会经营，每次的粮价都可以稳定在最高点。这样的人要留下来进行农场主，大规模的经营和大规模的作业，提高农业生产；第二种是单会，就是土地到他的手里就是能丰收，这样的人就是要当村里面的主任；还有第三种就是不会种地，不会把粮价卖到最高点，这样的人就是城市工业化的劳动力的来源。这样的情况下，如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是非常丰厚，拐点还没有到。

2. 城乡人口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其次，关于城乡人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的不公。第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正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吗？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是改革的“动态成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有了储蓄、积累才可以投资，有了投资才有就业，这样再就业才会富裕。千万不等同于“再分配”，再分配也并不是公平。

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第一个是 A 点，有 3 亿人口是处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以下的，即一天的消费收入低于 1 美金，工资收入一天低于 2 美金。邓小平先生提出了“贫困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B 点就是高收入者，有能力、有知识、有资本，或者是把握住了市场机会。C 点就是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没有收入，没有把握住机会并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是运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假如政府不加以干预，任凭这种差距的扩大，这个社

会就会断裂。我们必须收敛，不理想的就是在 E 点，理想的就是 D 点，就是让中国收入高的人去做慈善，分享财富。问题就来了：中国富人为什么不做慈善、有人告诉我是没有产权，比尔·盖茨用 400 多亿投资了微软，而今天用 400 多亿投资了比尔·盖茨基金，就是投资了基金的产权，而中国是没有产权的。所以投资了寺庙烧香拜佛，而投不到我们的人民手里。甚至做慈善之后，就有人就会查他有没有偷税漏税。一个解决措施是把严格的政府的审批壁垒消除，大多数的农民就可以进场投资创造财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穷人就会去奋斗，就会去梦想，就不会去仇富。如果这些事情政府一个都不做，然后通过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这些人，这个穷人就会等到 E 点去，移民到加拿大并等待（当地）政府的救济。

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第一个是受到国际贸易地理效应的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是有贸易机会，海洋运输的成本是最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没有贸易的地区，就出现了贸易落后。美国的大田元一指出：要看世界的经济增长在哪个区域上，你就在太空航拍地球的夜晚哪里有灯光，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有经济增长，没有灯光的地方就没有经济增长。日本的名古屋，还有沿海的三大港口，成为了日本经济增长的脊梁。如果是经济总量提高以后，就可以看到这种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也可以看到环渤海湾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形成。人口和城市也都在东部集聚。而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都不会跨出京广线，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就是这个道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两件事：第一是要人口从西部往东部走，第二是乡村的居民向城市集中，集中之后产生市场效应，拓展国际贸易的机会。过去采取的这些政策，现在是慢慢地纠正了，慢慢地重新开发渤海湾和天津。海西地区要开发，北部湾也要开发了。过去我们是在开发西部，结果是爱尔兰缩小了，贝塔没有缩小，人均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扩大。原因在于：我国主导下的西部开发基本上是资本要素汇集的来源，如果不能创造就业的机会，收入就不会增加。开发西部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开发西部就是破坏环境。我国的东部沿海环境的自我干净的能力很强，东部是高收入地区，老百姓对于环保形成了及其有效的约束，而在东部破坏环境的产业是不可能。相反在西部的自净能力很弱，一旦投入人们为了生存和收入就不顾环保。今天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3.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问题

第三个是关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从 1999 年开始，我们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极具恶化，政府的税收增长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长，然后是城市经济的增长，最后是才城乡人口的收入增长。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初次分配的概貌：第一个是政府税务收入是年均增长的 40% 左右，政府的土地批租的收入极高，有多高就不知道了。我们不断地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土地）“标王”。人民的收入是年均增长的 10% 左右，可以看到居民 10% 左右的收入用于购买政府垄断部门生产的水电、煤费，如此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下降了。这与政府分配收入的严重失衡有关。我们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的参与市场产业活动中的直接投资。政府的支出要尽可能的进入到企业的生产当中，政府收入要尽可能地抵除居民的持续收入。

二、从内部失衡到外部失衡

上述内部的失衡带来了外部的失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情况。第一个是贸易顺差在增长；第二个是资本没有开发，但是流入到中国的套利资本在增加，因为我们的汇率升值了，我们的投机敞口被打开了。从 1994 年–2004 年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贬值了，贬值增加了我们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储备在不断地增加。现在要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由我们的贸易模式决定的，我们是加工贸易。为什么中国只能选择我们的加工贸易？这是我们的禀赋决定的，我们只有劳动力，没有知识产权、技术和资本。我们除了单一的加工贸易以后，没有其他的可以做。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都贴着别人的标签或者是别人

的芯片。所以加工贸易就是我们的禀赋约束的一种贸易，这种加工贸易模式天生就是顺差的，所以这种模式不改变，中国永远都是贸易顺差。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贸易顺差的做法都是无效的，这是一种结构性问题。

第二，这种贸易的顺差是被全球分享的。所有进驻中国的外资公司的都分享到了这种顺差，因此全可以说全球都分享到了这种顺差。而中国要承担这种升值和汇率的调整是不公平的。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是发展：通过发展来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创造我们的内需。需要指出的是：内需不是刺激出来，是通过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流动是在升值前和升值之后是不一样的，2005 年之前流入到中国的资本都是 FDI，之后因为套汇、套利敞口的打开，流入中国的资本都是短期的投机资本，都是热钱。随着这种流入很快地挤出了 FDI 的生产流动资本，导致了中国的结构性的恶化。这种中国的资产泡沫就逐渐产生，外汇先套利，再炒股，再做房产等，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利率平价。

第四个问题关于人民币。我们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国家，所以只要贸易顺差赚的外汇，一定被央行收购，增加流动性。我们的流动性泛滥怎么办？现在的办法就是把人民币放出去，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就是央行的负债的国际化。只要负债国际化，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国际资本的攻击。过去我们看到了日元国际化了，我们现在看到了欧元国际化。欧元是成功的吗？我想欧元很可能是失败的，欧元被攻击了。人民币千万不要国际化，因为你是负债的。要增强流动性，要资产储备国际化，让央行拥有那么多外汇的国际化。在中国的约束情况下，不要做离岸人民币业务，而是要做离岸美元业务，要做有信用的、有评级的，让中国的储备来买这些债券，而不是让我们变成的一种被攻击的对象。人民币满足不了宏观的条件。人民币可以说是被美元渗透的货币，所以这种逻辑上就是一种悖论。第二，人民币没有微观的基础，美元是有 3000 所大学，500 家企业每天在生产知识，而人民币是没有的，所以这种是非常风险高的做法。第三，既然汇率已经这么定了，那么人民币就没有调整的必要了。

人民币升值不能决定的事情有三：一不能解决收入的减少；二不能减少流动性，却打开了投资的敞口；三不能解决收入性膨胀的问题。人民币升值 20%，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涨了 200%，这就是给予了卖方提价的机会。人民币不需要升值，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储备，最好的做法就是离岸美元。

三、外部约束条件下我国的战略选择

我想我基本的观点就到这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很重要，告诉我们面临的这些选择。在这些选择的条件下，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第一，关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当下很多平衡内外部的政策选择是把中国作为大国来说的，是占世界的 GDP 的 20% 总量。这个逻辑是错误的。任何国家如果拥有 13 亿到 14 亿的人口，就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经济体有没有竞争力？美国人的竞争力是在知识生产，欧洲的竞争力是在审美，因为它高贵，有产权，安全的人去审美；不安全的人乃至国家一定是储藏，而没有审美。欧洲的竞争力是奢侈品行销全球，美国人是有什么？是可爱的农民，是处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超越。经济增长没有可超越的动力，我们没有相应的要素更没有有利的约束条件。

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中国要做什么？要制定的战略政策是什么？第一是增长。我们有人口的压力。有人口压力的国家，没有高增长就会掉入陷阱：人均的收入不变，人口却越来越多。这是中国过去惨痛的教训。清王朝以来中国的人口是达到了四倍，一定要增长经济。第二要发展。只有解决种种结构性问题，只有内部的经济恢复均衡了，外部的经济才能恢复均衡。第三要改革。但是我很担忧，现在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改革先行”，而是“政策时代”，是用政策替代改革。今天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在天天制定

政策，并不愿意改革。优化体制的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削弱权力，多数的政府会去制定政策而不是推动改革。是劳动密集型要素优先，还是高科技产业的优先？劳动政策是弹性的还是非弹性的，环境政策是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作为经济增长的消耗，还是要达到很高的环境标准？最近几年，我们突然发现所有的政策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变化，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沿着错误的方向走。整个的经济增长的重点是处于政府主导和开放度在逐步的缩小。如果是这样下去，中国的前景将会非常的黯淡。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准确地认出这种形势，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谢谢！

（整理：巩辰卓）

◆发挥金融业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

演讲人：苏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精彩语录】“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衰退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大局，充分发金融业自身优势，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 2009”，我也谨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去年 9 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影响到实体经济。现在许多经济体已经进入衰退，中国也受到波及。在这样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的关键时刻，一年一度的上海论坛为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应对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我将就如何发挥金融业的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当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

第一，2008 年下半年以来，为全力应对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党中央审时度势，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正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国民经济运行出现积极的变化，形势比预料要好。主要表现在：GDP 的环比上升，经济增长出现回升的迹象。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1%。从同比增长速度看，增速虽然比去年第四季度 6.8% 的速度下降 0.7 个百分点，但是经过季节调整以后的环比 GDP 增长速度是 7.2%，增速比上年第四季度提高了 2 个百分点。

第二，工业生产保持增长。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 5.1%，3 月份增加 8.3%。经过调整以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是 7.0%，增幅也比上一季度，即去年第四季度高 4.2 个百分点。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3.6%，连续五个月回升，并且是第二个月超过了 50%。据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一季度景气预期指数为 12.8%，是四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回升。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一季度同比增长 28.8%，比去年第四季度加快，重点领域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一季度城镇投资中农业、水利、交通运输、教育、卫生、文化、环保投资同比增长较快。全国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由比去年同期的下降 4.4%，转为增长 87.7%，为历史最高。

第四，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5.9%，提高 3.6 个百分点，是近十年来比较高的水平。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8.2%，扭转了 2008 年初以来持续下降的局面。商品房销售额增长 23.1%，比 1 到 2 月份加快 11.9 个百分点。

第五，对外贸易降幅减缓，贸易顺差继续扩大。3 月份进出口增速比上月减少了 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负增长 17.1%，降幅减少 8.6 个百分点。进口基本和上月持平。

第六，货币供应量回升，货币流量回升。一季度累计新增贷款 4.58 万亿，同比增长 3.25 万亿，截至到 3 月末贷款增长速度是 29.8%，是 199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企业资金情况进一步好转，支付能力明

显增强，银行流动体系充裕，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0.27 个百分点。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何时见底尚难判断，外部环境仍然严峻，保持出口的目标难度仍然比较大。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工业生产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物价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就业压力也继续存在，经济止衰回升的计划还有待观察。

二、我国金融业运行健康稳定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业仍然保持健康稳定的运行态势。

一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2008 年 9 月份人民银行四次有区别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率基本平稳。

二是金融机构稳健。2008 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36.6%，银行资产质量继续得到改善。2009 年 3 月末，境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下降。银行商业拨备覆盖率比年初上升 7.5 个百分点。

三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2009 年 1 到 3 月除央票以外的各种债券发行同比增长 11.9%，市场利率保持低位，票据稳定增长，外汇市场平稳发展，人民币交易活跃，股票市场显著回升，保险市场需求明显增加。今年一季度实现保费收入 3276 亿元，同比增长 10%。

四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1 到 3 月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 6.83 及 6.84 之间运行。3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 1.95 万亿美元。

中国金融业能够保持这样良好的发展态势，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于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高度领导，得益于金融改革开放的推进。

一是宏观调控及时有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及时部署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根据形势调整，注意把握政策措施的方向、节奏和力度。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政策总量，金融调控成效明显。各金融监管部门贯彻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努力增强监管的有效性，治标与治本结合。

二是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的成果，通过增资、股改上市等手段，金融机构治理逐步规范，金融市场更加透明，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

三是我国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较大潜力。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蕴藏的巨大需求和潜力。改革开放 30 年建立的物质、科技和体制基础，有充裕的资金，丰富劳动力的支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四是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我国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多，财政债务相对比较小，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发挥金融稳健运行的优势，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关键阶段，中国经济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大局，充分发金融业自身优势，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是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确保社会资金宽松。金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在当前形势下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维持市场利率稳定。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灵活利用利率、准备金率等多种工具促进货币信贷规模合理适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合理需求。引导商业银行树立正确经营理念，科学制定考核体系，促进信贷均衡投放。

二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信贷经济发展的质量。为实现新一轮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引导金融机构区别对待，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合理均衡放款，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加大对民生工程、

三农、重大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基本面和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但暂时出现经济困难的企业给予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设立中小企业贷款补偿机制。按有关方面的要求，设立小企业服务机构，加大对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贷款业务，努力实施项目重组。

三是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必须坚持服务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宗旨。当前从我国金融业总体来看存在竞争力不足，效率不高，产品种类难以符合社会需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金融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短期和中期债券等等。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发挥地方融资平台的作用。全面推出利率交易，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进出口核销制度的改革，改善服务贸易的管理，支持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健康发展。积极稳妥便利企业对外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做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加强跨境资金流出流入的管理。

四是完善风险管理机制，稳定金融稳定。这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金融体系出现问题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坚持风险管理底线，加强风险管理分析，增强金融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贷款审评发放工作，防范票据风险，严格执行项目贷款资本金要求，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和水平，防范利率风险水平。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金融机构应及时提供资金支持。

我相信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金融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改进金融服务，完善风险管理，一定能够为中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做出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整理：巩辰卓）

◆中美双边关系全景展望（2012）

演讲人：Robert Zoellick（世界银行前行长）

【精彩语录】“我们要证明，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中美双方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完全能够凭借此利益关系实现两国关系再平衡，给中美两国带来经济上更高的成就。”

尊敬的朴主席，非常感谢您所作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周到安排。受我的好朋友——复旦教授吴心伯之邀参加此次盛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吴教授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美两国刚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方面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的介绍而认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为此次论坛提供了资金资助，帮助论坛更好地实现此次盛会的宗旨——加强区域建设和合作。

去年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的时候，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回应，今年三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提出，想要在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我想习主席的概念可能是源自对于历史上的强有力领导力量的研究。在去年中美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先生说：“我们要证明，大国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主流大国之间发展合作关系的新渠道。美国哈佛大学的格雷汉·埃里森和约瑟夫·尼耶把这一挑战比作“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来源于公元前 5 世纪的伯罗奔尼萨战争，指雅典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力量转变对竞争局势的影响。有的力量转变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有的则会引发冲突。

一、中美关系的实质

今天，我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概念的基础上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将是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我的朋友罗德，澳大利亚前首相和外交部长，也曾在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为中美关系规划了一个新的战略路线图，相信双方应该不断地加强战略合作以及对话。我希望能够再补充一些具体的政策，以推进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这些政策将主要聚焦在经济、安全以及一些中美双方需要解决的障碍等方面的问题。

在 2005 年，我就提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崛起提供了支持。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开放可以在贸易、投资、科技、增长以及安全等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邓小平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20 世纪末的国际关系体系必须要随着时代而改进。保持并扩展整体利益，适应新的挑战都需要被考虑进大国利益中去。如果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能认同这一基本的国际体系原则，这些国家将无法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表现的更像一个不情愿的利益相关国。许多人关心中国是否对这个定位有争议或者能否适应这个角色，或者像中国的一些声音所提到的，中国是否希望新体系的到来。如果是，那么

第三部分 美国

即使只有三篇，我们也依然将中美关系的论述独立成章，因为这三位演讲人是国际知名的美国经济和外交专家，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论述，是上海论坛十年来一个重要主题的缩影，每年都有数十位全球专家在上海论坛上谈论中美关系，因为，身处太平洋两端的中美，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更是亚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亚洲，绕不开美国。

这个体系会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是否会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带入国际关系中等等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引出了另外一个疑问：中国对于现有国际体系的批评是否考虑到了中国达成目标的成本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这些问题首先在亚太地区被提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在考虑可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中美是否有系统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特定政策严肃而深入的交换意见。

二、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需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令人震惊，在过去的 30 年中，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平均 10%。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资直接投资目的地。而美国的 GDP 总量仍然占全球的 22%，尽管随着发达经济体占据技术前沿，生产力的提高更加困难，但是美国近期在能源、软件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还是展现了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不同寻常的适应和复兴的能力。不同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甚至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人口出生率是很乐观的。美国与其他北美伙伴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同样展现出了很好的前景。

然而随着全球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使得中美两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必须做出更多改变。去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部委同世界银行合作共同推出了一份名为《2030 年的中国》的报告，它很好的描述了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研究人员尝试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中国同事明智的指出从历史角度看，直线型的发展计划是不可行的。世行回顾了 101 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属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并发现截止 2008 年，其中只有 13 个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希腊。

中国过去非常依赖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所以中国必须要适应全球结构的变化。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出口的一半，并贡献了过去 5 年中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量，中国不能再依靠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来实现增长。中国需要改变发展模式，更多的依靠内需并加强私人部门所扮演的角色。随着投资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增加，鼓励创新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变化将使得更多的中国人从他们数十年的勤劳中获利，另外消费的增加也会使社会压力显著下降。《2030 年的中国》还规划出一条通往新的增长模式的路径，包括完成土地、劳动力、企业以及金融的转型；开放创新系统使得中国能够移动到价值链的上端；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重建财政系统以使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能够匹配；净化环境并为稀缺资源定价；考虑中国结构调整的国际影响等。

我并不期望中国的新任领导人能够上演“大爆炸”式的改革，但我确认他们和省级领导将会进行实用性的实验。李克强总理已经指出，通过城镇化，中国可以将土地、劳动力、企业、教育以及其他服务如消费、生活标准、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可持续性、金融、政府管理等诸多议题联系起来。甚至认识到需求的改变也是一个重大的前进。二十年前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政治的抵抗，不愿意去做一些新的改革。而现在的首相安倍正在采取大胆的举措而进行新的改革。然而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将会很难，中国领导人需要保持增长的平衡并同时改变未来的增长结构。“新型大国关系”期待着经济上甚至是体制上的改革。中美双方应发现共同利益，支持结构改革，实现两国的经济再平衡。

我们还要去考虑更多的经济方面合作，比如增加生产率，创建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更多的企业家创新的机会，并且不断扩大内需，中国必须在自己的服务行业开放竞争，中国的私人部门应该扩展其作用。除此以外，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外国企业也可以把更多的技术和资金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拓宽自己的服务行业。这样一种合作可以减轻贸易的不平衡和摩擦，并且能把合作做得更好。中国也必须把教育、技术、风投、网络以及知识产权都放到创新日程上去进行发展。而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去帮助它本身的发展。另外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劲、更灵活的安全保护系统确保中国的服务行业能够发展得更好。

在美国也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金融方面的内容，可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护网络。另外中国的食品需求和水资源的保护也可以得到美国产品、技术、体制的支持。更开放的市场可以拓展环太平洋农业合作并且提高生活标准。

我们在能源和环保方面还有很多的双边合作机会，其中包括一些资源分配，还有对水的净化以及空气质量的改进，土地使用的改善等等。所有的这些工作也必须让我们以更好、更灵活的市场机制进行支持，同时保证安全有效的管理。中国需要这样的一种改变：从一个有着许多最小收益的储蓄者的国家，变成一个有着许多在私人部门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投资者的国家。中美以及其他国家都需要更好的框架去鼓励投资并同时管理国家安全和敏感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 21 世纪的领导人可以参考邓小平和朱镕基建立起来的框架，利用市场、规则、竞争、机会和国际经济标准去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进步服务。美国同样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特别是在养老和健康保健系统、税收改革、基础设施公共与私人伙伴关系、技术和职业性教育等领域。美国福利项目现在每年人均花费是 7,400 美元，这超过了中国的人均收入。中美两国都有很好的理由去推进结构性改革。当然在未来通过我们的携手，也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的这样一些改革取得的成就也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状况的提升。

我感觉中美的经济方面的对话，不管是通过战略上的，商业上的，还是通过 20 国峰会的 WTO、APEC 这样的组织方式，总是能够带来很大成效的。另外中国的不断增长以及美国的经济不断恢复，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双边都必须要去探索这种双赢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想法都可以成为事实，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开放的创新和解决方案。另外这两大全球的强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美国和中国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合作方法和可能性。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创造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系统。比如说中国的很多服务系统开发可以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和 WTO 之间的关系、WTO 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在 1999 年签订了。为全球的外包和物流供应链系统创新以及消费者带来了很多好处，现在 WTO 也在考虑自己的 ITA-2 的工具，使它能够更好地去促进服务业。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方面也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机会，比如说安全、食品、贸易、政府的采购等等。另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压力，必须要去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管调，在过去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归条的签订，鼓励国有企业的操作更加规范化和合规性。美国和中国双边我们必须要考虑未来的财政货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也必须要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来做进一步的调整，这样可以促使更有效的全球财务货币系统的形成。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中国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大国关系的新时代需要主要经济体更多的去调整、来适应改革带来的变化。

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很好的关于发展的经验和观点，不管是原材料、农业、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是投资行业的发展，中美双方在经济增长，有效管理，透明度，反腐败，法制、贸易，控制经济周期等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机构来强劲双边的关系。另外还要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包括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低碳社会的建立等等。如果说中美双方出现了一些争议，我们双边一定要去做很多的讨论，而且国际的系统，一旦双边沟通不好就很难运行，如果说中美之间能合作，那么其他的国家都将会参与进来，并且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

但是中美目前缺少一个处理安全问题的组织架构，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我认为这与两国的体制差异是相关的。在中国，解放军向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报告，该组织中只有一到两个非共产党党员。我也发现中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甚至是国务委员级别的也只是在自己的军队行动了之后才有能力进行干预，有时甚至已经对中国的外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外交方面和军事方面以及经济、

环境保护方面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

另外我们有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双边必须要关注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着军事方面的一些交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水平和层次，所以我们经常在考虑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更进一步地深化双边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安全方面的关系，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考量，特别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关系。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已经考虑到必须把这个需求强化起来，深入地讨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话题。我们也必须要用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方面的外交、安全以及国际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军方、政府官员、还有党员都要去做这方面的讨论。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关系可以给到我们一个补充的新的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目前这个对话已展开在很多的话题上，但是我们的频率性还是不够强，而且层次也不够高。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广泛的讨论以做出一些战略性的决策。

我们也参与过这样的一些对话，而且参与了很多来考虑全球的观点、利益、目前的概念和框架。我们还需要有更高层次的一些对话，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对话，并且是从历史的角度，地理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技术的角度，以及政治限制的角度，还有国家的利益角度以及寻找双边利益的角度来进行，并且它也会帮助中国和美国更好地去处理彼此的不同点。在这样的对话当中，美国也应该提供非常明确的解释。美国的政治并不是像中国想的那样在一个限制的基础上去进行的，另外美国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解释中国的一些行为。最重要的是中美双边是有非常强劲的共同利益，而这一点就是双方必须要深入共同发展的。包括海事方面的安全，这对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自己周边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亚太区域能够起到安全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要更好地处理交通、物流、信息流、人员流以及能源的价格，更好地开发节省使用新资源。我们也要在海外地区更好地运用资源，包括油的资源，并且进行更好的技术开发。其他资源的开发需要联合我们的社会，包括环境的措施，综合地来管理不同区域资源所属权的争端。包括要为其他的合作伙伴也能够带来安全感，这样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实现稳定化，避免潜在的军事化的冲突和争执。当然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更是如此，包括对一些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进行的打击。包括打击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我们希望也鼓励伊斯兰的事件能够以和平的角度来展开相关的磋商，所以上都是一些重要的利益点。我们这边也需要去分析一下以上的这些共同的利益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因素，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

然而，如果无法很好地解决亚太地区的争议，这些共同利益甚至是经济的互相依赖都会无从谈起。所以对于中美以及领导层的挑战，就是如何以全球化的合作来降低区域的摩擦、冲突，而不是让区域性的冲突伤害到全球的合作，当然中国在我们的沿海岸也有一些安全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对话。除此之外在联合国的大框架下我们一直在讲到相关经济的安全和其他联盟等等。美国一直在强调这些联盟的重要性，通过大的框架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安全，中国和其邻国包括和日本的关系，不能够被孤立于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和其盟友关系之外来独立考量。同时，美国的伙伴国家也十分重视他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领域与中国的联系。

如今中国在亚洲的伙伴数量有限，而且较为贫穷，并不可靠。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数量与日俱增，如果中国的影响力被错误的解读成对其他国家有一些相关的威胁的话，中国自己也会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所以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必要和美国的盟国来建设一个纽带关系，而不是说让他们的盟国感到更加威胁。所以中美能够联手更好地在全球化的体系下培育一个区域化的很好的合作体系。除此以外我们也关注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意识到在我们的安全框架之内进行经济的发展和与合作能更好的进行资源分配，包括海事安全的保障等等，所以任何的国家都不应该卷入冲突，我们应该通过合作的方式，更好地分享彼此的利益。东北亚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朝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除此之外朝鲜可能还有一些核

试验的威胁，他们的举措给这个区域带来了不安全的元素。他的一些国际贸易，以及非法的走私比如武器的走私活动等，也构成了一些威胁。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关核裁军的协议，朝鲜有所拒绝，可能会对人民有一些伤害。朝鲜现在正在进行弹道导弹包括一些核武器的实验，所以朝鲜对于韩国包括美国都有先发制人的威胁，日本同样也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从传统角度来看，中国认为朝鲜是一个安全的缓冲区。但这个逻辑已经过时了，侵犯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由朝鲜引起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加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之前戴秉国先生和我在 2005、2006 年展开一些安全的对话，当时我提议如果朝鲜能够像中国一样发展，那美国会感到非常满意。如果朝鲜半岛能够实现统一，美韩同盟也会消除朝鲜半岛的疑虑，毕竟朝鲜半岛是有着成为相邻大国的军事基地的历史的。如果统一的朝鲜半岛继承了核武器，那么日本就会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无核国家，这会使得日本非常担忧。而且，我也同戴秉国先生讲过，从我的角度看，美韩同盟是由南部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来维系的，而不是中国方面所猜想的鸭绿江的陆军。相反如果美韩盟友关系结束，日本可能会是这个区域美国唯一的盟国了，这会使日本比较担忧。

如今中美的战略制定者需就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猜想之所以中国在敦促朝鲜结束其敌意的一些行动，包括开始改革方面存在的犹豫，是因为担心无法控制其进程。包括美国以及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盟友，可能也对它潜在的影响非常关注。所以中国这边确实有一些压力，现实就是如果威胁这样的一个朝鲜，敦促朝鲜来采取相关的变革措施，可能会对中国对于地区的安全地位有所调整，或者说影响。所以这些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避免双方的信任缺失。

除非中美能够减少网络安全带来的不信任，不然所有“新型大国关系”实质性的提案都不会有结果。网络安全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安全形态，有时候可能在网络空间会有一些冲突，包括间谍以及商业间谍的活动。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也相信，这种商业间谍的活动是无处不在，比较泛滥的。包括蓄意破坏，以及网络的一些战争。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基于虚拟的空间，发起的一些战争，有时候它可能会有附属的伤害，包括大面积的损伤。随着核武器的到来，人们非常关注一些安全策略的制定，主要针对这些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管理。网络的安全和传统形态的安全有所不同，所以在 21 世纪我们必须能够关注到这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否则我相信习主席他的一些建议未必能得到很好的履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关注到网络的安全，从而更好地把习主席的愿景加以兑现。

美国内部有这样一个讨论，关于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是否能够接受一个能够更好地推动整合的，基于原则和规则的体系。包括基辛格也认为，中国把自己视作是中心国家，只接受附属关系。这种观点上的分歧，部分的体现在不同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经济政策制定者们观察到邓小平可能注意到全球的改革开放的角度，之后朱镕基总理进一步去推动中国加入 WTO，更好地融入国际的关系包括规则。中国在最近五年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态度，我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也确实目睹了中国的积极态度，也非常支持多边的合作机制的打造，所以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安全威胁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所以中国在 21 世纪对于国际关系的概念也在不断地演进。

三、总结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未必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去应对一些挑战，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些机会去做一些探讨。不仅中国为这个关系的建立带来很多变化，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也并不愿意维持现状。有些评论家会问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似乎不愿意去维持现有的秩序呢，一个美国全球策略的象征是一美元纸币。在它的背面，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印章，这个印章是在 1782 年由美国国会批准

的，里面有一句维京人的格言：新时代的秩序。正如我的一名外交历史的教授在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美国历史其实都是关于一种新秩序是否局限于初创的美国还是能够有更广阔的应用。除了安全、能源、自由贸易以及金元外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也会寻求提升那些在美国革命中体现出来的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原则。今天，这些原则不仅在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中得以体现，在中国感兴趣的讨论中，包括良好的管理，政府行为的控制和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构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是非常有趣的，它包括了比一个新权力平衡更多的内容。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但是被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所束缚。美国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国家，但是在寻求转型和变革。目前这两个国家都是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和他们各自的区域其他的国家也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他们相关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全球的态势。

我希望今天我在上海论坛提出的一些想法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在 6 月份我们两国的元首对话的一个议题。这将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我热切期盼能够听到你们的观点。

（整理：刘训志）

◆ 中美关系：冲突、稳定及其前景（2012）

演讲者：James B. Steinberg（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精彩语录】“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分清了这条界线，一方面保持对维持亚太长期和平和繁荣的可能怀有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我也现实地提出了警告，就是我们也有无法成功实现我们共同利益的风险。”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上海论坛，在此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进行创新性的思维。我们也会共同地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区域，以及全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来说，我已经离开了政界，现在在做一些学术，但是也希望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像论坛主题所说的，思考为 21 世纪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亚洲，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同时，上海论坛也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反思我们的历史。刚才我的好朋友朱民先生已经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些表现这种感受变化的迹象。我 16 年前陪同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访问过复旦大学，他在这里谈起他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前进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两年后克林顿总统访华来上海的时候我也做了陪同。在过去的 19 年中，我在美国政府中有这样的机会，对我们如何思考中美关系和战略以及东亚战略等问题发挥我的影响。不过，我想说明，今天我在这里的发表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说的，并不代表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一、亚太关系的过去：冲突与稳定

在这个地区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这一点值得我们一再重申。四十年来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人们难以想象得到。不过，对那些阅历超过二十或四十年，或是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他们还是有可能回想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许多次，经济的力量和影响穿越太平洋，推动、改变了亚太地区。我出于谨慎补充这一点，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避免假设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定会成为明天所发生的，同时我们也要抵制住以当前情况对未来事件做直线投射的诱惑。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尤其重要，他们有责任不仅思考今天和明天，更要放眼长远的未来。当然我们也知道，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说到东亚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的领导人，有很多变化，就以今年为例，台湾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年底美国和韩国也会有大选，对于中国来说，十八大也会召开。这些都是计划内的领导层改选决定，但也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件，例如我们近来在朝鲜所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希望看到今年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调整，很多的一些变化。但无论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无论是非常重大的还是普通的，我们相信这些领导人的决策都会对东亚地区、亚洲地区、全球的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这需要我们持续来进行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格局当中，东亚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大，而且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在气候变化等方面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也会看到各国的领导人会和各国在政治方面有更多的交流，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倡导的。而且在未来几年，这些领导人所做出

来的决定对我们后代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应该说这些重要的关系，不仅仅中美，还有包括日韩、印尼、印度，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它们的决定都会对于政界、经济格局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说到亚洲的选择，不仅仅是它们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选择，相反，各个国家要首先考虑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财政预算和政策、社会的福利、环境，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国内的选择也会对国际的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我们的国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增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各个国家不可能是各自为政，而是通过评估地区内其它国家的地区战略来做出选择。其实，我们所在区域的大多数国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关键行为者意图的评估的影响。对美国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反之亦然。韩国则要考虑朝鲜，还有日本、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朱民之前演讲到的一样，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也许今天以及近几年来，地区经历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前二十世纪有很多血腥的战争或者斗争，现在尽管面临着风险，但我们更多地来强调稳定性。稳定性对于我们过去三十年内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我们一定要维持这样一个稳定性，这对我们的继往开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今年即将上任的这些领导人来说，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的战略稳定性，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个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享有这样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地区内的领导人，尤其是美中的领导人必须要做哪些事来继续推动这种增长和稳定性？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区的一些冲突，有很多原因，可能有种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民族认同、资源争夺的原因，或是领土纠纷、意识形态，其中有一些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但还有许多因素仍然在今天为短期内的稳定带来潜在的阴影，甚至是绝对的冲突。以领土冲突为例，我们在这个地区面临的最危险的情况来自于尚未解决的国家 and 民族诉求以及相关的领土纷争——从朝韩的领土分界到日本北部的领土再到中国东南海一带的领土纠纷。几乎每一个地区双边关系都处于领土争端的阴影笼罩之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分歧是与其它长期冲突的根源紧密联系的，那就是自然资源和海域内巨大的潜在海洋资源。

但这些都并非冲突和摩擦的唯一原因。也有因为贸易和经济政策、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摩擦。因此，面对这些持久的冲突的根源，对认为地区仍然处于和平的直觉进行反思，我们再次强调其重要性。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常常是，至少在目前，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来维持现状，而关于改变现状有足够的不确定性，这促使领导人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来支持稳定。尤其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它能够帮助中国实现长期的发展战略。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偶然地出现，所以更重要的也许是，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确保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仍然是如此重要。

在亚洲地区，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现在可能是冲突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希望能够实现祖国的统一，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我们也必须要确保整个和平的发展，无核的状态。中国大陆和中国国民党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对于马英九来说，他现在也是绝对不希望打破这样的状态，而是希望能够继续进行探讨。对韩国以及朝鲜目前来说，我相信没有人想冒这个风险来改变现在的状态。中国东南海地区也是一样的模式，尽管偶尔的冲突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当面对任何严重风险的升级可能时，各方都表现出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倾向。

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稳定性？我觉得要这个问题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正如之前朱民所生动描述的。第二个方面，美中领导人之间相互承诺，会打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尽管我们双方存在差异，并且因为彼此上升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挑战。我想强调后者，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一体化可以有利于和平关系，但仅靠它自身却并不够。我们知道，IT 技术和现代化的交通不仅促进了贸易，也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从而能够增加国家对每个个人利益的依赖性。

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链条越来越大，以维持政治关系来支持贸易的动力就更大，联系就被建立了起来。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维持繁荣最应维持一个积极的政治关系，它能够给例如货币和贸易实践中的经济矛盾带来缓冲。来自经济一体化的稳定也会影响政治的实践。对于不同的地区，政治、政党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为他们的公民从经济的角度来谋福祉，这是对风险的另一个约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在不断地在繁荣、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政府能带来繁荣和美好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能够为政府获得公民的支持。然而我也强调对于目前的相关状况，不能自满，20 世纪的上半段欧洲也遇到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所光靠经济的一体化还不足以维持和平与繁荣。误解和误算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威胁稳定，尤其是在国家力量动态变化中的时候，即使在一些有很强利害关系来维护和平的地区都是如此。一战和二战中的警示应该为我们所有的领导人所牢记。

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及努力

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要多方参与、展开合作。现在其实不止单一的因素在影响稳定，所以中美如何去管理双边高层的关系，不仅仅对于两国，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和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奥巴马总统也把中美的关系称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国的关系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以及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区内的中美关系的管理就有着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此期间，美中是存在分歧的，地区陷入了战争和冲突。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我们的关系慢慢和解和稳定化了，尽管重要的冲突仍然存在，但广泛的冲突已经避免了。

所以在 70 年代邦交正常化后，中美关系的管理或多或少是基于双方的理解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包括贸易、经济政策、人权和民主治理等，可能双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美国两党的领导人确实在言行上都表示欢迎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她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同时中国的领导层也接受美国在东亚将会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也会助力于亚洲和平和稳定。在最近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以及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双方都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双方都在采取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求同存异，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反海盗，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问题上。

但近年来，双方已经开始挑战这种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利用他们称之为“历史的教训”，声称两国注定是最好的对手，甚至也许是敌人。在美国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声称，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对美国的威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要以牺牲另一国为代价。在中国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本质上是与中国的安全对立的，我们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是对中国不加掩饰的平衡和牵制力量。从这些言论中，他们主张和呼吁一种明确的政策诉求，对美国，要控制和抵制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要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

如果我告诉你，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缺陷的，会令你们感到惊讶吗？他们所产生的那些政策选择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我满足。如果中国的领导认为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寻求阻止这一目标的政策，包括寻求旨在消除美国在地区中力量的政策，从而将那些认为中美关系是正面的人的行为依据变为无效。类似的是，如果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试图破坏美国在地区中的积极参与，或者在恐吓美国的朋友，他们也会与我们的传统盟友建起更强的联系，来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即使美中两国中那些相信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人，他们也在试图采取预防的策略来反对坏结果的出现，即所谓的“反向交易”。他们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会传播互不信任的种子，这可能会导致螺旋式的作用和反作用，也会让那些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出现。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相信有一个铁律，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

其实有一个良性的看不见的手，慢慢通过两国关系的交流，把我们朝有利的方向去导向。相反我也相信，如果缺乏有远见、有勇气的领导层，那么令人不越快的结果就会出现。

当然对于危险、风险的规避，双方都要能够去采取有勇气的决策。美国人注意到中国在言论上做出了和平发展到经济全球化与亚洲选择的承诺，同时也对中国能否言行一致持有疑问。同样，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否符合一个反复的说法，即我们要支持强大和繁荣的中国，这也有很多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国的领导人的发言里都提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战略互信”，而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话。

在过去的三年半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两个国家在对话方面越来越深入，同时可以谈到广泛的话题，这些对话都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明证。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对话是最为急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军事对话取得进展、建立了战略安全对话之后如此振奋的原因，我自己也非常荣幸成为了第一场战略对话会议的联合主持人。

三、中美关系的和谐前景：对话与信任

对话仅仅是个开始，在对话的背后也要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把我们传达的一些观点加以支撑。我把这种行动叫做“战略再保证”，双方都能够采取一些具体明确的措施，来确保我们的意愿与口头的承诺有很好的匹配、一致性。我稍微解释一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决定来支持和维护中国入世这是很好的一个战略保证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去证明美国确实兑现了之前对增强中国繁荣的承诺。在中方这边我们看中国的领导层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采取了很好的措施，在最近也就是2008 年、2009 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领导层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维护全球的经济福祉。现在，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平衡经济，放宽货币限制，从而能够真正地保证中国并没有以其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寻求持续发展。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合理地期待美国来管理自身的财政问题，同时避免伤害到中国经济的利益和债券投资。

在安全方面，我们双方也需要采取很重要的措施，来打造双边的信任，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战略的再保证措施。例如，两国都能够去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合法利用空间，不增加他国空间资产的风险。同时两国也可以制定一些标准、准则，使我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损害或破坏对方正当的安全考虑或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创新的做法，消除海上意外的危险。现在，这个过程并不会很容易。双方要建立互信，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的，因为对于很多重要的话题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例如在美国，我们相信过去对台湾国防和军事需求的支持是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对话和稳定的。而中国却“强烈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相反的做法才会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奥巴马总统也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认为人权的改善将对中国的繁荣稳定有利，但是中国会把这视为是美国对于中国主权的干涉以及一种削弱中国的企图。

我们反过来也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和军事现代化怀有疑问，正如在南海问题上所见，我们看到了在和平解决争端上的不一致。我们常说要“管理”两国之间的差异，但我们要做的更多。我们要毫不避讳地解决问题，并试图确保我们哪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所分歧，我们的分歧也不会被误解为敌意。我们还需要认清，在管理双边关系上，我们也需要依靠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点。担忧美中共同管理亚太地区听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在很多区域内却是事实。同样另那些国家担忧的还包括被卷入美中矛盾交火之中，或是被要求选择支持一方，因为大部分乃至所有的国家都更希望和美中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出于共同建立一个多边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承诺，我们两国在治理双边关系上的能力会得到加强。这些多边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的广泛的利益问题，也为避免面对许多双边关系中都存在的“输赢”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

因此，从 APEC 会议上的东亚峰会到在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更多非正式机制中各地区包括三边和其他对话的努力上，我们看到，今天，建立一个允许美中关系更加蓬勃正向发展的框架，我们都正在摸索和努力。

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分清了这条界线，一方面保持对维持亚太长期和平和繁荣的可能怀有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我也现实地提出了警告，就是我们也有无法成功实现我们共同利益的风险。但是我真诚地相信，像上海论坛这样的会议以及你们产生的对话将会使这个天平朝着更为乐观的方向倾斜。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与大家探讨的机会。

（整理：杨军）

◆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2009）

演讲人：Reuben Jeffery III（美国前副国务卿）

【精彩语录】“展望未来，美中两国的决策者都必须牢记：和谐的双边关系不代表竞争的消失，而是由灵活的冲突管理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所决定的。我们必须要应对一些潜在的冲突，同时还要在其他领域促进合作。尽管某些问题很重要，但美国和中国都不能让个别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成为扭曲甚至阻碍我们整体关系的绊脚石。因为只有双赢的关系才能够带来更持久的繁荣和更稳定的安全。不仅对中美两国来说如此，对全世界亦是如此。”

大家好！谢谢袁院长、杨校长，以及复旦大学和SK集团的同仁们，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参与本次盛会。我很荣幸能代表耶鲁大学和华盛顿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参加本次论坛，我也谨代表耶鲁大学莱文校长因故不能前来参会，向大家深表歉意和遗憾。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854年，来自广东的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了第一名从美国大学获取学位的中国人。容闳回国后，和其他中国的改革者一起积极创办教育事业，倡导科教兴国。自此，耶鲁大学便有幸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源远流长的一笔。请恕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是在这里我要着重提到两位。一位是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登辉先生，他后来担任了复旦大学的校长，而另一位是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颜福庆先生，他后来担任复旦上海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的沟通和交流也是非常频繁的。现今，有11000多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比往年增加了25%；同时还有81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比往年增加了20%，也是美国外籍学生中人数最多的国别群体。可以说教育的发展和沟通交流都大大增进了两国的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作为一名耶鲁校友和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另一方面，我也曾有幸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一职，主要负责经济、商务和农业方面的事务。现在是我第一次以民间的身份来参加这样的论坛。虽然我一度非常荣幸能够代表美国政府发表言论并在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过一己之力。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心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会采取哪些方针和政策，因为很多政策都是在新总统班子成立后的一百天内确定的。然而我认为，现在下定论还未免为时过早。所以，今天我想更多地就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谈一些看法，因为这对于中美两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最后，我将提出一些中美关系方面我的建议，以促进双方的发展和维护两国安全。

一、中美经济关系回顾和展望

首先，请大家来看一组能够说明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的数据。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850亿美元，而这个数据在1992年的时候只有330亿美元，可见增长之快。同时，美国现在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约为570亿美金，是在中国投资的第六大国

家。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组我最喜欢的数据：目前，在中国有800多家麦当劳的连锁店，每天销售的汉堡包高达100万只。当然现在中饭时间还没有到，提汉堡还有一点早，但是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经济往来是非常紧密的。在2007年，中美两国在一起贡献了世界GDP的30%。

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于中国 and 美国的长期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都非常信奉贸易的自由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首先，美国致力于将中国充分纳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归功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且鼓励中国承担与之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东亚乃至全球其他各地区的繁荣稳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进出口货物的需求也在扩大，所以美国政府力争为美国国内进出口商拓宽中国市场。我认为：美国政府会继续与中国政府合作，大力支持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尤其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措施，并鼓励中国继续完善更加灵活的、基于市场的货币兑换体系。

再次，美国大力支持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并承担相应责任，希望中国能更积极地参与到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会议、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等，以及其他多边论坛和机构。同时，为了促进双边经济合作的繁荣，美国也寻求与中国在其他层面和领域的互信合作。我坚信两国间的合作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会得以延续，而任命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国务卿希拉里分别担任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代表也正体现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二、金融危机对美中两国的冲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首先我想引用一些数据和指标来说明。去年一年，美国家庭的财富下降了18%，而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创25年来新高的8.9%。美国最近的GDP数据显示为1958年以来半年内最严重的下滑。而这次危机也当然被反映到了证券市场。2009年的第一季度道琼斯指数跌落到1939年以来的最低点，标普500指数也从去年9月份以来连续跌了6个月，这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情况。所幸的是，其间在最近4、5月间有了显著的反弹。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可以就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不断争论研究，但事实上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几个月前，一份由英国金融务监管局发布的“隧道报告”给出了一种相对简洁明了的解释，即这次经济危机是由三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第一，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加剧的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低通货膨胀率；第二，金融创新和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这方面的监管力度不够；第三，资本的缓冲是不足以解决资产价格膨胀，并且作为遏制通货膨胀的因子，这些缓冲并没有起到控制经济失衡的恶性循环的作用，炒热了资产价格而妨碍了流动性，最终导致资产泡沫破灭。

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系统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一道对这次危机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力争在第一时间控制住它的蔓延。一项最近的预测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近13万亿美元来支持金融业。我们都想预测全球经济和证券市场的走势，但是也要记住巴菲特的一句话，那就是“对未来的预测更多透露的是预测者的信息”。现在应该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经济前景是复杂化的。美国联邦储备主席本·伯南克已经启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第一株嫩芽”计划，并且在上周刚刚表示，美国经济的衰退可能已经放缓。同时有迹象表明：消费链上最终端的家庭消费需求正在趋于稳定。然后不好的预测也包括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遭遇更多的失业等其他衰退迹象。

中国的经济前景同样复杂。正如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上个月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总体上显示出

了恢复的迹象，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举步仍然比较艰难”。我想说的是，中国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是有力的，显示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对其效果充分的认识。我还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的时候就和我的同事们为中国处理这次危机的反应速度和规模所折服。

而现在，全球的经济金融产业仍然处于低迷的势态，且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稳定的增长。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谓的“福”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加重视和维护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已经在许多双边或多边论坛，如G20会议上共同探讨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话题，并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促使了参会的各国领导达成共识，启动了追加的 8500 亿美元的 IMF 基金和多边发展银行来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资金将有利于反周期的消费、银行资金重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国际收支支持、债务延期，以及社会保障等。同时，美国还一直在大力支持中国加入重组的“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在 IMF 内部的名额改革中支持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席位和影响，并扮演与其国际经济地位更相匹配的角色。

三、中美合作六原则

这次金融危机自开始至今，中美两国已经开创了交流合作的新局面，并且我坚信这一形势还会继续。但是，请允许我退后一步来试着指出六点可能对决策者们有所帮助的原则。

第一，要照看好我们共同的花园。曾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先生说过，“如果你经常照看你的花园，在杂草刚发芽的时候及时地将它们清除，你种的植物就会繁茂生长。”他将外交比喻为“种花”，而这个比喻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尤为适用，因为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而且我们对待外交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会产生矛盾。中美双边关系需要两国政府领导人最高程度的持续关注。

第二，要有耐心。美国官员在与中方交涉的时候，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不仅有美好的未来，还有辉煌过去。中国曾在历史中贡献了很多发明和创新，改变了世界，比如茶叶、火药、造纸等。未来中国还会有改变世界的技术，而且会对今天的全球问题制定解决方案贡献巨大力量，比如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扶贫、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等。美国政府也还要记住：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这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两国都必须采取长远的眼光。

第三，关注小事。微观的改革有时候会带来最大的回报。中国现在采取措施使它的贸易法律透明，这样就促进其他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公司可以在制定商业计划的时不用担心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同样，银行和保险业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也都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第四，鼓励多边组织的措施。我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经常有机会和中国的高层官员会晤。每次会晤都提醒着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一员。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缔结了一系列的条约，加入一系列的组织，比如签署全面禁止核武器测试的条约并且选择加入 WTO。这都象征着中国越来越有愿意同国际的规范接轨，这对中国是好事，对美国也是好事。因为参加这些机构之后，我们就有了更多沟通和争端解决的平台。

第五，改变经济融合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前 30 年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自由市场的开放、法治的建设、私有化以及开放接受外国投资。随着中国致力于在成长中跨出新的一步，在这期间可以在两国都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改革，譬如继续发展并开放金融业等。

第六，也是最后一个原则，美中双方都必须承认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美国的经济性高度依赖中国，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这帮助减少了我们的赤字，并且让我们的利率保持在低位。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从中国购买到低价的产品，因此美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正如鲍尔森

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 10 年间所说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不是中国超过美国，而是中国不做必要的改革来维持它自身的发展”。同样，中国的经济也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国之一。中国和美国必须携手并进。两个国家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对方的成功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在中美关系建交 30 年来，美中关系已经蒸蒸日上，对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双边关系的持续改善，能够带来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增长，更多的跨国界问题的合作，比如环境保护、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可以确保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

展望未来，美中两国的决策者都必须牢记：和谐的双边关系不代表竞争的消失，而是由灵活的冲突管理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所决定的。我们必须要应对一些潜在的冲突，同时还要在其他领域促进合作。尽管某些问题很重要，但美国和中国都不能让个别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成为扭曲甚至阻碍我们整体关系的绊脚石。因为只有双赢的关系才能够带来更持久的繁荣和更稳定的安全。不仅对中美两国来说如此，对全世界亦是如此。

在当前，美中合作关系的基础就是教育。因为教育使得两国人民都能够追逐他们的梦想，最大化地开发他们的潜能。在 200 年前，美国的先驱富兰克林先生就提到过：“对知识的投资总会带来最大的回报”。这句话用于现在再合适不过了。这也充分说明了耶鲁和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是在为我们培育下一代，为我们的未来奠定基础。

非常感谢大家，我的发言到此结束。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参与上海论坛并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整理：巩辰卓）

第四部分 绿 色

绿色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条件的珍视和关切。在上海论坛的讲台上，对低碳节能环保的呼吁始终没有停歇，在每年形成的共识中，对绿色的呼唤始终是一条重要的主线。

◆能源、政府与市场（2011）

演讲人：James Ferguson Skea（英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语录】“因为低碳发电方面的投入很大，产生的电力的波动很高，因此在这个市场上，需要有政府更加强力的介入和干预。”

早上好！受邀参加上海论坛并做发言我倍感荣幸。我觉得这次论坛的主题“全球化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根据我的专业知识，我从能源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个问题，主要是五个问题。我先是很快地讲一下英国的能源中心的情况，我是在那里工作。还有跟大家讲一下，全球的能源市场的趋势和发展动因，然后看一下欧洲和亚洲在能源问题上解决办法的异同，这跟上海论坛的主题也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英国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些情况，我们在那里正在做一些实验性的政策，来调整和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最后讲一下市场、政府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中心是 2004 年成立的，和复旦大学也有合作，昨天我们建立了这样的合作关系。我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决策者所采纳，在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会采用我们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中心也是一个枢纽和中心，整合在英国的所有有关能源、环境这方面的研究课程。此外，我觉得研究中心也是英国和国际社会在能源研究这方面的一个桥梁。实际上，我们的中心是一个虚拟的中心，不是说一个地方的墙和砖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心了，我们是一个虚拟的网络，跟各大高校和院所合作。

一、全球发展的趋势和动因

接下来是全球发展的趋势和动因，我们对于能源短缺的问题非常重视，对能源短缺的认识也非常深刻，无论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还是工业的角度都强调节能，提高能效。我们特别关注碳排放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温室效应对全球的影响。

首先看一下对世界一次能源的需求。这个需求在不断的上升，如果不是这次经济危机，它有所放缓的话，可能还会上升得更快。同时这种需求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区别，在发达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对能源的需求也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大。当然，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现在经济的发展并不依赖能源，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一次能源的需求都是在上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接下来看一下原油的价格。在第一次石油危机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时候，它的价格是达到了最低，但是我们看到之后油价是不断的上升，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的油价不可能跌到当时历史最低的水平，因为石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再开采的话，这个开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再来看一下原油的进口，石油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就意识到了石油的进口依赖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形成很大的波动，所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降低对原油的进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

进口是有下降，但是在此之后又开始增加，特别是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进口是急剧的上升。另外就是天然气作为可贸易品，其市场蓬勃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地区。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在能源这个领域，技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列出了公共资金进入能源研究领域的情况。从 70 年代到 2009 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可以看到研究的经费是有了一个猛增，最近这几年，可以看到是急剧的上升。当然，这个研发的重点在转变，更多的是从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还有智能电网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核能的研究是急剧的下降。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神秘”的指数，这个指数增长得比中国的 GDP 增长得更快，这就是气候变化指数。我们每年可以看到有一个专门的学术期刊讲的就是气候变化，每年有 8、9 千篇论文在这个期刊上发表。可以看到这样的气候变化的指数是上升得非常高。对全球的能源市场就介绍到这里。

二、欧洲和亚洲情况之比较

接下来看一看亚洲和欧洲的比较。上海论坛动态第 16 期中讲到了全球新能源的发展，并进行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比较，比如说碳市场等等，还有讲到了政府的干预。从市场和政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欧洲更多地依赖市场，比如说他们有碳市场，在亚洲则更多地依赖政府的干预，比如说税收优惠、直接投资、补贴等等。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看到的，内部是什么？我对亚洲的情况不太了解，欧洲是在能源税收和市场设计、研发等方面。也就是说，在欧洲除了表面上看到的比如说碳市场之外，其实它底下也有很多政府参与的项目，比如说政府主导的税收政策，以实现它的能源政策和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跟亚洲的情况也是比较相似的。还有，看一下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就目前它的价格来讲，不会使碳排放降低。现在这个市场形成之后，可能更多地让人们做一个选择，到底是燃煤，还是燃天然气，用天然气来发电。目前来看，如果这个价格这么低，可能对于人们的行为没有太大的影响，要使得这样一个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需要提高价格。

三、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英国所做的一些实验。2008 年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一件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门，专门负责监管能源市场，还有和气候有关的商业活动的监管，即把能源的监管和气候的监管联系在一起，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政策。一件是为英国设立了长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到 2050 年要比 1990 年的基数低 80%。还有是 5 年的碳预算，从 2008 年–2012 年的各个阶段来确定这个碳的排放。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谓的五年碳预算，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期限，五年的期限，使得碳的排放不会在这个期限降低之后又会增加。同时我们确定了碳排放监管政策 15 年的规划，确定它监管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框架，我们知道有时候政客的思路是比较短期的，我们希望尽量的有一个长期的框架的流程，能够使气候变化摆脱短期的政治考量。我们成立了一个“气候变化独立委员会”，我有幸成为这个独立委员会的委员，向国会建议我们的碳排放的预算，由政府确定是不是支持这个预算，并确定这个预算能否达到，这个独立委员会也会对整个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有限地制定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管。

接下来看一下英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预算，这是我们独立委员会来提议的。到 2023 年，相对于 2008 年整个的减少量应该是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 34%；到 2020 年，相对于 1990 年的碳排放减少 50%，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到 2050 年，相对于 1990 年要减少碳排放量的 80%。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预算变成了一个政府的目标，然后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电力行业对我们实现低碳实际上是作用巨大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依靠三大技术：可再生能源、核能和碳捕捉分成的技术。

对于英国而言，我们需要对两大技术进行投资：一个是海上的风电，还有核能。这两大技术将会对英国的电力脱碳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低碳的电力需要很大的投入，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相对于传统能源要大得多。第二点，我们也预计到这个学习的曲线，可以降低新的投入强度。第三点，可再生能源，能源原料的投入是很低的，比如风能和太阳能都很低，而不像传统的能源，石油和煤的成本是很高的。到 2030 年，电价的波动可能会很大，因为风能的投入很高，英国的电力市场也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对长期需要大量投入的可再生能源，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投资者才会对这个长期投资有信心。政府对可再生的电力和现在的电力市场、批发市场的差价会提供补贴。

四、政府与市场之辩

最终我想说的是对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考虑，我当然是指英国的一些实践。能源的一些长期的合同，这个价格要最终如何确定？是由政府还是市场来最终决定？尽管技术会不断地进步，长期而言价格是不断地下降，但是在中期阶段，这些不成熟的技术与传统的成熟的技术进行竞争，所以对于这些低碳电力的价格，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定价机制，是由政府来决定技术和价格，还是让市场的监管者来确定这个价格？这样可能会带来利益的冲突。亦或是由私有的部门来决定这个价格？如果是完全地交给私营企业的话，又有价格暴涨的风险。所以，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最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情况，实际上欧洲如果要实现低碳，在未来的 10 年当中对低碳的电力的投入会非常大。此外，由于英国的低碳目标设立得非常高，而且要通过风能实现，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英国有六大电力公司，很多都是国际性的公司，光靠这些公司是没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在英国进行这么大的投入的，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融资渠道，也需要这个市场更为开放，使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到这个市场。

我以上介绍的是欧洲的情况，我很有兴趣跟亚洲的同事来进行探讨。因为低碳发电方面的投入很大，产生的电力的波动很高，因此在这个市场上，需要有政府更加强力的介入和干预。此处做一个总结，实际上我是提出了在新能源市场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能提出的观点是比较有争议的，我希望在后面的分论坛中与大家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整理：杨军）

◆ 未来的能源选择（2011）

演讲人：Mark Stephen Wrighton（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

【精彩语录】“我认为能源问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为严峻的挑战。未来的能源应该是可持续的，能够支持经济的长期繁荣，并且推动各个国家之间的能源安全。当然，这样的能源不能对环境造成太多的威胁和影响。”

各位早上好！能有机会来参加上海论坛，我感到受益匪浅。能够接触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真知灼见，我首先要感谢上海论坛组委会的精心安排。我很高兴能够参加最后的闭幕式，并与大家一起分享未来在能源选择上的可能性。面对未来，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很多复旦学子也来到了现场，参加论坛闭幕式。我的年纪比较大了，未来的挑战需要由青年人来承担。我认为能源问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为严峻的挑战。未来的能源应该是可持续的，能够支持经济的长期繁荣，并且推动各个国家之间的能源安全。当然，这样的能源不能对环境造成太多的威胁和影响。

一、能源问题的现状

根据规划和预算，到 2050 年的时候，能源的需求量将会是现在的两倍。目前的能源需求量是 15 万亿瓦特，40 年后将达到 30 万亿瓦特，届时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 60 亿增加到 90 亿。此外，随着印度、中国以及非洲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经济逐步崛起，能源的人均需求量会变得越来越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重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而矿石燃料的燃烧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美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国，而如今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全球首位。因此，中美两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携手，积极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前不久，复旦大学与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复旦－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我谨在此表示祝贺。在论坛的开幕式上，我们听到了来自英国能源研究中心的 Skea 教授所做的报告，介绍英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做法，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启迪。我们明白，人口大国尤其需要在这个时候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应对如此大的挑战。

随着能源耗费的上升、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的需求，人们不得不考虑使用核能或者是各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就目前来说，它们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最佳能源选项。当然，提到核能，我们看到事情有了突然的变化。今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里氏 9 级的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福岛核电站也在灾难中被摧毁了，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对于核能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于此类事件是有预先准备的，地震学家估计这一地区地震震级最高可达 8.0 级，并据此在福岛核电站周边建造了高度为 19 英尺的围墙，而海啸最后的高度是 45 英尺，9.0 级的地震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强大和可怕。现在，福岛核电站已经成为核能应用方面的反例，敦促我们对核能的安全使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同时，这样的灾害性事故改变了我们既有的思路。2011 年初的时候，日本正在使用的核电站为 54 个，

提供全国用电量的 30%，日本同时计划在 20 年内新建 14 个核电站，届时提供全国约 50% 的用电量。3 月 11 日的海啸之后，所有的新建计划都被搁置或放弃了。灾难导致东电公司在福岛的 6 个发电站机组全部关闭，5 月 9 日中部电力公司出于对核电站安全性的考虑关闭了中港核电站，5 月 10 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取消原先的 14 个新建核电站的计划。日本的核危机也对其他国家起到了警醒的作用。美国 20% 的电力是由核电厂提供的，美国要求有关部门对其境内的所有核电站进行审核和评估。其他各国，如意大利、德国，也对开发核能持审慎的态度，并对其重新进行了评估。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放射性物质的泄漏，长期来讲，还有放射性垃圾的存储，以及电站建设的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核材料的滥用，铀元素的供应等问题。我们在规划未来能源前景的时候需要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

二、核泄漏危机：新能源措施的反思

在这里，我想通过几个历史上的案例来分析放射性物质的泄漏。Henry Royal 是华盛顿大学研究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性安全的专家，他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参与审核 1979 年美国三里岛事件，以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下图标示了 131 放射性元素在不同事件中的释放情况，从中我们发现虽然三里岛事件被美国人视为严重的灾难性事件，但是 131 元素的释放量其实并不大，且远远小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以及 1952 年至 1962 年间在全球各地开展的核武器实验场的释放量。三里岛事件作为美国最严重的核危机事故，其释放的核物质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对全世界人民的影响极其有限。

这位教授提出福岛核危机更多的像三里岛事件，而不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当我们考虑福岛核危机，以及未来核电站建设计划的时候，是需要对此有所了解的。是的，福岛核危机的确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这样的核危机带来的辐射量究竟是多少？实际上，它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要小很多，更多的是像美国的三里岛事件。其实，无论是在医学检查中，还是在生活里，人们都会暴露在辐射之下。我们要使公众明白，不管是从安全上考虑，还是就成本而言，核电站都是上佳的选择。我们无法承诺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危机，毕竟这些都是人造的系统，在自然灾害面前有时候会不堪一击，福岛核电站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重大的能源选择一般都是伴随着风险的。比如说在中国，整个电力的 70% 是由煤电来提供的，在美国则是 50% 的比重。我们不得不承认，燃煤不仅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等环境方面的挑战，同时还有矿井的采矿、煤矿工人的安全等生产上的风险。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核能情况。刚才我提到美国 20% 的电力来自于核电，这个数据可能不会有长足的增长，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考虑扩大核电的应用范围。现在美国国内有 104 家核电站，其中约 90% 的核电站已经超过了 20 年的服役期，并且过去的十年中没有新建过核电站。美国的核电站通常有 20 年服役期的授权，但是现有的核电站中，7 家服役时间超过了 40 年，另有一些核电站的服役期预计将会超过 60 年。美国的核电站是相对安全的，且整体运营成本比热电要低得多。在 Skea 教授的演讲中，大家看到在英国也有相似的情况。下图是美国和世界在能源选择方面的比较，大家看到矿石燃料占据了主要的位置。随着能源需求量的激增，我们必须在未来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未来 40 年中，我们将极大地增加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在整个能源板块中的比重。

三、能源问题的未来选择

我们假设世界人口仍将继续增长，至 2050 年达到 90 亿。印度、中国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将持续地发展社会和经济，并要求使用更多的能源。这意味着矿石燃料的使用不会减少，反而会出现增长的趋势，与之相伴，二氧化碳的排放与积存也将对全球造成更大的威胁。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要积极地应用各种可能的能源。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和开发。

未来我们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有两个选择，它们很有潜力，并且不需要新的技术和知识，而需要部署、合作，以及资本的输入。第一个选择为节能，涉及到人们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这个层次上讲，我们需要倡导全世界的年轻人投入热情、专心一致的态度和知识，实现减少能源人均耗费量的目的。提高效能则是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则需要资本的投入，来引进节能设备，包括空调、加热设备，绝缘材料，以及建筑窗户和照明工具，此时，我们只需要将已经掌握的技术加以运用即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做其他的努力，我刚才提到，由于我们更多地使用矿石燃料来满足世界对于能源的需求，二氧化碳的排在总量上可能会出现上涨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二氧化碳本身采取相关的措施。我这里主要介绍两种方法：第一是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我们已经证实了它的重要性，还需要证明其可持续性和实用性，我们要尝试建立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且经济实惠的方法将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并封存起来；另外一种方法更多地涉及研究领域，即把二氧化碳降解为可利用能源，比如说利用光合作用将其降解为碳水化合物，但这一做法需要其他的能源作为补充，比如说太阳能或核能。当然，这些是科研领域的课题，如果你选修的专业是化工、物理，或者是生化，你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大有作为，为世界做出贡献。

最后再来说说当前的能源选择。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人们还会继续使用矿石燃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二氧化碳封存和二氧化碳减排来应对环境污染的挑战，同时我们需要扩大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的应用范围。可再生能源将大有用武之处，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光伏太阳能发电领域的主导力量。正如 Skea 教授所言，虽然一般来说，可再生能源比现有的能源成本高，但是如果考虑到环境恶化所付出的成本，两相权衡，那么可再生能源绝对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核能亦是如此。从长远来看，太阳能必将成为非常宝贵的能源选择。一些人担心利用太阳能发电和制造生物燃料会使我们疲于应对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食物短缺等方面的挑战，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研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在过去的 50 年中，我们不断地提高农业产量，如果这样的趋势可以持续，我相信除了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外，我们还能生产出生物燃料，满足未来能源方面的需要。

谢谢大家的聆听！

（整理：杨军）

◆明晰风险、洞察机遇，助推亚洲转型和寻找新动力(2014)

演讲人：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精彩语录】“面对国际燃油市场的波动及环境污染对亚洲经济带来的风险，如若明晰风险，洞察问题背后的结构，化危机为机遇，定能助推亚洲转型和寻找新动力。”

应主办方要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作《星球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将有助于推进亚洲转型和寻找新动力。我将为此次会议带来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能源及相关环境影响对亚洲发展造成的挑战；其次是洞察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结构；最后是将危机化作解决问题的机遇。

一、挑战：能源与气候变化的风险

国际燃料市场，尤其是国际燃油市场，一直都在波动，而且这种波动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上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大战之后，油价波动性猛然加剧而且难以预测，但实际上，除亚洲外的全球石油需求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而自石油危机之后，油价与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性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再来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无需赘言。而这些风险范围有多大，要考虑多大的变化，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如何防范全球性风险才是我们所考虑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就市场而言对 GDP 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去衡量 GDP 等；以及对于社会稳定性等非市场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因素全包括进来，影响就越来越难以量化，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会令人悲观。

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吗？到底气候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估、协调？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市场失灵”，还有人称之为一场“道德的完美风暴”。但在目前，我们确实做得还不是很好，你可以看碳排放在过去的十年的排放量甚至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都要多。而有些本是地方性的排放扩到了地区，进而影响到了全球。

二、洞察：能源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要真正地理解问题背后的经济结构，我可以为大家作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事实上，能源消费与 GDP 的比值基本上是稳定的，有些国家或许会因为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在能源的效率方面加强监管，并且会在能源创新和供应等方面下很大功夫。

从经济学对此类问题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最佳实践前沿，让市场参与者之间有互相连接的良好动力和积极的探索力。就市场而言，如果它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对价格进行指导或约束，必须开展大量战略性的重点投资，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回报，把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所作的分析都是发生在宏观经济学的层面上，一个经典的经济学增长模式一般都是基于所谓的存量，也就基于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资本和资源的累积效应的研究得出。许多经济学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回答和这个理论相关的许多问题，他们主要的研究是在两大领域，其中一大领域就是如何把

经济与技术的发展驱动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政策、法律以及在机制和文化等层面获得一个更好的解释。

三、机遇：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性调整

最后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风险以及发展机遇。我们来看一下能源体系，其中对于发展的驱动力、环境以及包括能效在内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极其复杂，这些因素都是基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发展方法，而不能让意识和解决方法脱节。看过了亚洲快速增长的驱动力和轨道，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更为一体化、更为整合式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是思考方法呢？

对我们来说发展的机遇来自于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激进的创新的方法，同时更好地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并在不断发展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中找到具体的印证。到本世纪中叶，全球 GDP 和全球迁移之间的关系将会非常微弱，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创新和 GDP 增长的内生驱动力与全球迁徙化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未来世界要变得更为企稳，那么把极不稳定的要素加以去除的话，唯一走的路就是创新。所以我们现在最大问题不是增长动力不足，而是接下来要面对的结构性调整和系统性调整的步速以及方向把握的问题。未来的方向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这个关键选择的作出有赖于大家。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整理：刘训志）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化（2007）

演讲人：Hans van Ginkel（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大学前校长、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精彩语录】“城市必须增加它们的能力来保证这些人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将来的城市又会怎么样呢？”

我准备了一些文件，希望今天早上的演讲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城市与人口

从现实来看现实中的人，发现人们更希望能够住在城市里。可以预见将来的二十年到三十年中，可能有 80% 到 90% 的人口要住到城市。从联合国调研来看，以后几年世界人口会增加二十亿，而这些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将从 20 亿增长到 40 亿。所以城市必须增加它们的能力来保证这些人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将来的城市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使整个城市更加适合居住。我非常确信现在的科技和进步会保证这项工程的实施。

在荷兰有 3% 的人住在乡村，但是美国和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所以农业人口的多少不决定农业发展程度的高低。与农业相关的人口，5% 还是会居住在城市里。可以看到这张图表，世界人口在 2000 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增长非常快，而要比同期的人口增长快的多。这是中国的图表，这个点相对来说延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期都已经到来了。

再看一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分布表。可以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少于 5000 人的城市里面。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小城市，这些小城市的发展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一些比较老的城市整个人口增长会比较少。

还有一个焦点是集中在人口数 100 万到 200 万的城市，因为人口从 90 万到 100 万往上涨是不一样的。人口密度过大，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些人口要住在城市就必须住在非常密集的市区里。他们可能已经缺少最基本的设施，包括水、净化系统，并且住在很狭小的公寓里。我们知道现在墨西哥城严重缺水，对于墨西哥城来说整个城市的水净化系统非常重要。由于人口密度过大，整个城市很拥挤。很多人住在很小很小的房子当中，没有厨房，他们会直接在路边吃饭，这影响了整个家庭的生活状态。所以城市发展对人很重要，因为在人们不工作的时候，那里主要是人生存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如何多功能地使用我们有限的面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很多的高楼，但是中间有很好的绿化，即使 52 层楼的房子，但是底楼还有绿化。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在 2030 年我们整个城市会怎么样？我们怎样保证非常好地组织、管理这些城市，包括整个生态环境如何维护，保证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比如说有水和整个水净化系统。还有，什么是我们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要做的？为了让人们在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适合居住的环境中居住，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公众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主要是在城乡结合部，可以把整个大的问题进行分段，分清哪些是必须要解决的、哪些是留待后来解决的，然后把整个问题整合起来，改变一些政策。

我们再看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大城市大部分都是在亚洲。这是一个地区的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格，1950 年整个亚洲只占了 60%，而现在大部分的人口已经是在城市里面了。如果看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话，可以看到 2000 年整个城市人口增加超过了 200 万，而这就是我想证明的观点。

这是一个星云图，主要是为了研究那些超级大城市。主要看东北面，可以看到整个红色部分，已经在不断地变成深绿色部分，这就表明了一种城市化的进程。现在不仅是城市化，而且人们不停地在大城市周围聚集。这是荷兰，现在荷兰不是一个农村了，整个荷兰就像一个小的城市一样。在欧洲的很多贫困城市，包括德国、欧盟、新加坡也是这样。在这里黑色部分主要是城市化的进程表。

让我们想想如何使这些城市住那么多人呢？有一些主要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 50 年，必须要做出很多选择。要么所有人都住在一个大的中心里面，要么把他们分散到更广的地方去。而荷兰的政策有点折中，他们采用集中式的分散。要找一个足够的地方能够使这些人生存，但是也要克服弊病，不要让他们过于拥挤。可以看到荷兰的城市，包括鹿特丹，不只是一个城市，在它周围有很多的小城市群。现在的城市不断地再扩大、不断地向周边区域挺进，并且不仅是在地理层面上，譬如说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也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城市化，而且是为了让大家获得更好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必须要得到一种平衡和协和，我觉得中国今后的发展也可能这样。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个城市对我们的意义？有很多方法，我和很多专家进行过讨论。比如说洛杉矶城是一个最大的超级城市，但是洛杉矶并没有给人拥挤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的郊区发展非常好。你虽然可以看到很多人，但是不会看到那些人都聚在一起，这是洛杉矶的占地面积要比法兰克福、欧洲几个城市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原因。现在很多国家都是在大城市周围建一些小的微型城，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看一下保险公司，包括他们整个投资也好，也包括荷兰，从那里不会看到城市和郊区有差别。

这是乔恩先生，他现在在画一些地图，用 GIS 系统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形象。哪里是城市区？亮的地方就是城市地区，这样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看一下红点（幻灯片），这些红色的点表示这些城市有一部分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可以看一下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的波斯，包括尼罗河流域的很多城市，还包括美国一些城市的情况。而这些城市需要我们集中研究力量来研究一个办法。这是一些住房图。

二、什么是城市？如何发展城市？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城市？如何发展城市？我们要为城市发展包括郊区发展做一个具有综合意义的考量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从城市到乡村来，也要保证有些人到乡村去，这样才可以平衡，并且不会造成城乡过大的差距。我们要从人口学、经济学、包括其他经济学上面来考量这个问题。这是荷兰的地图。这种方法可以到应用很多国家，因为住在城市对很多人就意味着拥有工作的机会。我们看一下黑色的部分，它表示有 100 万个就业机会。要使大量的城市周围拥有这样的乡村，让乡村的人同样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分享到就业的机会。但是同时，城市中的工作机会过于集中，就要考虑如何把城市平衡地发展下去。

看这个深色区域，工作机会可能各不相同。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在大城市哪怕就是洗衣服都会获得很好的收入，有很多的就业机会。从刚刚那一张图上面可以看到黑色部分是城市所拥有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国家的收入来源的分布。这是一种新的计量工具，可以精确到几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城市或者每个地域的收入差距。从这张图上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相对收入高一点，

中国也是这样。

我们要找很多大城市带来很多的弊病，我们也有很多最基础的东西要解决。这是从卫星上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欧洲的空气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就是，你在城市里面能够看到多少颗星，因为城市里的灯光污染让人们看不到星星了。这个深色的部分根本看不到，意大利是全境看不到灯光。这是墨西哥城的整个增长速度，可以看到每个墨西哥城的生长。在整个墨西哥城里面有一个湖，这个湖是所有生活用水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墨西哥城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湖就没有了。

我们知道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密集城市、密集的交通网，有很多自行车，交通很困难。这是尼日利亚的卡拉加思，现在他们因为没有地方去，只能住在可能有山体滑坡的旁边，非常的危险。我们知道形成山体滑坡最重要的原因是太多的人、太多的房子聚集在山体的周围而滥用了资源，造成了很大的危险。这是里日内鲁的贫民窟，很多时候他们的走廊非常窄，所以根本无法保证这些地方得到安全和消防措施。

那么如何更系统地发展整个城市呢？要整个管理城市的话要从很多面上进行考虑。我们要知道城市发展不只是政治的决策，我们自己还要想很多办法。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能够在很多块、很多层面上社会化地管理整个城市系统，而且如何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的一些想法，因为很多市民不理解国家的想法。那么如何建造一个由整个社会负责的城市发展情况呢？从积极层面来讲，如果你有一个更系统的计划，可以保证生活质量，市民就能更快地接受。有一些是政治上的非常正式的决策，而有一些可以是非正式的、民间的决策。所以说整个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对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一个粗略的概念。如果你仔细斟酌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难。比如说在一个社区里面会看到经济不一样，包括整个家庭状况不一样等等。所以说我们政府不需要制定很具体的政策，你只要有一个指导的方向。比如说公交，让整个城市有这样一种有特色的东西在那里。包括建筑上、社会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只有这样一种发展才可以保证一个可持续、可居住的城市环境。把我们所有人的力量都动员起来，而政府是一个起点。政府组织这样的运动，我们可以从过去学一些用于将来发展。

整个城市规划就像一个逻辑规划一样，要根据很多不同的情况，包括你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发展状况等等。没有两个人的想法可以完全一样，要尊重这种多元化。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划成一个一个组，然后针对每个市民组制订一些多层面的政策。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些已经运用到实际的一些政策。可以看到东京，东京本身最早的时候是从一个点开始的，而现在东京已经发展成一个大东京区，里面有 3000 万人口。可以看到上面的鲁尔区，这是一个西德以前最著名的工业区，现在也是这样，从五个点几乎覆盖到整个地区。这种想法必须要通过城市比较和城市比较学来得到更好的解答。而且我们要保证一些农业用地，很好地把城市和整个农村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到虽然是在郊区，不是城市，但是它也有很好的发展。包括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杭州、香港、上海、广州，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这是一个城市，我们总是去想这个城市带动了一大片区域。在整个欧洲都是走这样一条道路。在多个层面上讲，整个大城市带动了一大片区域。

我们现在知道珠江三角洲住了 4000 万人，我们在这里画一张图并不难，我们可以看到它覆盖的区域。这并不是很特殊的情况，在西欧这种情况很普遍。这是以鹿特丹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是在欧洲西北部。如果城市的一个定型，有一部分旧有的建筑，在欧洲有很多很多年历史的建筑，也有很多新兴的建筑，而这些新兴建筑可以俯瞰整个旧建筑群，在东京也是这样，这些旧建筑和新建筑也是星罗密布，这是很好的搭配。而现在我们看到在很多城市都有很多的摩天大楼。这是中国的例子，这是很旧的房屋，后面就是很高的新房子。当然如果要结合这种方法，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城市，周围有孩子可以玩的地方，

即使是在大城市也是这样。

这是荷兰著名的玻璃城，在最前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绿色，在最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密集的高建筑群。我们要想到如何将城市和农村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想到城市的发展必须要和农村进行融合，这是我们一直梦想的。这就好象我们在美国电影里面看的一种今后发展的城市一样，一百万人的城市。因为荷兰是一个低海拔城市，一直承受很多的潮汐、发大水，而这些是新型的想法——漂浮的城市。如果说有很大洪流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可以浮在上面，这只是新兴的想法。

（整理：邵熙）

◆德国能源变化及其对绿色亚洲的启示（2013）

演讲人：Andreas Löschel（德国国家能源转型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环境与资源经济及环境管理所所长、教授、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精彩语录】“如果中国需要推进这样的转型，最好采用补贴政策，要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还应该制定经济可行、灵活弹性的方案用以应对将来的状况，否则可能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实行。当然正如中国人常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中国有智慧解决未来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并强调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能源方面来看，就是要在能源安全、经济成本与能源系统的环境影响间寻求平衡。上世纪 90 年代末，德国政府已启动了相关讨论。当时德国作了一个重大决策：要建立一个主要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2007 年德国制定了“能源气候规划”，2010 年德国政府又确定了国家能源系统中的能源范畴。这一范畴着眼于长期，囊括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可行而又注重环保的方案，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供应这一 21 世纪重大挑战。德国政府经常会通过一定的科学监测判断转型进度是否达到预期，或者确定需要采取额外措施的力度。关于德国能源变化主要有德国能源转型的现况、遇到的问题以及经验、教训。

一、德国能源转型的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政府决定淘汰核能。但是 2002 年德国政府就和一些能源公司协议决定要在 2023 年前淘汰核能。2010 年大选后，当时虽然决定延长各反应堆寿命，但也只是延期 6 个月。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又让政府下定决心要在 2023 年淘汰核能。

从 2010 年到 2013 年德国核电装机量的变化可以发现过去几年德国的装机量一直在下降。以前德国很多的核电站都是建在能源需求量大的地方，也就是南部的大型工业中心，但是现在已经调整了这种布局，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能源范畴的确定为制定能源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要求，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 2020 年前减少 8%，到 2005 年减少 20%）；到 2050 年，要将运输业和建筑业的能耗降低 80%；2020 年前，要实现电力消耗减少 35%，各类能源总消耗节省 80%；此外，每年要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2%。

目前，这些目标实现程度不一。比如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较好，现已成为一类主要能源产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工作也是有条不紊推进。但是其它方面，比如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建筑业的能效，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从中得到的经验就是要着眼大局，不能只看到电力，还要考虑供热、运输等，需要面面俱到，全盘考虑提高能效，增加可再生和低碳产品的使用。

目前德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储备，储存电能至多能维持 15 分钟。2011 年德国的发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燃煤。当时 45% 的电能都是来自于无烟煤、褐煤。尽管去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上升到 22% 左右，但是可再生能源仍然不能确保完成这些目标。但与此同时，由于煤价连年下滑且燃煤不受碳排放交易系统处罚，煤炭的占比在去年也有所增长。由于廉价原料的存在，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只能依靠煤炭政策。

所以要完成减排目标仅仅依靠可再生能源是不够的。

二、德国能源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去年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但是碳排放也增加了。为此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可再生能源之所以迅速崛起，主要推手就是《可再生能源法》。这一法案对燃料技术性费率作了长期规定，使之能优先进入市场并在并网环节中享受优惠待遇。透过这个框架设置，各种可再生能源开发几乎不用担负任何经济风险。开拓了市场，无论如何只要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将电力并入由电网公司接管或提供的网络。

从费率角度研究，例如光伏能源，它的补贴一直在下降，但是其他很多的补贴却一直较高，近几年都有趋势。另一个例子是与当前中国的讨论非常切合的海洋风电开发。德国在这方面进行过讨论，计划于 2020 年将海洋风电装机量增加到 1 万兆瓦。目前离目标还很远所以提高了针对海洋风电的补贴。因为这项技术成本高昂，即便是段时间的“学习模仿”也难以大幅降低成本，所以对这项技术的支持力度没有减少而是加强了。而伏技术则是唯一一个增长迅速的。由于中国供应商竞相压低光伏面板成本，导致了过去几年补贴快速下降。

可再生能源中风力和太阳能占比增长迅速，特别是太阳能的装机量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突破了 32 千瓦。德国的风力集中在北方，太阳能集中在南方。尽管北方风能资源丰富，但是需求却主要集中在南方，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同德国，中国如果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就必须解决好远距离输电的问题。要将北部的资源与东、南部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巨额电网投资。在德国也需要应对资金和可行性双重挑战。需要大型电网将电力从北方输入南方，但是民众对于电网负荷大升级意见很大，所以建造遭遇了种种困难。把可再生能源从富集地输往需求地的难题今后可能也会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迟早会出现，随着距离的拉长，需要考虑电网的负载和分布。德国采取的措施是将大量电力调配给监管电网扩建的调度方，要求调度方做好电网的进一步升级规划。这一举措已经初见成效，具体经验是：电网扩建规划需要同供电系统的调度方共同制定，新电网的建设也要与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投资规模和区位相适应，然后这些规划需要有可靠的融资计划，优先项目还可获得政府资助，通过这个过程，希望能在整体上缩短新电网的建设周期，在德国新电网的建设时长达十年以上。必须加快步伐为整合可再生能源做好准备。

另一个可再生能源传输的问题就是调配监管（如能源产品的转换比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可能也会遇到此类问题。目前来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在 9% 左右，但是随着这一比例的增长就转化成传统能源保留多少装机量问题。对于可再生能源要灵活应对，要考虑到无法获取可再生能源的情况。德国经常会遇到下雨或者阴天的问题，没有储备能源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装机量，但是随着传统电站效益日渐低迷，该类问题在德国愈发严峻。使用可再生能源有补贴让传统电站丧失了融资吸引力并面临亏损。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上大行其道，电力批发价格不断下跌使得油气电站盈利持续降低，这是现在德国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放松了对能源市场的监管，但是装机规模却大幅提升，可是保留常规能源依然是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后是电价问题。一是生活用电价格，价格增长的大部分用于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目前的补贴幅度是每度 5.3 欧分。目前中国的用电总成本在每度 28 欧分。所以德国的电价在世界上是排名第二。二是工业用电，价格是上涨趋势。德国企业担心竞争力会因此受影响，因为对手可能来自不太支持可再生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地区。谨慎考虑这些问题，并非担心能源转型受阻，而是因为如果生活电价过高，可能人们就不大愿意为可再生能源买单，如果工业电价过高的话则带来失业问题，需要把握好发展的精度。

德国的能源法案和淘汰核能计划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来实现。尽管福岛核事故加速了德国作为的进程，

但不可否认自 2002 年以来德国施行正常上很缓慢。除此之外，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在能源保障上会遇到了装机量等方面的问题。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时，要着眼全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灵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方案。

依照德国的规划，未来 20 年将设立一笔固定的专款用以推行能源转型。这一规划既保险又代价高昂。如果中国需要推进这样的转型，最好采用补贴政策，要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还应该制定经济可行、灵活弹性的方案用以应对将来的状况，否则可能因为成本过高而难以实行。当然正如中国人常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中国有智慧解决未来的问题。

（整理：李超）

◆名古屋大学与低碳环保（2010）

演讲人：藤井良一（日本名古屋大学副校长）

【精彩语录】“我们要解决低碳和环保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彼此共同合作，达成共识。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协作，分享经验、知识和技术，实现一个低碳的环境。”

首先我要感谢论坛组委会邀请我参加本次论坛。这也是非常及时的一个活动，让我有机会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低碳方面的努力。

今天我首先会给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名古屋大学，以及它在环保方面所做的一些研究、科研活动。我们要讲的案例，并不是一个国际、全国的案例，而只是我们一个校园、园区的一个案例，希望给大家一些借鉴。

一、名古屋大学简介

名古屋是日本第四大城市，有 250 万人口。它处于日本本岛的东部，是在京都和大阪之间。在名古屋有几大产业：航空，如火箭公司就在名古屋，还有汽车引擎公司，三菱重工等等。波音 787 的机身的 35% 的部分就是在名古屋地区制造的。在汽车行业，丰田、三菱的电动汽车的开发、和磁悬浮列车也是在名古屋地区生产的。

再来介绍一下名古屋大学。它是成立于 140 年之前的 1871 年，一开始是临时医院，是一个医学院，1939 年名古屋帝国大学成立了，1947 年我们把这所大学的名称改名为“名古屋大学”，我们一共有 3 个校园。名古屋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提供了人文、教育、法律、经济、信息、科学、环境科学课程，可以说是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学科，一共有 9 个本科和 13 个研究生学院。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在某些领域是获得了全球领先的成就。比如说我校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校在全球大学的排名当中也是相当靠前的，这里列出的是我校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两位是化学家，还有两位是物理学家。

除此以外，我校的国际合作也非常的广泛。现在和全球各国的学院有 280 个交流项目，其中有 85 个是大学层面的合作，和中国就有 10 多个合作的项目，其中包括了与复旦大学的合作。我们在全世界还有许多的办事机构，其中一个就在上海。这些机构是致力于促进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教育合作与交流。

二、名古屋大学在低碳经济方面所做的教育活动与科学研究

下面给大家介绍我们在低碳经济方面所做的科研、教育活动。首先，来介绍一下在这方面的教育活动。为了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在环境方面的问题，我们提供了三门这方面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等等。这些学科当中，都有非常深入的关于环境方面的课程，就科研方面，名古屋大学也一直致力于先进的保护环境的技术。就像刚才我所介绍到的有很多的能源方面的研究，我们从能源的源头生成，到传输、利用等等技术可以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在能源的来源方面，比如说核聚变的研究成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在生物

燃料和生物废弃物方面，还有汽化等方面也有深入的科研活动。我们的研究还包括对生物催化剂如何提升能效、如何能够更好的处理生物废弃物的技术，还有废弃物的处理技术，以及大豆当中提取生物燃料的技术。在能源转化与传输的方面，在提高能效的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燃料电池、燃气、汽轮机、超导材料，超高压直流、电力传输。例如我们在电力传输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我们知道通过超导材料可以极大地降低电力传输方面的损耗。EMES 技术还处在研发的阶段，主要也是通过超导的材料来使传输效率更高。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通过超导的材料和电缆可以传输三倍于传统的传输量，同时减少三分之一的重量和损耗，这个项目正处于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为低碳的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能源的使用方面，名古屋大学也开发出了高效的电器设备，比如说 LED 方面的技术，这主要是材料方面的研究。稍候我会继续介绍。

三、低碳校园，名古屋大学在行动

下面给大家介绍我们建设低碳校园的努力，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由于经费的限制，我们必须得分清楚长期、短期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我们是把整个的园区作为一个大的“试验田”，首先是要对现状、对基础设施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再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判断。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有一个能源管理研究委员会，它首先是对全校的能耗情况进行分析，之后与其它的一些日本大学合作，制定了一个能源利用的标杆，再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政策，每年我们都会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做这一切的前提是为了满足日本对环境方面的承诺，在京都议定书当中，整个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相对于 1990 年水平的 6%。我们日本的内阁承诺日本相对于 1990 年的排放量要降低 25%，名古屋的这个城市，到 2050 年要把这个排放量降低到相对于 1990 年的 80%，这个是非常高得离谱的目标，我们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就大学而言，它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来。

比如说，名古屋大学在建筑面积达到了 42 万平方米，耗能的主要电器是灯和电脑，每年消耗掉的电能达到 70 兆瓦。就灯光、取暖、水方面每年支出的费用达到了 270 万美金，达到了我们的整个支出的 2.7%，我们的校园就相当于小的城市。

可以看到在这张图表（PPT 上）上，列出了名古屋大学相对于 1990 年基准，它的能耗趋势。红色的线上面，就是“蓝光 LED”。实际上我们外部得到的资金，比 1990 年增加了 4 倍，这样可以使我们购买更多的设备。看一下我们的能耗，这条红线表明了我们相对于 1990 年的水平是翻一番。但是，可以看到 2005 年之后，这条线看起来是不再显著上升了。作为一个以科研为主的大学，我们一定要达到环保的目标。与此同时，要承担起一流的科研任务。这是我们每年的趋势，可以看到在 2005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了一个峰值，之后就是逐年下降。但是，我们的大学每年还是要排放大概是 8 万吨二氧化碳。名古屋大学可以说是耗能最大的机构，今年的 4 月份开始了节能计划，我们希望每年可以节省 1% 的能源消耗，这里可以介绍一些我们的能效的计划。

首先一个例子，就是 NU-ESCO 计划，名古屋大学成立了一个能源公司，会向各个学科部门提供资金，来替代现有的设施。比如说热泵、空调等等，使这些设备的能效更高。目前这个项目非常的成功，应用到了大学的医院和图书馆。第二个项目就是叫做 Greenery，有助于吸收更多二氧化碳。我们的学承诺将在每个小区使得绿化的覆盖率超过 45%。此外还有节能工作，比如说冬天、夏天的节能举措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基础设施、节能举措。比如说使得屋顶的覆盖绿化，采用一些高性能的材料，还有安装高效率的转换器，或者是空调系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大的减少。一些已经实施的项目非常成功。正如我刚才所说到的 ESCO 项目，就使得热泵的能效更高，预计未来这些项

目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能效。使得我们的电脑更加的环保。今年开始我们也会让所有的各个学科部门要采取节能措施，每年这个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要在大学传播这些信息，要让学生和老师有环保的意识，来节约能源，把所有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已经决定，要将二氧化碳的总体排放量，2014 年削减 20%，这是相当于 2005 年的水平的基准上。我们不会采取 1990 年的水平，那个基准太低。我们在学校的校区也将会建立新的建筑物，在这些新的建筑物当中，只会使用 LED 灯光。只有 LED 的灯泡会应用于这个建筑物当中的照明，而不会使用荧光灯和其他的电灯泡，这样可以大大地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日本首个的采取这种行动的大学。

除了在大学内的这些工作以外，我们也与其他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来共享经验，来提高能效，减少碳的排放量，一是亚洲的核心项目，侧重于低碳的环保问题；二是全球低碳经济研究院，会向政府和年轻的领导提供政策建议；三是低碳经济论坛，这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国际平台。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论坛。还有其他一些低碳的经济工作，我们认为这些低碳的工作对整个的亚洲国家都非常的重要。

最后，我们要解决低碳和环保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彼此共同合作，达成共识。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协作，分享经验、知识和技术，实现一个低碳的环境。

（整理：邵熙）

第五部分 自贸区

从 2013 年开始，“自贸区”成为了中国经济的热词，上海自贸区以及后续多个自贸区的建设，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了新的方向。自贸区的关键在制度创新，国际经验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借鉴。

◆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区和货币联盟（2012）

演讲人：Robert A. Mundell（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精彩语录】“随着中国的发展，人民币将会变得更强大，到达某一程度时它会依仗 GDP 的力量取代美元，它还不会有金融债务。接下来金融改革将是中国的重大任务。”

货币和贸易这两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全球有很多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体系，同时它与货币联盟有着极大关联。

2001 年在 APEC 论坛上曾提及过货币联盟，当时 APEC 的计划是在其内部建立一个相当大的自由贸易区。如果每个国家都实行灵活性的汇率，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货币合作，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能更上一层楼。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变化形势下，需要回顾历史以反思当下和展望未来。过去对于法国、美国等国家来说，金银复本位制固定了金银的价格。但是当内战爆发之时，美国放弃了它；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国也放弃了它。后来各国转向了金本位或者银本位制，但是金本位呈现上升态势，许多国家都趋向于金本位。除了中国，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在一战爆发之时都出处于金本位体系下。

一战爆发的前一年美联储正式建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仅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比排名第二至第四的三个经济体总和还要大。当该国建立了中央银行，事实上就随即赋予其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或者至少是否决他国可能想建立的其他货币体系的能力。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

在一战期间，英镑实际上逐渐变得不可兑现，美元成为了主要的国际记账单位。战后，美国取得了比英镑更加重要的地位。欧洲又恢复金本位。欧洲先行，世界跟从，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不论各国何时回归金本位，都会引起一次通货紧缩。拿破仑战争后是如此，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是如此。有可能就是它导致了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

萧条之后美国和英国都放弃了金本位，一年之后，美国将金价从一盎司 20 多美元提高到了 35 美元。这成为了基本框架，或者源价格——1934–1971 年国际上最重要的价格。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了金本位制度的规则。会议设计了一套规则，之后修改成为了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本位制。对于货币当局美元可兑换为黄金，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金本位制，因为这一体系并未将国际价格与固定的金价挂钩。

朝鲜战争以及之后其他战争通胀使得黄金贬值。美国将近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流失。1948 年美国拥有世界 70% 的黄金。到 1971 年美国只有大约 25%。大多数的黄金流向了欧洲。1971 年美国明确希望将美元和黄金脱钩，因为美国不希望继续出售黄金，而希望保留一部分黄金。之后固定的汇率制瓦解了，世界分化为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当时并不具备灵活的汇率机制运动条件。在经济学史上没有人论证，也没有任何论著提及让每个国家都拥有灵活的汇率机制是一项很好的安排。所以需要第二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条款和灵活性汇率的管理体制。

1918 和 1919 年英国是货币强权的中心。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金本位制的运行方式下所有的货币都可兑换为黄金。战争前夕伦敦依然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中心。战争爆发后资本流入伦敦。

造成英镑升值。但是仅维持了数月，人们就意识到英镑已不再是安全港。几个月后美元成为了最主要的货币。

新建立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格局。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不断提升的力量。货币体系的变革时犹如太阳系：黄金是太阳系的中心，太阳就相当于黄金，是太阳系的核心，当其中的一个行星变大甚至超越太阳的时候，最终其他行星和太阳都会围绕这个行星旋转。这种现象已经体现在美国，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超级主导经济体。

回归黄金本位制是一个错误。每当各国回到金本位，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如果继续金本位，又会引发新的通货紧缩。美国就是如此，即使美国没有建立金本位，但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实际核心。金本位引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以及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它使美国关税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接着导致了 1974 年美元的大幅贬值，创造了美元本位制。美元直到 1971 年都与黄金挂钩，这种可兑换性并不提供给美国人民，美国人在 1933 年以后便被禁止持有黄金。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国家可以用金本位制。

当时货币体系是美国挂钩金价，一直持续到 1971 年。其他国家把本国货币与可兑换为黄金的美元挂钩。1941 年罗斯福总统要求财政部长着手准备战后货币秩序和世界货币。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提出商计划，并引发了 1944 年 7 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三个国家试图设计一个货币体系，但是从未存在过世界货币。世界银行是 1974 年建立的世界性银行之一。在华盛顿山饭店批准了转化为美元本位制的全球货币体系。会议结束之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总结致辞中提到这是对货币民族主义的终结。但是这一体系通过三个阶段被打破：黄金是最首要的，因为价格上升而贬值。它被等值估价，合理估价，然后贬值。没有机制制止其发生，但是由于浮动的汇率是一种回到货币民族主义的途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和通货膨胀率。

二、灵活性汇率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

现在全球拥有 188 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不是 188 种货币，因为其中的 17 个国家使用欧元。但是如果有 170 种左右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国家 and 单独的汇率，该体系没有连续性。因此所有的汇率必须和美元挂钩。如果一个国家有 200 种货币，那么就有 19700 个汇率。如果有一个货币兑换率计价标准，那么可以将其减少到 200 或 199 个汇率。欧洲矛盾的加剧、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以及欧元危机开始分化美国的计价单位霸权，并破坏作为世界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元。这一体系的内部分裂成两半，因此它没有奏效。

在金本位之下并没有系统性危机。金本位的问题可能是抛弃和重返黄金。如果重新设立汇率和使用黄金，则不会有买卖。金价从 35 美元 / 盎司提高到 38 美元 / 盎司，一个月内石油输出国家将油价提高到相同幅度，这引起了存款和贷款的危机，进而引起国际借贷危机。危机在低价借入美元又将其投入借贷的国家中蔓延。政府们热衷借在他们看来廉价的货币，之后又必须用昂贵的美元偿还。墨西哥是第一个产生这类债务危机的国家。

当时汇率不稳定性包含在这个问题当中，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危机中爆发。危机的起因是人民币贬值，使得美元从 1944 年的 1 美元兑 5.5 人民币提升到了 1 美元兑 8.7 人民币。接着美元下跌到大约 1 美元兑 8.28 人民币，并在此价格上固定一段时间。但是墨西哥债务危机之后，美元价值开始下滑，而日元价值上升。1995 年 4 月 78 日元兑换 1 美元，接下来的三年间，美元兑日元汇率飙升到 1 美元兑换 148 日元。正是这场日元对美元的大贬值使紧握美元的国家陷入危机。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主要外汇汇率的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人一定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们不能如此表述，因为这一体系正是他们为实现灵活汇率而提倡的。

接下来发生了雷曼冲击、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次贷危机。2007 年 8 月 7 日和 8 日，各国中央银行、世界中央银行和欧洲央行召开会议，并在一天之内挤出 950 亿美元救市。两天之内其他的中央银行合计注资 3000 亿美元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和这场危机中主要银行的资金平衡问题。

危机伴随着美元升值。2008 年的夏天美元升值了 30%。6 月份欧元对美元汇率是 1.64，8 月份跌至 1.23。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一段时期内躲过了危机影响，而美国却深受打击。这场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房地产业和其他一切经济活动。

欧元的创建也加强了浮动汇率的重要性。之前美元代表着主流，而今出现了两大板块。欧元的创立集中了欧洲的货币强权。在欧元之后又有了另一大板块，它并没有美国和美元那么大。欧洲有它重要的优势，而欧元也是一种很好的货币。欧洲持有很多黄金，但是欧洲现在也有弱点比如缺乏财政纪律、实行的福利安全改革因财政难以负担而怠惰、进入欧元时代之前债务率高达 100%，而马斯特里赫特协定规定的最高债务率仅为 60%。欧洲达到了货币稳定，而非财政稳定。但是该体系下潜藏了六大问题。欧元的出现将世界主流一分为二，如今又为这个体系制造了另一个问题。造成的后果是美元的重要性弱化了。中国的人民币还未紧盯世界经济，因为当美元和欧元升值的时候，中国就可能出现危机。当美元兑欧元汇率升高的时候人民币已经在缓慢升值，而美元则在贬值。人民币在 2008 年夏天才停止了对美元的升值趋势，在 6.8 的汇率上稳定了几年，因为不能在美元升值的时候继续升值。紧盯美元已不再能给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带来稳定。随着中国的发展，人民币将会变得更强大，到达某一程度时它会依仗 GDP 的力量取代美元，它还不会有金融债务。接下来金融改革将是中国的重大任务。

三、修复货币体系的思考

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0 周年推动和考虑的是弄清楚什么才是修复现在货币体系的根本。佐利克撰写的文章呼吁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需要这种稳定地带。

需要纠正这一体系的缺陷。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波动太大，两种货币加一起代表着世界经济的 40%。如果固定汇率，并加以管控，那么就会出现如乔治·威廉所提倡的，使它成为布莱顿森林体系的替代物，同时他主张固定英镑和美元。但是欧元和美元现在是关键的货币，因此要稳定住两者的汇率。这意味着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协调货币政策。但是不能采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式，因为当时所有其他国家都固定了本国货币的上下限。有必要在两国政府的层面，用金融政策进行更好的协调。

去年 10 月份当 QE3 被推出之时，1 欧元可能兑 1.21 美元，欧洲就将加入。QE3 的好处是，如果欧元没有迅速升值（欧元飙升到 1 欧元兑 1.37 美元），如果将汇率稳定住，欧洲就不会遭遇二次衰退。但是如果稳定了汇率，就有了一个代表世界经济主流的新板块，接下来则需要制定好政策。

中国兑美元的汇率，从 1978 年往上攀升，直到 1994 年大贬值，1994 年 1 月又出现了增长，美元升值到 1 美元兑 8.7 人民币。此汇率一直下降到 2005 年春天才稳定下来，固定在 1 美元兑 8.28 人民币，接着又有了一个快速的调整。现在这一汇率又接近 6。中国一直努力使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新的领导层应当认真考虑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兑性。中国理应成为国际化货币的一员，并合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区域。这两种汇率的其中之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固定了，因此现在只需要固定美元兑欧元汇率。中国正在解决这个体系问题，因为中国正在重新与世界经济的主流货币挂钩。当然也可以去考虑更好的替代性措施，但是这将不符如下观点，即建立一个将世界版图增添全球性货币的新体系，通过它来帮助修补当前的货币体系。

（整理：李超）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的关键：制度创新（2014）

演讲人：简大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精彩语录】“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虽不完善，但却如一根导火索一样，点燃了社会企业和个人创业的无限激情，他的负面清单作用，使得国务院的几十个部委办不断的推陈出新，大胆尝试，成为了政府改革的又一副催化良药。”

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自由贸易区，至少是形似神不似。所谓形似，即它也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划出了一块区域，某种程度上有传统的物理围网，而且有一个规范的面积。所谓神不似，是其本质还不是，在这个园区当中它的物流功能、集散功能的提高，自身产业的发展，或者一般的看待这个园区本身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它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所以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这个自贸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它的关键是我们坚持制度创新。自贸区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一块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自贸区的成功是制度创新，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制度创新。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价值所在

自 9 月 29 日揭牌到现在，大概有 7 个月左右的时间，管委会一直都很忙碌，我们一直忙于接待企业、领导和媒体。截止到目前，到自贸区来咨询、访问、登记的人数已超过了 20 万。在这期间入驻到自贸区的企业达到了九千家，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自贸区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 4% 左右上升到了 10%，而且它的幅度仍在增加。我认为与其说这七个月来有成千上百的企业和个人到自贸区来咨询和注册，不如说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一根导火线点燃了积累在社会企业和个人心中的渴望多年的期盼改革和开放的热情；与其说自贸区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万五千家企业和即将入驻的企业在等待着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和操作细则，不如说自贸区作为一支催化剂激发了我们社会企业 and 个人的创新激情和创业的活力和空间。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等到优惠政策，而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和环境当中，企业提出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其说是自贸试验区推出了第一份负面清单，不如说这个负面清单的表面的意义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告诉我们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与其说负面清单是一种投资的目录，不如说负面清单正在成为我们政府改革的一个管理方式、管理思维；与其说上海的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在大胆试，在自主改革，还不如说它毕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焦点。使得国家特别是国务院的几十个部委办在几个月内提出了几百条的改革措施，这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作为一种改革的推进器，形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特别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一个氛围，一种环境。这是上海自贸区的真正价值，这种价值高于吞吐量，高于一般的转口能力。

我认为制度创新的核心和要害有两条：第一，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国际通行规则的推出，在自贸区对于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形成一个很好的试验结果，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第二，通过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政府的改革。这个政府改革的要害就是让政府从原来重审批环节过渡到今后政府重监管环节，这是整个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元素。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三大任务

到目前为止，整个自贸区的建设仍然坚持着党中央、国务院交代的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核心的准入放宽，在此过程中自贸区正在建立一个包括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审查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信息共享、联动执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全过程监督这六项制度的事中、事后的管理内容。第二个任务就是服务业的升级和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在整个试验当中，超越了我国对 WTO 承诺开放的领域，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六个领域的 18 个行业推出了 23 项开放措施，虽然这 23 项开放措施还比较少，但是目前的整体推进还比较顺利。第三个任务是在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方面。自贸区现在还是在围绕着投融资汇率便利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改革进行第三方面的改革。而“金融体制先行先试”的核心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为了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流通的规模，利率市场化是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人民币价格形成的定价机制，外汇管理改革是为了提高人民币与外币兑换的便利程度。特别是 5 月 22 号推出的自由贸易账户规则和细则，它是在一个新的账户体系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综合环境。

三、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

最后，我认为自贸区实现制度创新以及成功的关键有五条：第一，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和整个政府的简政放权结合起来；第二，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企业的用户体验结合起来；第三，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国际规则结合起来；第四，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结合起来；第五，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我们自贸区的可持续、可服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自贸区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自贸区。

（整理：刘训志）

◆变革中的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是“试验田”，而不是特权的温床（2014）

演讲人：Graham Mather（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精彩语录】“上海自贸区全称中有‘试验’一词，这让给我很欣慰。因为这说明这片区域并非上海独享的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这里的成功经验将要复制到其它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中国。”

纵观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史，欧洲自由贸易区可追溯到德国北部的自由城市，早在公元十二世纪，汉堡和吕贝克等地便已出现推动手工业发展的贸易。而与此同时，在贵族专制的欧洲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们往往都是通过武力和吞并来促进贸易。

不同于这些国家，城邦的商界领袖则是通过创建自由港或与其它城邦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一个横跨欧洲的通商网络：这便是早期共同市场甚至是 TPP 的一个原型。因此，当今的贸易自由化与历史上的自由港是有许多相通之处。

由于针对自由贸易区的学术研究非常少见，我们实际上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在这方面，意大利学者 Francesca Trampus 博士以及世界银行的报告给了我们许多启示。譬如世行放出的一条最新消息便主张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建设自由贸易区。他们也都强调自由贸易区正在发生变革。而我想探讨的正是自由贸易区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革，因为这一主题与上海息息相关。

一、自由贸易区的历史与发展

自由贸易区的优厚条件是政府决定的，所以自由贸易区要想成功就必须要有周密的政策设计、监督管理以及准备好吸取教训、亡羊补牢的心态。在这里，我要向上海致敬，因为在当下改变就是成功的信号。

我们在迪拜成立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并非巧合。因为迪拜从来都是自由贸易区创新变革的样板。对此，Easterling 教授更是将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种种力量归结为推进创新变革的增益要略。如此看来，迪拜的自由贸易区是一个贸易、金融、管理和交通枢纽。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自由贸易区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6 世纪中叶到上世纪 30 年代，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自由港和早期的自由贸易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主要的表现是出口加工贸易区；而第三个阶段则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特殊经济贸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学产业园区的崛起。在当今世界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新事物，包括像园区城市。自 1985 年迪拜建立 Jebel Ali 自由贸易区以来，迪拜的自由贸易区已变得无所不包。各种各样区域活动远远超出了转口贸易的范畴。

上海也是如此，就在上个月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在前天的开幕式上，Robert Shiller 教授也谈到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律师。或许上海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觉得请仲裁员要比律师更加经济高效。总之，上海正在为自由贸易区牵线搭桥使其成长、壮大。

二、让中国乃至全球分享上海自贸区的红利

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转变又何去何从？这些转变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城市，这使我想起了 Benjamin Barber 的《假如市长统治了世界》，此书还有一个颇为引人的副标题，叫做“国破，城立”。上海自贸区全称中有“试验”一词，这让给我很欣慰。因为这说明这片区域并非上海独享的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这里的成功经验将要复制到其它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举措，因为它化解了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一大政治挑战，即园区边界和园区内的优惠政策。据我所知，此类难题已经困扰欧洲多年，因为在欧洲，许多的自由贸易区福利都被视作国家援助和专享特权，这就会令自贸区丧失潜力。而在我看来，“试验”这一概念正好化解了这一难题。因为如果一个区域内的试验在时机成熟后会推广到全国，那么这片区域获得的利益尽管会令其他地区羡慕却也合法化了。但是之前不公平的特殊待遇如若不能在恰当时机扩展到所有地区，那么就不能同一而论了。

第二个让我感到高兴的就是试验区提出的一系列“试点概念”。比如，负面清单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因为我认为我们应当意识到法律的制定不会总是一步到位。正确的答案也不总是仅有一个。

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上周在考察上海自贸区的时候也提到，上海作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区需要周密的管理，要结合体制改革和新的思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不断进步。最后我想概括为三点：一、自由贸易区不能成为特权的温床，而应是试验田；二、自由贸易区要为整个经济体服务；三、自由贸易区已突破旧有的功能范畴而转变为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作用的“园区城市”，从而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非凡的影响。因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势必将会是举世瞩目的，因为它将引领今后全球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整理：巩辰卓）

◆鹿特丹港的发展及其对上海港发展的启示（2014）

演讲人：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

【精彩语录】“港口的竞争力不仅仅在于吞吐量的大小，质与量同等重要。如果再能通过一些措施加强各个港口的互联互通性，势必会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鹿特丹港的介绍

大家好，我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些鹿特丹的案例，这些案例或许会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例子有所不同。我的发言主要集结了我在鹿特丹大学商学院的同事的贡献，他们做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研究，研究了一个港口高效运转并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要素。

自由贸易区在欧洲并不十分流行，尽管过去欧洲确实有很多成功的自由贸易区，但是现在很多自由贸易区都已被撤除。即使像安特卫普这样的自由贸易区也已关闭。欧洲的自由贸易区之所以不复流行，是因为随着法律的不断严格化，我们需要对物品流通进行严格的控制、管制，同时整个欧盟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自由贸易区。当然，这些只有当你生活在欧洲内部才能感受到。如果你是非洲的农户，想要将农产品运到欧洲，确实还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目前在欧洲我们关注得更多的是新的创新，比如说对海关管理机制，以及运输过程当中的安全、安保等。这都是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要素，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不同贸易区之间的战略连接性。我希望站在鹿特丹这个历史大港上，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考虑这些战略性因素的，也希望这能够为中国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

多年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了解到，鹿特丹港是当时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现在世界增长最快的十大港口主要都分布在中国了。第一到第八大港都在中国，第九大港在新加坡，之后才是鹿特丹，所以鹿特丹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但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由量决定的，质与量同样重要。如果关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你就会发现除了硬件之外，软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 2013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荷兰排在第 8 位，中国位居第 29 位，要知道荷兰只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论人口规模比上海大不了多少。但是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它的竞争力可以排到世界第八位。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它的世界竞争力？港口的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的质量本身，对于荷兰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港口对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能做些什么样的贡献，而政府又该如何维持和推动这种竞争力的发展？这种战略连接性是如何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又会有怎样的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给出一些建议，首先应该增强上海港内的互联互通性，然后加强中国各个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进而提升中国港口和世界各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性。而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提升这种互联互通性。政府有两种基本的手段可以提升这种互联互通性，一种是投资，另一种便是法律法规。荷兰政府对于港口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而就法律归管而言，我们则致力于改进税收和相关的监管制度。举个例子，2007 年荷兰政府推出了一个 AEO 证书，就像是一种自助机制，一旦你获得认证，相关的政府机构对你的管制就会减少。在国际贸易当中，如果你受到的管控较少的话，就可省去很多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香港一样，我们可以对整个价值链、供应链进行认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使鹿特丹和其他的港口有效连接，

因为你可以将你的供应链进行认证，这类认证完成之后，港口和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就会得以提升。

二、对上海港发展的启示

最后，大家可能会考虑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自 2011 年起，在鹿特丹和上海之间出现了一个智能贸易路径连接系统，所以我认为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不仅限于自由贸易区本身，它不仅能提升上海这样一个港口的战略价值，同时也能提升中国的战略价值。此外，研究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把上海和鹿特丹这两个姐妹港进行连接，或许这听上去像老调重弹。但实际上对一个国家而言，竞争力确实由一些主要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也可应用于企业和地区。除了硬件之外，我们知道一些软性的东西，包括像一些支柱性产业，支持性的政策环境等等也非常重要。同时加速创新也至关重要。做到了这几点后，我们可以同时提升上海和鹿特丹的竞争优势，两个姐妹城市也将携手共进。

（整理：刘训志）

◆ 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从韩国经验看上海发展（2014）

演讲人：金范中（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精彩语录】“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上海自贸区也正不断致力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和提升商贸服务开放性。”

去年 9 月 29 日，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政府为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而在试验区推行的体制改革政策。上海自贸区涵盖了 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占地 29 平方公里。我认为它的规模还是过小，而且上海自贸区和世界其它自贸区相比有所不同。比如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正式注册和登记后，所有的商业往来不能在园区以外的其它地方运行。

一、聚焦韩国：特别经济区的历史和特点回顾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韩国的特别经济区的相关历史和特点。起初，为了进一步促进收支平衡，韩国政府在临海地区设立了一些特别出口加工区。1970 年，马山港建立了第一个自由出口加工区，并在 2000 年更名为自由贸易区。为了改善物流和商贸的政策环境，2002 年釜山港、光阳港和 2003 年的仁川国际机场相继被确立为自由关税区。如各位所知，这几个地区都可享受关税免征。2003 年，为了发挥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同效应，韩国政府将一系列以制造业和物流业为导向的自由关税区整合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些举措令韩国的港口、空港跻身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枢纽港。2002 年我们推出了自由经济区的概念以吸引外资并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并将仁川、釜山、镇海等地作为试点着力为外商投资者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商贸投资环境，这些地区的建制类似于特别行政区。此外，为了给外商投资者提供宜人的居住环境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除制造、物流外，这些地区还兼具居住、医疗、教育、旅游等功能。截至当前，韩国共有 13 个自由贸易区，8 个自由经济区，包括釜山港和光阳港以及仁川港在内的主要港口都可同时归入不同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经济区。

二、放眼世界：自贸区成功的关键因素总结

目前，世界上约有 60 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贸区功能大抵相同也各具优势，比如阿联酋、美国、荷兰、新加坡等国的自贸区成功的经验基本上在于关税减免、生产制造、物流仓储、转口贸易等方面，而韩国的自贸区可以为外商投资者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样的，上海自贸区也强调贸易增长以及吸引外商投资。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上海自贸区也正不断致力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和提升商贸服务开放性。

我认为自由贸易区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同时对相关商业活动行使治外法权的保护；第二，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一个完善配套的法制保障体系；第三，自由贸易区管理机构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管理能力；第四，每个自贸区必须要推出具有特色的优惠政策，如服务业、外汇交易、共享信息等能够令外商投资、交易便利化的支持举措。同时自贸区在海关监督管理方面也应该有更为快捷、方便的方案。

祝上海自贸区未来更加美好。

（整理：杨军）

◆香港经验：
自贸区需要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2014）

演讲人：邱丽萍（中国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副总监）

【精彩语录】“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公司都要管理许多不同的供应链，如何协调使其高效迅速地来响应客户需求非常关键。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管理供应链，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那些跨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一、自贸区 and 香港特别行政区

各位上午好，很高兴来到上海论坛并参加本次自贸区特别专场讨论。

首先，自贸区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给定或指定的一片区域中，投资、贸易和商业往来都是自由的。设立一个自贸区的目标是为了能够促进商业活动，并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所以，对于香港而言，整个香港都是自贸区。同时因为我们属于中国，香港也可视作整个中国的自贸区。

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是非同寻常的。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自贸区，除了不用缴纳任何关税，外资公司还可自由在港设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可拥有公司 100% 的所有权，并且还可以自由地将利润输回国内。但最重要的是，香港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关境。同时作为贸易和服务门户，香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里不仅可以联接整个区域，而且还能联通整个世界。我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就贸易而言，香港在全球出口量的排名为第九，这就意味着有很多的企业其实是把货物先运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中转到其他地方。而且我们是世界第三大 FDI 目的地和第二大投资输出地。

二、香港作为跨国企业管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枢纽

同时我们也知道，香港是一个枢纽，许多公司都在这里设立总部，然后把投资输送到世界各地。香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我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纵观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现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都在一个所谓的全球价值链中进行高度的整合和组织规划。起初，这一趋势只是表现为将生产分化到全球各地，而近年来包括研发、营销等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也明显呈现出的全球化的态势。而香港作为一个贸易枢纽，可以为这些公司管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提供极佳的平台。我想以纺织、服装和鞋帽这一行业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已不仅是服装和纺织品的生产地，而且还成为了设计和营销基地。所以除了有 OEM 以外，我们也开始更多地从事 ODM。因为对于 OEM 来说，所有的品牌、设计都是来自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但在 ODM 方面，中国的制造商也开始接手一些像设计这样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已在纺织纤维生产和

制造的价值链中有了很大的能级提升，但我们仍然需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例如印度的棉花、澳大利亚的羊毛，台湾和韩国的高级面料等。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可能更加愿意把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以扩大生产分散化的优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

香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枢纽性的作用，我们可以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支持，帮助在香港的贸易公司很好地管理他们散布在各地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服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粘合剂，它可以把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进行高度的整合与汇总。由于供应链分散在不同地区，许多跨国公司都必须能协调、整合这些复杂的供应链以缩短交货周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公司都要管理许多不同的供应链，如何协调使其高效迅速地来响应客户需求非常关键。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管理供应链，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那些跨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许多跨国企业都将香港作为管理亚洲供应链的基地。原因就在于香港极佳的商业环境、很低的税率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我们还有完善的法制、经济自由和一流的基础设施，在这里更可便捷地联通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地。此外，香港的服务业聚集更可令企业高效有效地管理供应链，在香港可以自由灵活的地开发创新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

（整理：邵熙）

◆中国重新崛起与亚洲的未来（2010）

演讲人：Shaukat Aziz（巴基斯坦前总理）

【精彩语录】“亚洲现在充满着机遇，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分地挖掘这种机遇。作为一个中国几十年来的真诚朋友，中国的远见、中国的执行力已经充分地展现了中国领导的卓越能力，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真知灼见。”

第六部分 未 来

未来是一门科学，未来也是一个梦想，上海论坛是科学的讲坛，也是造梦的舞台。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前赴后继地努力，对未来的担忧，让我们不断创新和改进。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

一、中国的重新崛起是 20 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今天非常高兴应邀参加上海论坛，来到复旦这一中国知识、学术的中心。每一次来到中国访问都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中国和巴基斯坦是老朋友，彼此非常尊重和信任，中国对于巴基斯坦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我既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一个从业者。根据自己 30 年的全球经济工作和 10 年的政府工作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些经验。请在座的学者，请你们原谅我的“无知”，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与你们不同。上海这座城市让我入迷，我一到上海就感到非常兴奋，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上海世博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参观访问世博会，我肯定会收获很大。

中国的重新崛起可以说是 20 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科学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女士们、先生们，未来的 20 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超过了美国和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必须要积极扮演起全球领导者和经济大国的角色，我们都希望中国在经济、外交、社会和国际安全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发挥这样的作用。全球的领导力不仅是一种影响或者、权利，也意味着它巨大的责任。中国这样的大国正在展现这种责任感。温总理正在访问首尔，正是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正在积极地在全球引导和平。

中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也是在全球前所未有的。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而不仅仅是货物的输出国，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可以帮助中国为更多的本国产品找到新的市场。中国的很多企业或者是许多市场，也在进一步的积极拓展海外的市场，与此同时，也正在积极构建国内市场，建立更好的法律监管体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政府日益强调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的经济管理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灵活性。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想强调一点，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

二、亚洲需从合作中寻求发展

回到上海论坛“反思、复苏和重构”这个主题。我们要重整和继续我们的改革，我们要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这样改革的红利才能为世界各国所分享。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也签了很多的地区经贸合作的协议，这将进一步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这和欧盟是相类似的进程。我想强调一点，欧盟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我们必须从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当中学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也就是我们要联盟，我们同时也要落实各种制衡的措施，从中吸取教训。

亚洲是完全可以全球一体化放开与放松管制当中获益的，亚洲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巨大市场，

可以进一步地提升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帮助亚洲在全球的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毫无疑问也将成为这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政治、政策和经济的改革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这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女士们、先生们：亚洲现在充满着机遇，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分地挖掘这种机遇。作为一个中国几十年来的真诚朋友，中国的远见、中国的执行力已经充分地展现了中国领导的卓越能力，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真知灼见。

我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为此非常自豪。作为全球公民，我们要通力合作，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加美好，让全球更加进步！谢谢大家！

（整理：巩辰卓）

◆未来，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2007）

演讲人：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精彩语录】“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这样，就可以使得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一个亚洲的世纪。”

感谢上海论坛的组委会邀请我参加今年的论坛，我也要祝贺他们非常成功的举办了这样一届论坛。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来中国、来上海。我也从整个项目的跨学科的活动中学到很多。我也看到了一些低碳经济方面的知识，还有替代能源、人口方面的一些论文。我想我很少能有机会参加像上海论坛这样的活动。还有整个论坛涉及到了中国的农村问题，在考虑我今天应该在论坛上说什么呢？我决定，我要讲“未来”！因为，关于未来的话，大家不会引发很大的争论。我目前在讲未来的时候，面临了一些窘境，是否能够说得非常的准确呢？在讨论未来的时候，聪明的方法就是一定要预测灾难，这主要是由于如果出现了灾难，这就显示出了你对于整个流程的认识，如果说灾难在未来没有发生，然后这个专家也可以说他能够非常及时的提醒，从而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一、未来亚洲经济的可能失败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这样，就可以使得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一个亚洲的世纪。首先，我不是一个亚洲的民族主义。现在看到的是高盛公司所做的预测，今年年末中国会像日本一样，到2030年中国就会和美国一样。到2050年，中国要比美国大30%，当然，其中有很多重复计算。因为，很多的政治家会谈到国家安全性，还有人会谈到人均GDP，但是在这里谈到的是经济实际的总体规模。今天最大的消息，我是要祝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高盛的预测中，可以看到韩国的表现非常得好，人均的GDP会超过日本，超过的幅度是20%。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韩国来研究。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来预防高盛的预测成为现实。在1960年后，亚洲的经济就像一列飞速行驶的汽车，所有的国家都在飞快的赶超。高速行驶的汽车，很多人都会考虑来自于各种不同来源的撞车，有些是硬件的失败，比如说活塞的老化，这里讲的是经济体系的失败。还有一些财政的管理不当。第二种失败，就是很多的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的，是与机构有关，考虑到社会的一些问题。第三种失败就是供电的失败，类似于汽车没有汽了，或者说是在中国、印度缺少了水资源，或者是在一种情况下，有一些路障，因为车子开得很快，就撞到了路障，比如说保护主义，这会大大的影响到严重依赖出口的亚洲国家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我们谈到硬件失败，很多人会对此怀疑。今天我不会详细的去谈这个硬件失败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在今天的大厅中有很多的复旦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比我了解得更多，所以我不想在这里不懂装懂，我会跳过这些失败。我会说“时间有限，不再详述失败的原因”。我为什么会跳过呢？除了刚刚说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硬件的失败是最容易应对的。比如说看中国的成功，中国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它张开了眼睛，别人更好的复制与模仿，比如说日本上世纪的成功经验。类似的还有中国结束了自己的对外闭关锁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当人们谈到银行的失败，很多人会说，就像

美国的情况一样，这就是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当金融行业出现了问题，就可以学习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的成功是张开了眼睛，模仿了其他国家的做法。

二、中国领导人应该重视的失败原因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更加的重视哪些失败的原因呢？中国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目前中国的发展方向，可能不会带来“和谐”的结果，当然它的增长很快。中国目前关心的是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他们觉得硬件上面的失败可以模仿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在这里强调了亚洲的很多重大的问题。比如说亚洲在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哪些问题，尤其是在地区的经济架构上会出现哪些软件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未来发展的愿景。在 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知道了唯一比较可靠的帮助，就是“自我帮助”，他们应该要采取非常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你看到在 1997-1998 年的 IMF 对亚洲国家所采取的活动，我们就知道真正关心你们的就是你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对亚洲有怎样的愿景呢？而且要使用怎样的软件呢？很明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地区合作的意愿增强了。尤其是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集中在一起，如果说亚洲遇到了金融危机，这些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集中在一起，就像 2000 年的清迈倡议一样。我们已经实施了“上海举措”，我们看看今后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一个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说像欧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创建一个亚洲共同的货币。现在的问题就是目前亚洲主要的工作重点，还是要实现其他领域的经济一体化，我认为亚洲目前除了货币的一体化之外，还应该做其他的一体化的工作与努力。在亚洲的货币一体化与亚洲的结构不相匹配。经济一体化，是很多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但是很少有人为此付出努力，大多数的一体化的行动，我们只是在很多的庆祝晚会上看到，但是之后却没有付出实施，所以在签订了这种一体化的协议之后，应该要付诸实施。比如说一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例子，是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我们也看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点，他们没有讨论共同的货币，还有自由贸易、自由资本的移动。还有更为自由的劳动力的流动，其中还有一些反对移民的法律。

让我们来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及一个共同货币的话题？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从中期、长期来看，你所看到的就是美国主导了这个集团，在未来也会继续的主导这个集团。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在墨西哥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会是有限的，最主要是由于墨西哥的影响力有限。国与国在规模上有如此大的不同，为什么还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呢？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美元化他们的经济。格林斯潘他们也谈到了其他的国家可以采用美元，但是不要期待我们来采取一些货币政策来帮助你们，你们必须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国家，美国只会关注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对于美国来说，他没有任何的动力来实施有利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所以，很多的国家都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汇率，来使得自己不受到危机的巨大冲击，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看看欧盟，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规模非常类似，在未来这个经济规模也会非常的类似。如果看 20 世纪的前半部分，这可以避免潜在的冲突。比如说通过政治联盟，就能够避免历史再次的重复发生。但在这里，经济刺激的元素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假设在一台桌球台上，上面有三个球，有一只篮球，两只乒乓球，如果是用乒乓球来打篮球，篮球不会移动。欧盟是有三只正规的台球，任何一个去打击另外的两只球，它都会对另外的两只球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对称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欧盟来说，为了避免这种溢出效应，就必须要有共同的货币。而在亚洲是怎样的情况呢？在 2010 年，根本上来说，日本目前的经济非常的强劲，但是在未来这个经济强劲的趋势会发生改变。如果中国在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正像联合国现在是如何应对美国和墨西哥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亚洲中央银行现在成立，日本总统和韩国的副总统，如果中央银行的行长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的人来

担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现在就建立这样的一种机制，就会冻结它的权力分配。比如说 IMF，是由欧美人建立的，现在还是由欧美人主导。后起之秀的日本都没有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如果你把目前的权力分配进行机构化的话，很可能这种机构化的分配就被冻结在时光的隧道当中，不能与时俱进。对亚洲而言也是一样，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考虑建立怎样的地区性的协调机制？换言之，东亚是否能够把它看成是欧盟呢？马克思说，“历史总会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就是闹剧”，如果是继续的按照欧盟的做法，亚盟就会变成一出闹剧。什么样的合理机制符合亚洲的动态的发展？这是重要的问题。还有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货币组织，而不是一个国际的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非洲，它都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没有钱来建立一个非洲基金组织，但是，亚洲是有这个钱的。其实亚洲可以建立一个相当于 IMF 这样的组织，这个是现实的，因为亚洲有这个资金。

IMF 就可以看到，它通过向每个国家派驻 3 个主要的经济学家来监控他们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提议是很不现实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建立这样的基金组织是现实的，但是别指望说建立一个“亚洲央行”，这样的亚洲基金组织会覆盖什么样的领域，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在亚洲只要有东盟成员国，是由十大成员国组成，现在的东盟 + 中国 + 日本 + 韩国的自由贸易区，但是没有一个东盟 +3 的机构，为什么呢？是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政治情况。也就是说，同样的政治格局，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东盟 +3+3 是什么？这个“3”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组合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组合只能承认、接受一个主导的国家。新西兰不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那么印度我们是知道的，它的势力会越来越强，所以如果现实一点，我觉得展望将来应该不是东盟 +3，应该是东盟 +6，只有这样各国对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会有一定的信心，这样权力才能得到平衡，这样经济的整合一体化进程才会开始。

三、贸易与环保问题

我很快的转向最后一个话题，前面的教授也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我们也讲到了环保的问题，十分的精彩。我们看到了全球的公共机构——世贸组织，还有环境方面的事故。我们来看看这两点。

现在正进入一个保护主义的时代，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如果《纽约时报》的文章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意见的话，可以看到美国的舆论界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008 年年底开始，大家开始呼吁中国对于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解决要负起责任来。尼克·斯拉迪就说了，美国是消费大国，然后中国是就推动美国人不断的消费、不断的负债。也就是说，美国人好比是“上瘾”了不断的消费，中国人不断的推动他们去消费，让他们不断的负债。我们可以看到，2009 年年终以来，奥巴马对于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重税，甚至于要对中国的所有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保护自由贸易主义。纽约时报也称中国的货币要升值，说实际上中国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在进行本币的贬值。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理论也是解释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总而言之，这些舆论造成的气氛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种势力就已经抬头了。

我们来看看，标志着全球化进程停止的阶段是什么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从 1990 年 6 月份的时候，在过去的 10-20 年当中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苏联解体，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进行了改革开放，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海，这样让印度开始意识到，如果经济实力不强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国防保护。所以印度也开始进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它的理由是要纠正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做得很激进，不光是通过贬值来促进出口，同时它放松了《劳工法》的管制。换句话说，在 1990 年的时候，印度就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进入了市场经济。前苏联的分解之后的小国家也是开始进行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这样就使得各国之间的劳动力愈发的不能流动，各国对劳

动力进行了立法，这样就大大的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的难度。再看看中国的出口，出口的产品是不断的在价值链的阶梯上不断的攀升，甚至是超过了南韩。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困难是它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在阶梯当中，美国的社会保障是最弱的，对这些下岗职工来说，他们的保障是最低的。如果说美国劳动力下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还不是贸易，并不是贸易导致了这么多的劳动力下岗，而是因为技术发展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平均的工资实际上在上升，但是失业率也在上升，说明了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科技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办法消耗这么多的失业人口。当然，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这也就很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对于贸易的失衡的调整是这么僵化、不灵活。而像日本、韩国，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同盟军，对美国来说，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可以说是冷战时期，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军，所以在调整贸易失衡的时候也很难调整。其实，真正相信自由贸易的是谁呢？是经济学家，有一位经济学家在五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论稍做假设和调整，就对富裕的国家自由贸易是很糟糕的，前提就是美国不再进行科技上的发展、革命。我想我就不详细往下讲了。很有可能我说错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著作和理论，其实标志着美国反自由贸易主义的抬头，这是理论界的一个转折点。当然，除了保护主义之外，我们还要斗争的就是 CUT，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我想总理先生昨天也就这个问题阐述得非常的明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是有利益的冲突，可以看到“京都协定”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立场有所转变，因为它现在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其实，除了空气之外，还有水污染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北京城外 50 英里左右，开始了水分配制度。为什么呢？中国现在降雨的地理布局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北方是旱灾。同时，国土局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北方因为地下水的下降，使得它的地面也在下沉。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进行南水北调，要做三个大水坝。但是这个前提是南方的降水不会下降，如果是南方的降水下降的话，即使是三个运河水坝也不够了，只能让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去，而不是把水引到北方去了，还有从喜马拉雅山引水到中国，也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是印度是不是有富余？这是各国的地下水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到升得最快的是蓝色的，这条就是代表了印度。相对于 20 年之前，它的地下水的水面是下降了很多。中国如果要希望从喜马拉雅山调用更多的水资源，那么就要做好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到时候印度可能会有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争夺水资源，进行环保，也是将来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前面讲到的像金融机构的失败，硬件的失败，我觉得各个具体的情况不一样，相互之间可以借鉴。但是，软件的失败，我觉得也可以相互学习的。比如说要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绩，怎么做呢？也可以看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权力的失衡是很难纠正的。它不仅仅是涉及到经济学家讲的市场要搞好，同时也涉及到政治学家讲的要把制度搞好。

最后，还要讲到环境。如果环保的问题不能解决，很多的政治、经济的问题都难以解决。还有碳排放的配额的解决交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安排。还有，在中国我们知道利用核电获得能源，这也是一个发展的前途。但是，我们看到用核发电，相对来说成本非常高，差不多要上升三分之一。所以，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讲，像核电、风能、太阳能等等这些不同的发电方式，还有绿色能源方面，都要考虑到成本收益的问题。

（整理：邵熙）

◆ 2020 年的中国经济（2011）

演讲人：张军（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精彩语录】“只要我们的资本和劳动力从低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的部门和地区转移的话，我们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未来中国赶超其他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鼓励资源在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不停的流动。”

非常感谢上海论坛对我的邀请。我本来想用英文讲，这里还是改为中文讲。因为是最后一个演讲，希望把重心拉回到中国经济，并对前面的探讨有所补充。

其实经济学家不善于谈未来，我今天还是选择了这个题目，中国的经济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里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想我的演讲基本上是用三个比较大的题目作为三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三个“尺寸”最小的答案。第一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长模式能否持续？第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赶超美国的经济？第三想谈一下赶上美国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可持续的

关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持续发展，我想大家都非常地关心这个问题，刚才 James Mirrlees 教授也谈到了中国经济的某些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回溯到 2000 年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学者都对中国的经济感到非常的悲观。那时候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越来越快于中国经济的产出速度，导致了资本对 GDP 的比例在 1995 年之后持续地上升。2000 年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我自己发表的论文也很悲观，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太快了，远远地大于产出的速度，所以未来是不可持续的。慢慢的我们发现我们都错了，中国的经济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不仅是持续的增长，而且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奇迹是发生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是经济学家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一定要进行很好的反思和研究。

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我这里所说的这些结构的变量，也就是现在大家经常所说的投资占 GDP 的比例太高，现在差不多一半的 GDP 用于积累了。第二个就是消费不足，我这里是叫做“劳动的收入（工资收入）”，它占 GDP 的比重过小。所有的这些结构的变量，都被经济学家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很多有名的学者都在讲这样的话，比如说最近纽约大学的 Roubini 教授说中国的经济在 2013 年就要崩溃了。他最近两次来中国，看了之后很担心，认为中国的投资规模太大了。回到十年前的老问题，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呢？大家还是在看这些经济性的变量，这个比例高了，那个比例低了，这种思维方式有没有问题呢？我个人反思是有很大的问题。今天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有一句话就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所以我们不关注长期。今天我们想问题不像大家所想象得那么大，对过去中国经济的表现进行一个增长的核算，我们就会发现投资占 GDP 的比重在 1993–2005 年之间是上升了很多，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加快了，分解为资本劳动比的增长，同时可以寻找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全要素的增长。

从当时亚洲其他国家的表现来看，中国的表现要好得多，即使我们的投资率在不断地上升，生产率的增长也是保持着相当不错的速度，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问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度？我想我们并不需要简单地看投资率是否上升，是否占 GDP 的比例太高，而是要拆开来：生产率是否在增长，在提高？这是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没有重点关注的问题。今天我们都是短视者，只是关注当前的结构性的变量，没有关注到这个结构性变化的本身并不是未来增长的障碍，而应该用中国增长的模式来解释。

这让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 Simon Kuznets 的想法，他写了一本书，其中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变量，即增长率和结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会变的，关键是要增长。今天大家普遍关心收入分配问题，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收入分配不均、差距过大而慢下来。在 Kuznets 看来，这些都是倒 U 字型的变化，长远来看对中国的经济不需要悲观。今天中国的生产率在不断地增长，这个源头是什么？我认为 Kuznets 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里面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投资所占比重不断地上升，而是它的结构变化得非常快，尽管投资率在不断地上升，但是生产率仍然没有下来，并且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长速度。、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投资去哪里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投资大量地进入到了基础设施领域，吸纳了更多的资本投资；同时从中长期来讲，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需要对中国的经济感到那样的悲观。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使得其内部的差异很大，地区之间的差异、行业之间的差距很大，这导致中国有着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意即只要我们的资本与劳动力可以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地转移，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会不断地保持高速增长。结构的变化是结构因素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劳动的占比，或者说劳动力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比 30 年前要低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是由结构变化导致的。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如果对中国的 48 个行业进行测算，农业占比是最高的，工业是最低的；如果放到各个省，对 31 个省进行测算，上海最低，西藏最高。这说明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是解释这个结构比例的原因，结构的深化导致今天看到的很多结构性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并不需要静态地看待这些结构性的因素，把它们理解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而是要用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构的变化来解释。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是可以继续地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

二、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务实选择

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前面只有美国经济了。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在总量上是三倍的差距，我们一定是会把美国作为我们赶超的对象。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怎样来赶超？什么样的方案是比较务实的？中国去年的 GDP 是 40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6 万亿美金，大概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在 1978 年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很少一部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要赶上美国的总量，按照现行的汇率换算的话，只要把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提高到美国四分之一就可以了，差不多就是上海现在的人均 GDP 的水平。这样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把全国的人均 GDP 提高到上海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需要把思路放到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即怎样把生产率水平提升三倍，达到上海的水平。上海处于沿海地区，如果想让沿海地区的生产率水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提高三倍，这是不可想象的。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很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很小，基本上是 2 倍到 2.5 倍的差距；如果要将上海的生产率提高 3 倍是比较难的，因它已经比较接近前沿的水平了。所以应该把重心转到中西部地区以及落后的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三倍的目标。

我有一位美国的同事，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在 2006 年的时候，把中国的三大行业，工业、农业和

服务业放到四个地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来测算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进行标准化。这个矩阵很有意思，横向来看是三个行业，竖向来看是四个地区。我们把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率作为 1，其他的数数据据此进行换算。横向来看，我们发现不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工业要低 2 到 3 倍，服务业也要低 20%、30%，甚至是 40%；纵向来看，同一行业在中国的四个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非常大。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行业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未来增长的源泉。只要我们的资本和劳动力从低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的部门和地区转移的话，我们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未来中国赶超其他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鼓励资源在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不停的流动。James Mirrlees 教授说中国的人口流动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地赞同。中国的劳动力还要从农业不断地被转移出来，因为劳动生产率太低了；服务业需要有更大的发展，缩小与工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要赶上美国，要把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到上海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农业、服务业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中西部的行业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这就要靠投资。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过度投资了，我想中国还是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需要资本深化，需要不断地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需要不断地提升农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这是唯一可以让中国经济不断地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方式，而且，也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在不断地提高投资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中国的收入差距里面，地区的差距，即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远远地大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从这个角度上讲，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低生产率的落后地区 and 行业，可以逐步地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沿海和内陆的差距。

三、中国经济将在 2020 年前后赶超美国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即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家注意到最近有不下十个的预测谈论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想首先提一下在 2003 年的时候，高盛做过一个预测，今天看起来是非常保守的。它的预测是 2039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近于美国，2041 年达到美国的水平。之后它又修正了，觉得自己太过于保守了，把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想象为大概是 5%，等到 2030 年以后，则只有 2.3%，而且没有意识到汇率的快速变化。修正之后，赶上美国的时间是 2027 年。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名义 GDP 的话是每年 14%，现在公布的增长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扣除了价格因素，只有 10% 和 9% 左右。经济学有一个 70 法则，增长 10% 的话，7 年翻一番；增长 7% 的话，就是 10 年翻一番。中国的增长率为 14%，因此我们的经济总量是 5 年翻番的，它是遵循 70 法则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很快在 05 年超过了英国，07 年超过了德国，去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这样的原理，中国要赶上美国，其实就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经济的未来增速问题；第二，人均 GDP 问题。这就像一个雪球，假如最下面的是日本，就是日本的经济总量，是红色的球，2005 年的时候中国是在左上角，经济增长率 10%，人均 GDP 只有 3000 美金，经济的总量比较小。中国不断地往日本靠拢，越是接近发达国家的话，经济增长速度越是慢，这就取决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增长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我们分析未来的 10 年，这个增长模式是完全可以持续的。因此，我把中国未来的经济规模想象成后面的第二个白色的大球，这就是美国的规模，人均 GDP 就是上海今天的水平，12000 美金左右，GDP 的增长率为 8% 左右。假设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 8%，美国是 2%，人民币汇率是 3%，中国 CPI 指数小于 5%，美国小于 2%，这样的环境之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 2020 年会赶上美国。

我后来看到《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的预测：假设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 7.75%，美国是 2.5%，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 3%，通胀率中国为 4%，美国是 1.5%，计算的结果是 2019 年中国就赶上美国了。

这个原理就是我才所说的 70 法则。IMF 前不久也公布了一个数据，运用了另外一套 PPP 法则：假设全球美元的购买力是一样的，换算之后中国现在的 GDP 总量比官方的统计高出了一倍，差不多是 12 万亿的水平。所以，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的 GDP 总量现在是 11.2 万亿美金，五年以后是 19 万亿；而美国现在是 15.2 万亿，五年以后是 18.8 万亿，即五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这是根据 PPP 方式换算的，五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 18% 了。按照这种逻辑再推算下去的话，到 202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 20% 并接近 25%。这是什么概念呢？前面素帕猜秘书长讲中国经济成为老大没有什么好激动的，我还是很激动。中国经济在 200 年之前就占全球的三分之一，200 年之后的 2020 年，中国经济能够回到 20% 以上的全球占比，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值得庆祝和自豪的。而且，前不久我的一位在美国从事投资的朋友告诉我：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有很多含义的，譬如说我们从事投资的就需要考虑十年以后是买黄金、美元、还是人民币。因此，中国的经济能不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英国马上要出版一本书，题目为《2020 年的中国》。它从外交、政治等方面探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后，全球的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这个问题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全球人士的关注。我想中国的经济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我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述，希望能够得到批评指正，谢谢！

（整理：巩辰卓）

◆ 40 亿的亚洲人谋求更好的健康水平：未来十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2013）

演讲人：Michael H. Merson（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

【精彩语录】“亚洲的非传染性疾病虽然不会带来大范围的死亡，但是会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威胁，这就要求亚洲各国政府要及时制定创新性的措施，整合相关力量，积极应对。”

一、亚洲发展的趋势

非常感谢各位尊敬的嘉宾，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40 亿的亚洲人谋求更好的健康水平：未来十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这个题目已经传达了我想表达的主要信息。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一场斗争。我将简要地描述这场斗争的场景，并展示我们将如何应对。这将是一场硬仗。

35 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我在路上到处都能看到骑自行车和打太极的人们，那时还没有麦当劳。首先，随着我们讲到的那场斗争，可以看见亚洲变化的情况。我们能看到，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亚洲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日本、新加坡、韩国居高不下，柬埔寨、孟加拉国排得比较低，但我们知道亚洲发展的速度是最快的。其次，亚洲也是一个飞速城镇化的地区。这张图给大家展示的是在 2007 ～ 2025 年 GNP 全球排名前 50 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什么都在向东转移，深绿色的就是大多数城市到 2025 年的 GNP。第三个趋势就是快速的全球化，大家可以看中国在汽车、彩色电视机、计算机方面的使用情况，亚洲正在变得西化。自行车的使用量开始下降，后来上升，这是因为中国后来更多的是把自行车出口到外国的国家，而不是广泛的骑自行车了。第四是工业化。大家可以看到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我们在亚洲确实是有比较高的死亡率。中国 2010 年死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有一百二十万人。第五就是快速老龄化。在亚洲 65 岁以上人口的规模与日俱增。到 2050 年 20% 的人口将会是 65 岁以上，8% 的全球人口将会是 80 岁以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全球化以及老龄化为我们提供了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之战的最佳背景。我们会看到在亚洲地区，人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能够进一步降低母亲在分娩的过程中母亲以及新生儿的死亡率，这在前两年还是引起死亡的原因之一。这里可以看出，有八个不同的亚洲国家在 1990 ～ 2010 年母亲和新生儿死亡率在下降，主要是五岁以下死亡数的下降，这是因为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儿童越来越少。

但我也想提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推动这么一个运动，目的是到 2020 年能够把可预防疾病导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到零。在亚洲地区，有一些正在出现的传染性疾病，包括登革热、SARS、禽流感、多重耐药性的肺结核，以及疟疾等等。这些疾病不会在大范围内导致死亡，但是一旦爆发，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非典的流行让亚洲损失了 300 亿美元。你们最近刚刚经历过的 H7N9 禽流感，它就让亚洲损失了 80 亿美金，特别是对于活禽市场的影响。但这些疾病没有引起很大的死亡，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影响。以上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场战争的背景。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疾病呢？

二、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及其介绍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疾病是引起全球死亡率的主要原因，非传染病（NCD）。2010 年世界上 65% 以上的死亡都是由此导致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80% 的疾病以及 90% 的可预防的死亡都是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四分之一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发生在 60 岁以下的人身上。到 2030 年，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将会增加 50%。请你们看这张地图，它展示的是我们称之为“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数据，这个数据与成年之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相关。颜色越红，那么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遭受非传染性疾病侵扰的程度就越高，负担就越大。所以确实在亚洲，我们这方面的疾病负担是比较严重的。再分析一下亚洲一系列不同的国家，从这张图中我们看到的是 10 个国家，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占总体死亡率的比重的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左手边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大概占了 50% ～ 6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大概是 80% ～ 90%。但即使是在所谓的贫穷亚洲国家中，非传染性疾病也是主要的死因。

下面我将主要说三类疾病，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和中风，糖尿病和肿瘤，另一个是精神病。首先我们看一下心血管疾病是世界上导致死亡最主要的原因。目前 80% 的心血管的疾病导致的死亡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发生的，它们导致的死亡人数是传染病、孕产妇及围产条件、营养不足三者导致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到 2030 年，大约 230.6 万人将会死于心血管疾病，其中主要是由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亚洲在非传染性疾病上的负担。这里横轴是年龄组，纵轴为残疾调整生命年。深黄色部分代表的是心血管疾病，浅黄色是中风。亚洲很特殊的一点是，中风的发病率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具体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张是糖尿病的残疾调整生命年图标。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患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年轻了，糖尿病不仅是个大问题，而且是攸关青年人健康的大问题。这边是癌症的情况，粉红色的代表男性，可以看到主要是肺癌，所以对男性主要的癌症适应症是肺癌，然后有一点绿色的是肝炎。女性方面，蓝色部分说明乳腺癌为主要的致死癌症，有些国家有一些粉红色的，那是卵巢癌。以上就是亚洲一些主要的致死的癌症。

对于这张图有什么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它显示了非传染性疾病是如何迅速地到来的。图中淡蓝色的是在 1990 ～ 2000 年期间中国的非传染性疾病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疾病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并不停地在增长。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它们是吸烟以及饮食。首先讲到吸烟，我想明确的是，烟草是世界上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到 2030 年，将会有一亿八千万人死于吸烟，大概 90% 左右的都是在中低收入的国家。在亚洲国家，图中间是男性吸烟致死的比重，在印尼 67% 的男性死于吸烟，中国 50%，韩国 48%，日本 38% 等等，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吸烟在女性致死原因中的比重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另外一点就是饮食因素，这边给大家看到的是十年前的中国，也就是 90 年代中期的数据。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摄入最多的是猪肉、牛奶和禽肉，不管男女，在城市或在乡村都是如此，而吃蔬菜的量减少了。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引起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原因，就是高血压。我们在全球一些不同国家做了调研，高血压的发病率比较高，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与盐的摄入有关。一天的盐摄入量应该是 5 克，而亚洲国家的盐摄入过量是很严重的，这是导致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措施呢？

三、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措施

有四个领域，分别是烟草、不健康的饮食、锻炼的缺乏和过量的饮酒。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措施，我们需要采取控烟的举措，包括降低盐的摄入，并且进一步推动水果、蔬菜的摄入，在城市打造很好的环境，推广步行，我们的社区也需要相关的健康项目。政府每一个机构也都要能够去负责起来，以更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我在新加坡工作过很多时间，之前新加坡是烟草泛滥的，现在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禁止所

有的香烟广告，并且定制了新加坡的烟草销售政策，规定在包装袋上要有一个鲜明的警示标识，并严格禁止向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香烟。这对控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在美国过去十年内，冠心病发生率下降了 36%，中风下降了 31%。这是因为，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锻炼和饮食的重要性，吸烟率下降，所以那些很难控制的高胆固醇以及高血压的问题才得到了控制。同时我们的治疗技术也更加先进。

需要做的另外一点说明就是我们应该把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护理整合到现有的医患制度中去。特别是在初级护理的层面，包括在社区层次采取的一些措施，针对这些非传染性疾病展开，并且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医保的覆盖范围。我相信今天在论坛的分会场，将会有所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去年杜克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的全球健康研究所正式启动，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去促进全球卫生政策的推动和发展。明年中心也会和昆山市政府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大学，包括复旦大学在健康相关领域做深入的研究。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整个战役当中取胜的话，必须发起全球性的运动，亚洲必须要借助世界的力量。在过去的 15 年当中，我们有一个千年发展计划，它包括八个子计划，其中第四、五、六项是和健康有关的，它们是减少儿童死亡率，孕产妇保健，以及对抗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的疾病。现在世界在讨论未来的 15 年中，我们将设定哪些新目标，我们希望在其中能有关于发展和健康的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亚洲整个的孕妇以及儿童死亡率已经在下降了，而正在出现的非传染性疾病迄今还是并且将继续对经济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亚洲面临着快速扩大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这给预防和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亚洲各国政府应当在多个层面进行反应，扩展具有创新性的干预措施，并且出台适当的政策。私人领域也应该成为预防和控制中的主要力量。

（整理： 刘训志）

◆寻找新的动力：亚洲的未来与创新之路（2014）

演讲人：Adam Pose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精彩语录】“为了未来长远的发展，亚洲的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将出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并非宏观总体上的经济建设或是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背景：全球科技发展放缓

今天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技术发展放缓的时代，这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公认。大量创新仍然在各领域不断涌现，而这里强调的是创新的重要性。投资者们认为，技术发展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在一次显著的技术进步之后，新型技术会被经济系统所接受并迅速反映出来，从而带来经济发展的飞跃。

在技术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第一，很多前沿国家对下一波技术浪潮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科技是外向型的，科学家不可能总是有新的发明，新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轻易产生。

第二，在北美的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情况形势严峻。目前，为了对潜在金融危机做好充分准备，西欧以及美国的部分公司持有大量的资金。即使现在美国的经济有所回升，利率水平较低，但是很多企业却缺乏投资积极性，新的投资周期并没有出现。原因之一就是潜在效益大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少。这并不是指现在的技术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 3D 打印和基因学上的成果进展，这些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发展放缓的现状对中国、美国，以及不断新兴的亚洲的具体影响。

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体，一种是前沿国家，即第一集团，这些国家往往在技术创新上不断推动前沿发展；另一种是追赶型国家，比如中国，他们有能力向第一集团进发，但是目前还处在调整期，需要学习各种技术并应用到全国各地。在现实世界中还有第三种，即较为落后的国家。这种模型应用了机构政治经济学的理念。

在这个模型中，如果前沿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就会相对较快。因此，前沿国家和追赶型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追赶型国家可以应用已有的技术进行发展，而前沿国家在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知识产权会越来越难得到保护，技术创新的脚步也会放缓，这又会促进而追赶型国家占有相对更多资源进行发展。我们很难去评判这种现象的优劣。知识产权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却阻碍创新。因此，我们需要额外措施来实现平衡和整合，在不妨碍创新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知识产权。

二、影响：展望未来发展

那么，前沿国家发展速度放缓，追赶型国家发展速度上升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于前沿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也会加大，而其对于经济发展却起着重大作用。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资本流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投资组合应能体现出当地的发展前景。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协调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比如，部分西方公司会把它们的研发厂家和高端生产模式实行到

国外。一些理性的投资方可能乐于看到这种情况，但是这里面也涉及到利益方面的冲突。

第二，大量资金从前沿国家流出，并进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同时，也会带去知识和技术，而这也可能会触犯到某些利益集团，损害它们的利益。

第三，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的全球化影响不容小觑。过去的 40 年，巴西、中国、印度，以及东欧等地，在没有牺牲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从原来的贫困发展到现在已有不少人进入中产阶层，这就是全球化的影响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各种影响因素不断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认真对待政策因素。作为投资者，要考虑接下来几年世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走向，其中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比如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牵动着世界经济，两者发展也呈现出一致化的趋势。

技术发展放缓所施加的另一个压力来自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其中涉及到自由贸易的发展问题，这也需要各机构、组织的共同合作。社会转型不仅需要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西欧、美国还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内结构性改革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在中国尤其有适用价值。

（整理：巩辰卓）

◆寻找新的动力：亚洲的未来与创新之路（2014）

演讲人：Robert J. Shiller（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精彩语录】“为了未来长远的发展，亚洲的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将出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并非宏观总体上的经济建设或是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亚洲的未来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针对亚洲的未来和亚洲的创新这一主题，所能够做出的评论将同样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目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增长均得益于他们在金融创新领域和金融基础架构领域所作的努力。然而为了找寻新的动力，有如下几个方面仍需关注。

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各国非常好地应对了 2008 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期，很好地度过了这场危机。作为应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回升。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和政府吸引融资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起到了很好的经济平稳复苏的作用。但长远来看，其中的一些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将会达到所谓的饱和点。因此，为了未来长远的发展，亚洲的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将出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并非宏观总体上的经济建设或是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金融建设的目标。金融建设需要长期有效的机制，而非短期实现目标的手段。金融需要一种能够寻求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有效关系和平衡的机制，而这样一种机制必须在过去几百年当中，乃至未来的几百年中对于人类的社会有所规范。因此，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三是消除对金融的偏见。由于金融使成本和利益跃然纸上，因此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许多人将金融视为赌博，这是人们最为根深蒂固的概念之一。这种概念导致目前对金融的评论以负面居多，进而阻碍了金融进步。而此类偏见的存在也有一定的理由。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金融市场的难以预测性。图为 1871 ～ 2013 年美国的股价走势。蓝线是实际股价。而如果人们能够对于未来进行正确预判，股价将呈现出红线所示的发展情况，并不会出现蓝线这种程度的波动。一个是事后的理性股价，一个是实际股价，两者之间的差距（绿线的距离）就是我们所需要遵循的市场规律。过去的几年中，实际股价与作为完美预期的红线大相径庭。据此可知，金融市场的难以预测性；第二，金融交易中确实存在赌博的心态。以短线交易员每天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例，几乎没有任何交易员表示可以从交易中获得显著的毛利润。因此必须承认，在金融交易中，所谓的赌博的心态确实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防止金融滋生腐败。金融机构被普遍认为是滋生腐败的摇篮。因此，金融机构需要来自政府的监管和行业内部的监管。上述监管本身需要大量的投入。限于各国人均 GDP 的水平，监管的成本并非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数额。发达国家普遍对于新的监管措施开展了许多成本有效性的分析和大量的研究，英国和美国均是如此。

五是金融衍生行业。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对律师的大量需求。目前中国的律师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律师都能够给予金融监管和反腐败方面的建议和指导。从业律师的数量有待提升。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金融咨询行业。大多数人不了解金融体系，以及金融顾问的重要性。政府应该对于公共金

融建设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指导，以促成金融顾问和咨询行业的发展。

二、亚洲的创新

中国理应成为金融创新推进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新的动作、做法以及对互联网金融这种对未来起到重塑作用的力量，必须加以考虑。目前金融创新有如下这些形式：

一是刺激贷款。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形式，刺激贷款使信用评价不高的人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贷款。在一个非常活跃的经济体当中，刺激贷款的处置也有非常多元的渠道。此外还存在影子银行。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正处在灰色地带中，但必须在未来找到一条正确、合适的道路才会有更好发展。

二是众筹。众筹网站使得每个个体能够以公司的形式开展投资，其目标是提供小额信贷和小额金融资产借贷。世界银行在报告中也肯定了众筹未来的发展潜力，并指出众筹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三是慈善税收。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有少数人会掌握绝大多数的财富。这时一个必须被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了这些钱干什么？目前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财富最终应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未来。中国未来也面临这一问题。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回馈，税收制度亟待改革，例如将以慈善捐款与个人的所得税相抵。目前中国对于此类捐款的种类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若要鼓励个人捐款，应采取相应改革。

四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是金融改革的新方向。其核心为在金融研究中加入心理学的考虑，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有感觉、有崇高的目标和内在的心理活动。所谓人的概念泛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亚洲人。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改善金融系统的功能性，让金融系统更多地与人进行互动，以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

寻找新的动力意味着首先得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自然地产生错误。在这个过程中，规则的漏洞会被一些人利用。但漏洞被发现之后，就需要对这些漏洞进行填补，并进一步进行完善。因此，试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只有通过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试错，才能加快这个进程，并最终寻找新的动力。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亚洲的未来和创新寻找新的动力！

（整理：巩辰卓）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复旦发展研究院

地址：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东主楼 7 楼
网址：<http://fddi.fudan.edu.cn>
<http://www.shanghaiforum.org>